

中共党史资料

中共中央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编

10

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

中共党史资料

第十辑

中共中央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编

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

一九八四年·北京

封面题字：舒 同

封面设计：马少展

中共党史资料

第十辑

中共中央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编

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出版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北京新华彩印厂印刷

850×1168毫米 32开本 9.5印张 162000字
1984年10月第1版 1984年10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000,001—106,000册

书号11310·10 定价1.05元

内部发行

目 录

关于《辽沈决战》一书的谈话 陈 云 (1)

回 忆 录

回顾党的六大前后 李维汉 (6)

山西抗战的回忆 任弼时 (53)

国民党改组前后和大革命的失败 ... 吴玉章 (70)

解放长春 肖劲光 (92)

洛川会谈前后 钱之光 (122)

艳晚事件 宋 黎 (139)

忆川陕根据地时期与杨虎城十七路

军的统战工作 徐以新 (160)

回忆三十年代中共东京支部的成长

历程 陈 健 梁威林 (169)

专 题 调 查

一九二一年至一九二七年上海、江苏、
浙江党组织发展概况

上海中共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档案馆
.....江苏中共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档案馆 合编(181)
浙江中共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档案馆

关于作出南昌起义决定的情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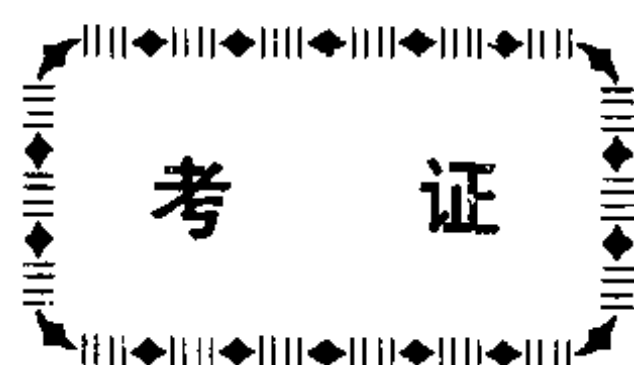
.....南昌“八一”起义纪念馆(245)

大连“福纺”厂罢工始末

.....中共大连市委党史资料征集办公室(255)



怀念黄道同志.....方志纯(285)



叶挺同志在皖南事变中被扣的经过

.....郑建英(296)

关于《辽沈决战》一书的谈话

(一九八三年八月九日)

陈 云

编者按：《辽沈决战》一书原系锦州辽沈战役纪念馆计划编辑的一本战役参加者的回忆文章汇编。陈云同志在该馆来函请他为这本书题写书名时，就这本书的编辑指导思想、结构、内容到具体编辑办法谈了一系列意见。谈话整理成文字后，经陈云同志阅改过。这篇谈话不仅对认识和研究东北解放战争的历史具有重要指导意义，而且对整个党史研究工作和党史资料的征集、编纂工作具有指导意义。现征得陈云同志同意，在本刊发表。发表前，陈云同志对个别地方又作了修改、补充。目前，《辽沈决战》一书的编辑工作正在按照陈云同志的意见积极地进行着。

辽沈战役是解放战争三大战役的第一个战役，它的胜利从根本上改变了敌我双方力量的对比，为整个解放

战争的顺利发展奠定了基础。因此，编一本回忆这个战役的书是必要的，这对于纪念那些牺牲了的同志，对于教育下一代，都很有意义。

但是，编这样一本书，不仅应当使大家知道辽沈战役胜利的经过，而且应当使大家知道这个胜利是怎么来的。在抗日战争结束前，我们党在东北的力量与全国其他各个根据地相比最弱。然而不到三年，却在那里打响并且打胜了解放战争的第一个大战役。所以能够出现这么大的变化，绝不只是和战役的参加者，和战役的组织、指挥以及具体战斗有关，而是有着多方面原因的。

首先，是由于苏联红军出兵东北，打败了日本关东军。这为我们的大部队能抢在国民党前面迅速进入这个地区，为改善我们的装备，创造了十分有利的条件。那时，苏联党对我们的力量估计不足，并有雅尔塔协定的约束，但他们还是尽力帮助我们的。东北背靠苏联，东邻朝鲜，这对于我们在和国民党作战中的后勤补给和伤病员的运送、安置也是十分有利的条件。

其次，是由于全国各个根据地的支援。为了支援东北，先后调进去了山东军区的主力，新四军的第三师，陕甘宁三五九旅、抗大、炮校等部队的一部分，以及冀东、冀中、晋绥、冀鲁豫军区的大部分或一部分部队，共约十一万人。另外，还派进去了一百个团架子的部队

干部和二万左右的党政干部，其中包括二十个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这些力量再加上抗联原有的力量，为我党我军在东北的发展奠定了十分雄厚的基础。为了迅速歼灭东北的敌人，东北局曾向中央提出，希望关内能牵制更多的敌人兵力，不使他们再增援东北。那时，全国各个战场都打得很好，确实牵制了大部分敌人兵力，以至敌人大部队不仅没再进来，有的还出去了。这也是全国对东北的巨大支援。可以说，如果没有全国各个根据地的支援，没有一野、二野、三野和华北野战军的支援，就不可能有四野，不可能有东北战场的胜利。

第三，是由于我们动用正规部队进行了剿匪。东北的土匪实际上就是伪满军警和地主武装，如果不把它们剿干净，农民就发动不起来，后方也不可能安稳。

第四，是由于进行了土地改革。贫苦农民翻了身，我们党才能在东北站住脚，扎下根，我们的部队才可能有那么充足的兵源、充足的粮草，来和美式装备的国民党军队较量。

第五，是由于建立了巩固的东北革命根据地。东北解放区原有的经济基础就比关内各解放区雄厚，它拥有不少比较好的产粮区，所谓“呼海巴拜，绥化在外”，“金复海盖，辽阳在外”；还拥有沟通各地的铁路和一批大中小城市；再加上我们在解放区迅速建立了政权，抓

紧恢复生产建设，发动翻身农民踊跃参军，充分动员各方面的人力、物力支援解放战争，这就使我军有了一个强大的后方，物资特别是粮食供应有保障，部队可以不断扩充，而且调动起来快，机动性强。

第六，也是最重要的一点，是由于党中央、毛主席为东北局制定了完全正确的工作方针，为辽沈战役制定了完全正确的作战方针。如果按照林彪的打法，主力围困长春不南下，以后占领了义县又不打锦州而要回师长春，那就不会有辽沈战役，东北的胜利就不可能来得这么大，这么快。

总之，战役参加者的作用，战役的组织、指挥，这些对于战役的胜利无疑都是十分重要的。林彪作为四野的司令员，在当时正确的地方，我们也不必否定。但是不能只看到这一方面的作用，还必须看到其他方面的作用。只有这样看待辽沈决战，才是全面的，符合历史唯物论的。

因此，这本书在编法上要改变一下。可以考虑加进一些重要的历史文件、电报，比如中央一九四五年十二月二十八日给东北局的指示，东北局一九四六年的“七·七”决议。还可以加进一些在各方面有代表性的同志写的回忆文章，比如黄克诚、谭政、韩先楚、程世才、彭嘉庆、贺晋年、吕正操等部队干部，张秀山、王鹤寿、范式人、郭峰、赵德尊、张启龙、江华、王首道、李运

昌、陈雷、王一知、钟子云等地方干部的文章。还可以请林月琴同志写一篇回忆罗帅的文章。这样，人们就不仅能够从这本书中看到辽沈决战胜利的经过，而且能够看到胜利的各种基本原因。

为了把这本书改编好，可以请几位当时在东北工作的老同志，张秀山、王首道、马洪和韩先楚、刘震他们来主持编辑工作。还可以把这本书的编辑做为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的一个项目，由辽沈战役纪念馆和它合编。书编好后，要送中央军委、尚昆同志把关。

改编的工作也许要花一两年的时间，不过，只要能把这段历史立全面、立准确，多花些时间是值得的。

回顾党的六大前后

李 维 汉

编者：李维汉同志嘱我们转告读者，对本文“敬请提出批评建议”。

我现在对党的六大前后若干情况和主要工作，根据个人回忆并参考文献记载，作一简要论述。

六大的历史背景和准备工作

我们党在一九二八年四月基本结束瞿秋白盲动主义之后，面临着三种情况：

一是国民党新军阀在帝国主义和江浙财阀的支持下，加强了反动统治，使我们党的组织受到严重摧残。据粗略统计，从一九二七年三月至一九二八年六月，惨遭杀害的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竟达三十一、二万人^①。工会、农会、学生团体等，都被打散或被打入地下。

二是革命力量逐渐恢复。我看过一九二八年六月三

十日的《组织问题报告大纲》，这个材料说，自宁汉反动后至党的六大，我们党领导过的重要罢工约四十七次，参加罢工的群众有三十一万至三十四万多人。同时，我们党在农村中领导的暴动约有九十四次，参加斗争的群众有三十四万多人（两广的数字未计入）。其中，有二十六处成立了县苏维埃，三十一处成立了乡苏维埃。此外，还有许多自发斗争^②。在这些斗争中，特别是经过秋收起义、南昌起义和广州起义，开始建立我们党独立领导的人民军队和革命根据地，开创了“工农武装割据”的新局面。在这期间，党的组织也有了一定的恢复和发展。据统计，到召开六大时，全国共有省委十六个，南洋临委一个，特委三十七个，县委四百个，市委三十六个，区委四十一个，特支一百三十八个^③。党员人数已从第一次大革命失败后的一万多人上升到四万多人。这个数字是目前许多同志的一种估计。恩来在党的六大大会所作的《组织问题报告和结论》中说，全国党员人数为十三万零一百九十四人，但他同时指出十三万多人这是“夸大数字，无法保证是正确的”。据历史文献记载，一九二七年十一月中央临时政治局扩大会议时，全国党员由近六万人减少到一万余人。一九二九年六月六届二中全会时，党员发展到七万三千多人。因此，在召开六大时，党员人数已在上升，这是可以肯定的。

三是大革命时期遗留下来的几个重大理论问题，还

没有统一认识，有待于正确地澄清和解答，否则便不能适应历史前进的要求。例如：中国革命的性质问题。中国革命的性质是什么，它是由什么来决定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为什么却要无产阶级来领导，怎样实现无产阶级领导权？这些问题，当时许多人还搞不清楚。加上陈独秀散布过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理应由资产阶级来领导，彭述之鼓吹过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有天然的领导权，当时虽然对这些错误论调进行过批评，但没有从理论上完全弄清楚。六大前，共产国际代表罗米那兹混淆民主革命与社会主义革命的所谓“不断革命”论，更搞乱了我们党内的思想。这样，中国革命的性质问题在当时就成了一个很突出的问题。又如革命形势问题。当时到底是高潮还是低潮，许多同志的认识也是很模糊的。有些同志对革命高潮到来的客观条件与主观力量的关系分不清楚，往往只强调有利的客观条件，不重视主观力量强弱的影响和作用。同时对革命高潮与直接革命形势也分不清楚，不知道革命高潮的到来，不等于直接革命形势已经形成；一个大城市直接革命形势的形成，也不能说全国可以马上起义。总之，在这些问题上常常争论不休。再如在斗争策略上，当时是应该退却还是应该继续进攻？如果是退却，那么在总的退却中还可不可以在局部的地方举行进攻？诸如此类的问题，大家在当时也是搞不清楚的。

针对这些情况，为了总结大革命失败的经验教训，弄清大革命失败后的政治形势和革命性质，确定党在新时期的政治路线和策略方针，迎击敌人的残酷进攻，领导革命胜利前进，在八七会议时，中央临时政治局已规定在六个月内准备召开六大。十一月，中央临时政治局扩大会议又通过了《关于第六次全党代表大会之决议》，决定六大“于一九二八年三月初至三月半之间召集”，“大会会期和地点，由中央常委决定”。大会代表的选举办法是：一、“各省党部得选举有表决权的代表。代表应由各省党部代表大会选出，如因秘密组织的环境关系，不能开代表大会，则由各省委全体会议派出代表，然而应当尽可能由扩大的省委全体会议选派”；二、“各省党部选派代表以五百党员选出一代表为标准，五百人以下的党部，亦得选一有表决权的代表；无表决权的代表各省党部亦得选派，但必得中央的同意”；三、“中央委员或中央候补委员如果没有被某一省党部选为代表，因而无表决权，则可以无表决权的参加大会”；四、“共产青年团中央委员会派五人出席大会”；五、“出席大会代表必须入党一年以上的方能当选”。至于六大的议程，决议规定为：国际代表报告国际状况和共产国际的任务和策略；中央的政治与党务报告；中国革命过去的分析及将来之前途与党的任务和策略；土地问题党纲；革命工会的任务；党的组织任务；共青团工作；选举中央委员会及出

席共产国际第六次代表大会的中共代表团。后来，由于情况的发展变化，代表产生办法和大会议程都有所改变。

到了一九二八年初，关于在什么时候和什么地方召开六大的问题，因环境关系，中央还未能作出决定。至三月底，共产国际来电，让六大代表去莫斯科开会，这样，开会地点就最后确定下来了。

关于六大代表的产生，本来是准备按照上述选举办法进行选举的，但由于当时环境十分险恶，加上时间仓促，四月份代表就得启程，而这时多数省份还没有选出代表，因此来不及按照选举法进行选举。除了广东、河南等省的代表是开会选出来的，其余大多数是中央指定的。出席大会的代表究竟有多少，我记不准了。我记得的代表有瞿秋白、苏兆征、周恩来、刘伯承、向忠发、张国焘、蔡和森、关向应（共青团代表）、阮啸仙、周秀珠、霍锷鏞（湖北代表）、刘义（湖南代表）、李子芬（共青团代表）、余茂怀、夏曦、李立三、邓颖超、张昆弟、罗明、杨之华、蔡畅、邓中夏、项英、罗章龙、王仲一、任旭、王凤飞、黄平、王灼、杨殷、胡锡奎、毛简青、王藻文、华少峰、徐锡根、何资深、王若飞、唐宏经等人。上述名单中有些名字有待党史资料征集过程中证实，未能回忆出来的名字，也有待查证。

确定六大代表人选的工作，是有缺点的，主要有两条：一是过分强调工人成份；二是没有让一些从事实际

工作、具有丰富革命斗争经验并在党内享有声望的同志参加六大。关于这两条，我完全同意周恩来在《关于党的“六大”的研究》一文中所作的评论。

以上所说的是关于六大的组织准备工作。下面再说关于六大的政治准备。

早在一九二七年十一月扩大会议前，中央就指定专人草拟了《中国共产党土地问题党纲草案》。十一月扩大会议要求各级党组织和一般同志参加讨论这一草案，提出书面的修改意见，同时要搜集当地的土地问题材料以及一切关于土地问题的理论或分析的意见，把这些意见和材料随时上报中央，在党报上讨论，以待六大作最后的决定。后来，六大通过的《土地问题决议案》可能参考过这个土地问题党纲草案。

接着，一九二八年二月二十五日，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九次扩大会议，通过了苏联和中国共产党代表团提出的并经过斯大林等修改的《关于中国问题的议决案》。六大所讨论的主要问题，如关于中国革命性质、革命动力、革命形势、党的工作中心、党内所要反对的主要错误倾向等等，在这个决议案上都有阐述。

到了一九二八年四月十二日，秋白写了《中国革命与共产党》，作为向六大大会的报告。这个报告是根据共产国际对中国问题的决议精神写成的。它叙述了一九二五年至六大前中国革命斗争的发展阶段，总结了成功

和失败的经验教训，肯定了中国革命仍然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性质，批评了陈独秀的右倾错误和大革命失败后党内出现的“左”倾盲动主义，原则地提出党的五项任务，内容比较丰富，研究这段历史时值得一读。但是这个报告对当时的革命形势作了过分估量，继续坚持反对民族资产阶级和上层小资产阶级，坚持城市中心和加紧准备总暴动等“左”的错误。

对召开六大作了必要的准备工作之后，从一九二八年四月开始，南方各省的代表便在上海集中，陆续前往莫斯科。由上海去莫斯科的代表，一般都是经大连、哈尔滨，在满洲里下火车，于夜间渡过国境线，进入苏联境内，沿途有苏联同志接应。周恩来和邓颖超是一九二八年五月一起离开上海去莫斯科的。瞿秋白离开上海的具体时间我已记不太清楚，据秋白本人在《多余的话》里说，他是一九二八年四月三十日“离沪出国”的。

秋白、恩来到达莫斯科后，继续为大会的召开进行准备工作。开会前，斯大林又找部分代表谈了话。准备工作基本就绪后，大会于六月十八日下午正式开幕，七月十一日闭幕，历时二十四天。

六大期间留守中央的工作

六大开会期间，我和任弼时受命负责留守中央，中

央秘书长是邓小平。从一九二八年四月开始到同年九月新中央负责人回来的期间，开会的地方仍在上海四马路天蟾舞台后面楼上的两间房子里。这个秘密机关是一九二七年冬或一九二八年初建立作为中央常委开会的地方。房子是租赁来的，由熊瑾玎、朱端绶夫妇住守（熊瑾玎任中央会计）。那时，开会的同志从天蟾舞台西侧云南路的一个楼梯上去，就可以直到开会的房间。房间内朝西的窗下有一张小桌子，开会时，小平就在小桌子上记录。这个机关从建立起一直到一九三一年一月六届四中全会以后，都没有遭到破坏。后来，大概由于一九三一年四月顾顺章被捕叛变，中央才放弃了这个机关。（一九五二年毛泽东在杭州主持起草宪法时，通知小平和我到他那里去。路过上海时，小平和我去看过那个老地方，那时房间结构和形式如旧，里面设了一个卫生站。一九八〇年四月我到上海又去看过，其结构完全变了，成了一排市民住宅中的一间。从云南路上楼的途径也没有了。）当时，每天上午九时，我、弼时和小平碰头处理日常事务，不是在这个地方，而是在离此不远，隔一条街的一个商店楼上，到场的还有熊瑾玎、内部交通主任和其他个别负责干部，例如江苏省委留守负责人李富春有时也来参加。

中央（留守）在六大开会期间，主要抓了以下几项工作：

一是开展反日运动，同时反对英美帝国主义乘机侵略中国，反对国民党政府勾结英美出卖山东、满洲权益给日本帝国主义。

一九二八年五月三日，日本帝国主义借口保护侨民，向济南大举进攻，几天之内屠杀中国军民三千余人，并杀害国民党政府山东特派交涉员蔡公时及其交涉署职员十六人。在胶济铁路和青岛，日军也有同样的暴行。面对这一情况，蒋介石不但不敢抵抗，还扬言要继续北伐，自动将军队调离济南，进行新军阀对旧军阀的战争。同时又严令取缔“有碍邦交之标语与宣传”，以示“镇静”^④。但日本帝国主义则步步进逼，继续从青岛、满洲和国内派遣飞机、军舰到山东、上海、南京、武汉等地。

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行径和蒋介石的奴颜婢膝，激起了全国人民的极大愤怒。在这种形势下，中央（留守）于五月九日发出了《中央通告第四十五号——“五三”惨案后反帝斗争工作》，指出：“我党目前对于反帝国主义运动，应当领导工农群众积极参加”，要求“各地特别是上海、南京、广州、香港、济南、青岛、天津、北京、开封、郑州、武汉、九江、南昌、长沙、芜湖、安庆，接到此通告后，须立即制定当地行动大纲执行之，并将执行情形报告中央”。随后，在不到一个半月的时间内，中央（留守）先后发出四次通告，有些地方还派了人，有些地方另有书面指示，强调反帝运动的重要意义，并

提出斗争的口号和策略方针，要求各地加紧这一工作，努力“使反帝运动与一般小资产阶级运动和工人运动以至党的组织的改造联系成一片”。⑤

在群众反帝运动开展起来的时候，国民党政府也高唱废约修约等论调，企图骗取反帝领导权，以控制广大群众的反帝斗争。针对这种情况，中央（留守）在七月二十六日发出的《中央关于城市农村工作指南》中强调指出：“反帝工作此时特别重要，各地应认真执行中央历次反帝的通告，去发动群众反帝高潮，并揭破资产阶级与国民党反帝的黑幕，而取得这一运动的领导地位。”

在我们党抓住济南惨案发动全国反帝运动，并向民众揭破国民党投降卖国的政策之后，情况逐步发生了一些变化：第一，在党组织的领导或直接、间接影响之下，许多重要城市掀起了反帝运动，同时还通过反帝运动揭露了国民党出卖满洲、山东和压制群众爱国运动的丑恶面目；第二，一些地方的党组织已能运用中央（留守）所指示的策略和方法去领导反帝运动，推动了工人运动的开展，扩大了对小资产阶级的影响。这是大革命失败后民族解放运动的新的兴起，也表明了我们党虽然遭受了严重的摧残，但仍然对运动起了一定的领导作用。

二是建立城市工作的群众基础，加紧城市工人运动。

大革命失败后，由于严重的白色恐怖和“左”倾盲动

主义所造成的危害，在许多大中城市中，工人运动受到重大挫折。但是，经过党的努力工作，在济南“五三”惨案之后，工人群众的罢工斗争即开始复兴。反帝运动也在发展，不仅工人群众参加，并且还有一部分城市小资产阶级参加。面对这种情况，中央（留守）在《中央关于城市农村工作指南》中要求各级党组织打破一切困难，去创造城市工作的基础，特别是广州、上海、武汉、长沙、郑州、天津、九江、南昌、青岛、济南等城市的党组织更应加倍努力，就是县委也应当打破过去忽视城市工人运动的错误倾向。并对城市工作提出了两个应当注意的问题。

首先，建立工人群众统一路线。当时除我们党领导的工会外，全国尚有下列各种不同性质的工会组织：一是工人为保障自身经济利益自发组织起来的工会。这类工会能够站在工人地位要求改善工人生活，并防止资本家的进攻，但不反对国民党，甚至在形式上还和国民党发生关系，如上海邮务、商务印刷所、商务印书馆、报业、南洋烟草及英美烟草公司、电汽等七大工会。这类工会都有两面性，都有相当的群众基础。二是工会组织的头头多半是由国民党指定的，当时叫它“御用工会”。这类工会在政治上完全受国民党的指挥，但大都有一部分群众，在一定程度上尚能站在工人利益方面来调停劳资纠纷，仍有两重性，还不完全是“御用”的，如厦门、福州

等地的工会组织。三是完全由国民党指定的“忠实同志”所组织的御用工会。这类工会只有上层机关而无下层组织。他们违背工人利益，利用政治势力压迫工人斗争，时常引起工人群众的反对，如上海的工整会（即由上海“工人总会”与反动的“工会统一委员会”合并而成的“工会整理委员会”）等类组织。四是在工人贵族领导下的工会。这种工会在政治上与国民党有极深的关系，历来与我们发生冲突，如广东的机器工会，它是由各个企业的机器工人抽出来成立的。这种工会是分裂工人，不是联合工人。由于机器工人在企业中具有重要地位，它能破坏工人罢工和统一的斗争，是特种形式的反动工会，我们的工作是要争取其群众。

对于这些工会组织，“我们运用统一战线策略的根本意义，是统一各派工人群众斗争的行动，在斗争中去获得工会的群众。”^⑥在这一原则之下，对于如工整会一类完全没有群众的反动组织，我们就在工人群众中揭破其黑幕，防止它在工人中发生影响。对于其他各类工会，则按其性质的差别，切实运用统一战线的策略。具体方式是：一、对于一、二、四类工会的群众，经常用我们领导下的工会（或其他工人结社）的名义，提出当地工人最迫切而实际的要求，广泛地向工人群众宣传，尤其要使这些宣传深入到右派工会组织及其影响下的工人群众中去，鼓动他们在这些要求之下一致行动；二、在有

这类工会的工厂中，设法建立党的支部组织，并派一部分身分没有暴露的共产党员加入他们的工会活动，用结拜兄弟姊妹^⑦等方法组织左派力量，监督其领袖分子的行动，推动其群众左倾，直至适当改造其指导机关；三、在他们领导的斗争爆发时，我们的工会就站在工人阶级利益上号召工人起来援助（发宣言、传单，派代表慰劳群众，以至举行同情的怠工或罢工），以便影响其群众，同时注意及时揭破其领袖妥协、畏缩或出卖工人利益的活动；四、在斗争爆发之前或斗争紧张时，我们的工会可用书面形式要求第一、二种工会作一致行动，如他们同意便可与之作一致的斗争；如在一致行动中他们的领袖表现畏惧退后时，则向群众宣布其欺骗黑幕以争取其群众。

现在看来，提出建立工人群众的统一战线，把它作为联合和团结各派工人的策略方针，是正确的，特别是在摆脱“左”倾盲动主义的错误时，提出这个策略，是更必要的，但在策略的灵活运用上还有不足和缺点。例如：对第一类工会的上层，有可以争取、可以中立、需要孤立的三种人，应该加以分析和区别对待；第三类、第四类的上层，在群众压力之下，也可能发生分化，就是说对某些可以争取或中立的上层也要做统一战线工作，这些在以后的经验中都是有过的，而当时我们却没有这个认识。

其次，是纠正过去错误的斗争方式。在这以前，我

们党发动斗争的方式有过两种错误倾向：第一、用恐怖手段威胁群众，派人以武力制止工人进厂工作，以造成罢工形势；第二、把罢工、暴动看成是工人斗争的目标，忽视了发动小的能够争取和教育群众的各种形式的斗争。这两种错误倾向妨碍了工人运动的发展。我们当时决定立即予以纠正。并提出了发动工人斗争必须注意的几个问题，即：一、抛开武力胁迫的方式，着重说服教育，同群众商量，定出合乎实际情况的斗争要求；二、切实领导工人日常的斗争，在小的斗争中聚集群众的力量去准备大的斗争；三、建立赤色工会，发展工人结社（兄弟姊妹团等）；四、有计划地组织赤卫队或自卫队等工人武装，并用体育队、习武队等名义公开组织卫护工人的团体；五、注意开展手工业工人运动。

我们做了一系列工作以后，工人运动获得了一些进展。特别是在反帝运动中活跃了工人斗争，这在上海特别明显。上海的反帝斗争开始时也是很难领导起来的，但因江苏省委比较能执行中央（留守）指示的策略和方法，工作渐有起色。五月三十日和六月三日（是“五卅”济南惨案周月纪念）两次示威行动，有数千工人学生参加。他们在上海南京路和西门一带，散发传单，高呼打倒卖国的国民党等口号。虽然有许多人被捕，但很快就被释放出来。这两次示威行动，在党内党外都有很好的影响，鼓舞了群众。有些比较涣散的支部也精神为之一

振。因此，到一九二八年八月一日，在两个月的时间内，上海就爆发了大小近四十次的工人经济斗争。其中少数完全胜利，大多数得到部分胜利，失败的只有三数起。除上海外，广州、安源（矿工）、天津（纱厂）、济南（失业工人）、淄博（矿工）、豫南、汕头、佛山、海口市、镇江、苏州等城市的工人经济斗争（约三分之二是罢工）都陆续起来了，而且差不多都是由党直接领导的。这样，在全国范围内，几个月来沉寂的城市工人运动，又重新活跃起来。这说明我们当时注意争取其他工会的工人群众和注意纠正过去两种“左”倾错误的斗争方式是对的。

三是整顿和发展农村工作，注意组织农民暴动。

八七会议以后，我们党在组织农民暴动方面是有成绩的。但是，由于盲动主义的影响，不少地方党组织不顾主客观条件，一定要把斗争引导到武装暴动和武装割据，这样便出现了一些错误倾向，即：一、不注意群众的日常组织工作（如江苏的江北）；二、普遍忽视对群众的政治宣传与教育；三、只注重如何利用“土匪”枪会组织（如安徽）；四、不去努力发展和领导群众进行小的经济斗争；五、未能造成巩固的农村党组织，在盲动失败之后，党组织就瓦解消失。这些错误倾向，使一些割据区域形成了单纯军事割据，未能坚决组织和发动群众以执行没收地主土地的政策，因而不能推动广大群众起来为切身利益而拥护革命和苏维埃政权。

中央（留守）分析了这些错误倾向之后，在《中央关于城市农村工作指南》中，明确指出：当前“农村工作的主要方针就是发动农民抗税、抗债、抗捐、分粮，一直到秋收时抗租、没收土地，在群众与我们有力量的地方即须实行暴动与割据。我党应即抓住这一秋收时机创造农村工作的新局面，尤其是在湘鄂赣粤四省必须特别注意在此时期中推进全省总暴动的布置。”（六大以前，中央曾指示湘、鄂、赣三省要努力创造区域割据的局面。中央（留守）指示：“必须特别注意在此时期中推进全省总暴动的布置。”这仍然是未彻底脱离盲动主义的思想。）与此同时，中央（留守）还要求农村工作应当特别注意以下几点：一、要防止脱离群众的盲动主义倾向。为了防止这种错误倾向，中央（留守）还就具备什么条件方可攻取县城作了明确的规定；二、要注意城市与乡村及各区的配合发展，在湘、鄂、赣、粤四省之内尤其应当特别注意这一点（这也反映了当时还没有脱离盲动主义倾向）；三、要加紧农民群众的组织工作，如注意建立和发展农民协会（或用其他名义）的组织，注意“乡村无产阶级”群众的特殊组织工作（在割据区域建立雇农工会，在未割据区域建立手工业工人工会，在农协已有相当群众基础时设立雇农部），建立农民武装与开展游击战争，等等。

经过各级党组织和广大革命群众的努力，农民暴动

也有了进一步发展。在广东，群众组织因零乱而失败的现象已经减少，海陆丰和海南岛乡村的革命势力仍然在党领导之下，东江的革命力量也在向四周发展。在湖南，以湘东为中心，沿湘东北以至湘粤大道，农民暴动的声势在继续发展，并且比以前深入。湘西的群众斗争也开始发展，那里还时常发生兵变加入农民暴动的事情。在江西，赣西、赣南、赣东、赣东北的农民暴动继续不断，特别是赣西以井冈山为基地的宁冈、永新一带，已经分配了土地。赣东北的弋阳，数十万群众坚持了五、六个月的割据局面。从湘赣两省来看，当时有组织的红军约有一万人以上，尤其毛泽东、朱德率领的部队在政治上、军事上都有很好的基础。在湖北，虽然武汉三镇的工作尚未完全恢复，但外县的组织都还存在，鄂东、鄂北、鄂中、鄂西各区域的农民斗争仍在此起彼伏地发展。总之，在湘鄂赣粤四省中，湘鄂赣三省的农民暴动都在继续发展，土地革命的内容一般都比以前充实，群众的基础比以前更扩大了。此外，闽南（以平和、永定为中心）、豫南（信阳等地）、浙江的临海温（临海、温州一带）、山东的胶东一带、苏淮（以南通、如皋为中心）以及陕北地区，都有农民游击战争。

为了加强对湘赣边界斗争的领导，中央认为有必要重新组织前敌委员会。一九二八年六月四日，中央发了一封给毛泽东、朱德转前敌委员会的指示信。这封信是

中央（留守）发的，也可能在秋白、恩来出国前曾讨论过。这封信肯定了“中国革命现在仍然是资产阶级民权革命的性质”，“只有无产阶级来领导农民直接的来完成此一革命的使命”；批判了“以为现在中国已经超过了民权革命的阶段，而是社会革命”的错误理论、不顾主客观条件“玩弄暴动”的盲动主义、专以攻城夺地为目标的“单纯的军事行动”和过“左”的烧杀政策；同意在湘赣边界以“军事实力发动广大的工农群众，实行土地革命，造成割据的局面向四周发展”。关于前敌指挥机关，“中央认为有前敌委员会组织之必要”，并指定前委由“毛泽东、朱德、一工人同志、一农民同志及前委所在地党部的书记等五人组成，而以毛泽东为书记”。中央在信中还指示：要在“前委之下组织军事委员会（同时即是最高苏维埃的军事委员会），以朱德为书记。此外还须组织一职工运动委员会，以前委之一工人同志为书记。军委及工委的名单由前委决定”。前委所管辖的范围“要由环境决定”。所有管辖区域内的工作“完全受前委指挥”。“前委在江西境内时受江西省委指导，在湖南境内时受湖南省委指导”。现在看来，中央信中的这些指示是适当的，是合乎斗争需要的。中央这封信的错误方面，就是只把中心区域的割据作为“全省总暴动”的条件，并要求红四军向四周发展，“而推动湘鄂赣粤四省暴动局面的发展”。同时，还错误地要在红四军中“取消党代表”制度。一九二八年

十一月二十五日井冈山前委对中央的报告说，湘赣边界党的领导机关接到中央来信后，认为“这封信好得很，纠正了我们许多错误，解决了这边许多争执的问题”。这封信一到，当即印发给军队和地方的各级党组织。十一月六日，由湘赣边界特委召集特委委员、军队及地方党的活动分子三十余人开会，讨论中央来信。会议认为：“中央来信除一二点（如游击区域过宽与废党代表制）具体事项外，全部原则及政策都切合实际，应依照执行。”同日，“依中央的指定”重新组织了根据地党的最高领导机关——前敌委员会，以毛泽东、朱德、谭震林（地方党部书记）、宋乔生（工人同志）、毛科文（农民同志）五人组成，毛泽东为书记。湘赣边界特委和红四军军委统辖于前委。由于重新组织了井冈山前委，就使湘赣边界工农武装割据的巩固和扩大，有了更加坚强可靠的组织保证。

四是派得力同志到敌军中工作，加紧士兵运动。

在第一次大革命时期，北伐军中的士兵曾以极大的热情参加了北伐战争，但大革命失败后，在新军阀蒋介石之流的反动统治下，他们没有得到丝毫的利益。当时，新旧军阀手下的士兵生活条件十分低劣。有的军队一年四季只有一套衣服，到了夏天就将棉衣的棉花抽去作为单衣。有的军队士兵不但领不到欠饷，而且还有被裁减的危险。这正是我们发展士兵运动的机会。同时，由于

朱培德已派军队妄图“围剿”井冈山根据地，湖南的敌人正在高唱“清乡”，北方的军阀也在进行“平匪”的军事行动。如果我们不加紧士兵运动，进行争取和瓦解敌军的工作，那就会给革命增加许多困难。

但是，在我们开始搞留守工作的一段时间，除在广东的一部分敌军中建立了相当的工作基础外，其他各省的士兵运动只有一些零散的活动，有些地方的党、团组织还没有开始进行这一工作。就是稍有士兵运动的地方，在工作观点和方法上也有某些错误，如有的省委对于士兵工作主张“有一个变一个”，有些地方忽视“秘密艺术”，以至遭受极大的损失。

针对这些情况，中央（留守）于一九二八年七月十日发出了《中央通告第五十八号——兵运策略》，提醒各级党、团组织严重注意这项工作，指出：“目前革命斗争的发展，不仅须注意城市工作与乡村斗争的配合适应，同时须注意士兵运动与工农斗争配合适应的发展，仅在工农兵的争斗联系起来才能推动革命运动更迅速的向前发展与扩大。”通告还要求各级党团组织“应即于一周以内成立士兵运动委员会，讨论这一工作具体进行的计划”。七月二十六日中央（留守）在《中央关于城市农村工作指南》中又强调指出：“士兵运动关系我们争斗的工作十分重要，今后不独努力使城市与乡村的工农适应的发展，各地应即切实计划进行这一工作”。至于在军队

中开展工作的方法，主要就是派出得力的同志到敌军中去，如各个军阀经常需要补充兵额，有的军队实行征兵制度，我们就利用这种机会派同志进去。此外如军阀创办下级军校，我们随时注意派同志去报考。如没有入伍的机会，则派同志接近士兵，注意争取军队中的中心力量，发展我们的组织。在这个过程中，尤其要利用大军阀假借裁兵名义裁撤异己军队，不发清士兵欠饷，不抚恤救济死伤残废，不给退伍士兵工作等等，鼓动士兵群众兵变，以动摇军阀统治，增加工农斗争的声势。这项工作，在当时收到了一定的成效。

五是整顿和发展党的组织，加强党的秘密工作。

在我们开始留守中央时，党内存在着几个值得严重注意的问题。首先是在严重白色恐怖下，党的组织在几个月内遭到了几次重大的破坏。尤其是两湖省、市、县委干部的损失非常大。中央政治局常委、组织局局长罗亦农被叛徒何家兴、贺稚华夫妇出卖，于一九二八年四月在上海被捕牺牲。这对我们震动很大。当时秋白、恩来还在上海。我们考虑，党组织遭到重大破坏的原因固然是由于反动统治阶级的猛烈进攻，但我们党的组织不适应于秘密工作的环境，以及叛徒的告密，乃是党组织遭到破坏的关键。同时，我们又考虑到有些党组织在白色恐怖下往往失去了领导斗争的力量，甚至不能与广大的群众联系，因此对白色恐怖下党的组织问题必须严重

注意，必须坚决采用适当的组织形式保护党的组织和干部。巩固下层组织的基础——党的支部，以便使各地党的组织既不致遭到破坏，又能积极领导当时的斗争。

为此，中央于一九二八年五月十八日发出了《中央通告第四十七号——关于在白色恐怖下党组织的整顿、发展和秘密工作》。在发出这个通告时，秋白已经离沪出国，恩来也可能刚离沪出国。他们二位对发这个通告有没有提出什么具体建议，我已记不得了。在这个通告中，提出了关于整顿组织与秘密工作的九项办法，要求各级党组织特别予以注意。这九项办法可以说是许多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用鲜血换来的经验，今天读起来，仍感到它的重要意义。

例如第二条办法说，在秘密环境之下务使党的组织适合于这一环境，使敌人不易破坏党的机关与组织，或者破坏一部分而不致连带到其他的部分。因此，以后凡超过五人以上的支部必须按职业或工作部门分成支分部，每一支分部的同志不必知道其他支分部的同志，支部只开支分部书记联席会议或代表会议以代替支部全体大会。除负责同志外，一个党员只知道五个同志，一遇破坏，也不致影响全部组织。如支分部超过六人时，亦须分组开会，开会时务须特别注意秘密技术。支部书记须设正副二人，干事会亦须有候补委员，一旦发生破坏能有人继续工作。

又如第四条办法说，为健全指导并卫护指导机关起见，以后区市县委须各预备一候补书记和一二内部工作人员，他们平时应少与普通同志发生关系，不出席执委以下的各种会议而偏重于内部工作。在书记被捕或平时向外活动委员发生问题不能继续工作时，他们能够代替前者的工作。再则，县执委委员必须轮流到所属县区党部巡视工作（广东、湖南等省须有五六个巡视员，其他省份须有二个或二个以上的巡视员），常会所在之地至多留三人。只有这样，才可以加强对各地的实际指导，同时又可避免原组织全部被破坏的危险。以后当地上级对下级的指导非十分必要时不应用书面形式，执委委员的姓名不必向普通同志公开，出席各种会议时只讲代表机关不必宣布个人的姓名。

再如第七条办法说，过去许多割据区域的党组织与负责同志常常忽视秘密工作，以为“既然被我们割据了便永远（是）C·P·（共产党）的天下”，因此把党的一切机关都公开起来，负责同志也常常把自己的“官职”公开，以致反动局面临头，公开机关便全部被敌人破坏，负责同志和干部也全不能立足或遭敌捕杀，以后应特别注意纠正这种现象。在割据区域的党组织固然应当公开一切党的活动，但必须保留一部分秘密的机关和负责同志，以便在敌人进占后我们可以继续活动。

这些办法下达以后，对于整顿和发展党的组织，加

强党的秘密工作，起了很好的作用。

在四个多月的留守工作中，中央除了与山西、陕西、四川、云南等省事实上断绝了关系以外，曾通过各种方式如和一些省委的代表接谈、给一些省委写指示信和派人到省里去巡视等，对各省都进行了个别指导，并根据当时的政治形势发了一些通告、决议，给各省的工作提出了总的指导方针。在中央（留守）、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群众的共同努力下，当时的工运、农运、兵运、反日运动、党的改造等方面都取得了一定的成绩。

一九二八年十月五日，毛泽东在《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一文中说：“最近数个月来，工农阶级在共产党领导之下的有组织的城市罢工和农村暴动，在南北各地发展起来。军阀军队中的士兵因饥寒而酝酿着很大的不安。”“中国的民主革命的内容，依国际及中央的指示，包括推翻帝国主义及其工具军阀在中国的统治，完成民主革命，并实行土地革命，消灭豪绅阶级对农民的封建的剥削。这种革命的实际行动，在一九二八年五月济南惨案以后，是一天一天在发展的。”这是这个时期全国革命形势和党的工作的一个简要概括。

六、传达和贯彻六大的指示电。

在我们留守中央期间，出席六大的同志对国内工作是很关心的。曾发来一份《对国内工作指示的电稿》。电稿首先表示：“第六次大会无疑义的同意第九次国际全体

执行委员会会议的决议案。”^⑧电稿接着说：“现在第一个革命浪潮以屡次失败而完结，而新的浪潮没有来，党的总路线是争取群众、统一群众、团结群众于党的（周围的）主要口号，加紧日常工作，尤其是城市产业工人之中的工作。利用帝国主义对中国民众的一切暴力的机会，要激动一切阶级冲突并使之深入。”^⑨电稿又说：“必须与主要口号同时提出工农运动的部分口号。党与群众脱离是主要的危险。全国范围之内暴动只是宣传的口号。坚决的反对盲动主义，决不能削弱农民的游击战争之指导。必须扩大苏维埃的根据地及加紧组织红军。”^⑩电稿最后还说：“最大限度的引起群众于反帝国主义运动，使这种运动与反国民党反军阀的斗争相联结起来，然主要的任务仍旧是推翻帝国主义的统治，实行土地革命，力争工农民权独裁制的苏维埃的政权，继续坚决的改造党。”^⑪我们收到这个电稿后，曾进行反复讨论，并按照来电的要求，发到各地进行了讨论。这样，就及时地传达了六大精神，指导了全党工作。看来这个指示电反映了六大总的精神和方向，是在大会有了结论时发出的。

七、关于《中央通告第五十四号》。

一九二八年六月二十一日，中央（留守）从实际情况出发，起草了《中央通告第五十四号——国民党军阀打下平津后的形势和深入反帝运动复兴城市工作问题》。当时，国民党军队已经打下了平津，蒋介石政府已发表

了对内对外宣言，豪绅买办阶级军阀内部的冲突、帝国主义的态度、一般民众对国民党的感觉，都较前明朗起来。中央（留守）第五十四号通告在分析了这一形势之后指出：

“现在是我们发动反帝高潮，复兴城市运动的时机，我们要全体动员参加反帝运动推进反帝运动，……主要的路线是深入群众运用工人统一战线的策略，我们在这个运动中要时时增进反国民党的意识和行动，但我们的方法是曲线的，不是一开始便很简单的叫打倒国民党吓跑了群众，因为群众的反帝运动和自身斗争能够起来，必然的走到反国民党。”

通告接着说：“当此我们在城市没有基础的时候，我们要有独立的政治宣传和批评，不断的指出群众的出路，但我们却还没有力量以C·P·的名义公开的领导群众运动，因此我们的行动只有潜伏在群众里面，愈能深入群众，则愈能取得群众而愈能建立党在群众的基础。中央曾坚决的严厉的批斥有些党部想以激烈的行动（打杀）发动群众运动，因为这是脱离群众，不要群众的拼命主义。”

通告接着又指出：“现在日本帝国主义在满洲、山东的侵略和屠杀正在一天紧似一天，国民政府的外交更是一天软弱一天，以收回满洲和山东主权为骨干的反帝运动，更可以大大做起来。同时民权运动已经是一切城市民众的迫切要求”。因此，关于我们党在当时的的工作，中

央（留守）除提醒各地党组织仔细地执行中央已经发出的四次通告外，又进一步作了八条指示。

第一条是：“把反帝运动和民权运动汇合起来并且联系到工农小资产阶级本身利益的斗争以发动城市广大的群众特别是复兴城市运动。”在这条指示中，提出了十七项总要求作为当时群众运动的总目标。其中，除了提出“要求外交公开”、“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收回山东满洲的主权”、“驱逐在华帝国主义的海陆军”、“反对军阀战争”、“释放一切争自由争国权的政治犯”、“工人有自己组织工会宣布罢工之自由”、“没收地主土地交给农民士兵耕种”、“废除一切苛捐杂税”、“贪官污吏处以极刑”等等以外，还提出了“要求恢复民众运动”、“实行民众政权”以及“召集国民会议选举全国政府，国民会议由工农小商人学生自由职业者等民众自己选举的团体派出代表及军队以连为单位由士兵选举之代表组织之。反对御用的包办的国民会议”等条文。通告说：“这些要求自然不能算作我们的政纲，这只是我们用以发动群众的口号，使之成为目前民众的要求，在这种要求之下起而斗争，从斗争中扩大群众组织的基础和斗争的力量，更加明确其反国民党的意识而有反国民党的决心和勇气。总之这些要求特别是复兴城市运动的策略。”

第二条是：“中央另外以党的名义发一宣言指示民众目前的出路和应有的要求，口号比上面更直接，因为这

是党的立场说话与上面要民众采用由他们此时自己提出者不同，各省委各市委各县委特委应根据那个宣言用党的名义发出宣言，总的原则和态度不能逸出中央宣言之范围，但必须把中央宣言所提出的要求，依据当地的事实化成更具体而切实的口号。这样的宣言要设法多多的散到工人、农民、士兵、学生、小商店中去，同时要注意使党的要求变为各种民众自身的要求自己发表出来，由口号而变成行动。如果在开始的时候某种群众尚不能完全接受我们的党的宣言所指出的要求，那么至少限度须使他们采用本通告所指出之要求，从他们自己队伍中叫出来方有意义。”

随后，通告就宣传鼓动工作、城市工作、党内组织动员工作、农村工作、国民党内反对派问题等一一作了指示。在这些指示中，对中华革命党（当时我党称它为第三党，其领导人物是宋庆龄、邓演达、谭平山、陈友仁等左派人士）的分析和策略是有明显的错误的。一九二七年底，宋庆龄、邓演达、陈友仁等以“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的名义在莫斯科发表了一篇宣言。宣言痛斥了蒋介石、汪精卫背叛革命的罪行，决心为实现孙中山的三民主义革命纲领而斗争。但是，通告却认为第三党的宣传是“虚伪”的，最后他们“当然成为蒋介石的走狗”，因此“我们党从中央以至地方须尽可能从理论上给他们以打击，同时对党内外群众指明他们的虚伪的

狐狸面具”。除此之外，其余各项指示大体上是正确的。例如第四条指示说：“在城市工作主要的是如何扩大工人组织（不一定叫做工会）发动工人斗争，取得广大的工人群众。有黄色工会或反动工会的地方并且要注意运用工人统一战线打入他们的群众中去。再则如何进行或开始士兵运动和学生运动，求其发展。C·Y·更要加紧学生和青年工人的运动。再则对小商人须时时提出代表他们利益的要求引他们参加反帝运动和民权运动，使他们日益脱离国民党的影响而倾向我们。”

当时，中央（留守）的文件都经过共产国际驻中国的代表转报国际和六大主席团。共产国际曾来电对五十四号通告进行严厉的批评。国际来电原文现未找到，但查到中共第六届中央执行委员会中央政治局第一次会议记录。这次会议结论认为五十四号通告“工作方法是对的，工作策略路线或政治路线是非常右倾错误的”。并建议国际代表即以紧急电报指示国内中央。

接到共产国际的来电后，我们经过研究，于一九二八年八月二日通过了《答复国际来电的决议——对国际批评五十四号通告的回答》。在这个决议中，我们对国际来电作了八条答复。即：

（一）“与54号同时发出的有中央宣言（已寄来），宣言中提出二十余口号‘打倒国民党’‘暴动推翻豪绅政权’‘建立工农兵苏维埃政权’等都有。在54号通告中指明各

级党部须尽可能使中央宣言的口号变成群众自身的口号，在落后群众中，至少亦须采用通告中的口号。”

(二)“中央在宣言布报（布告）及行动大纲等其他文件都主张‘自动的恢复民众运动’实际各地发动群众亦不是经过要求国民党的形式。”^⑫

(三)“中央在最近几个月中指示各地党部发动群众斗争，在斗争时抓住公开活动的机会，使公开工作与秘密工作联系起来，反对旧时离开群众的秘密方式，同时又反对幻想在国民党谅解下的合法运动。”

(四)“在反帝运动中和工农斗争中，党都随时揭破国民党的假面具提出打倒国民党的口号并取得了群众的欢迎。”

(五)“第三党在一部分学生中有点信仰，党久已公开的与第三党奋斗。”

(六)“54号通告提出‘工农兵及城市穷苦小资产阶级代表会议的民众政权’其内容本即是‘工农兵城市贫民代表会议’的意思，‘民众政权’四个字不妥当加改正，但党的公开口号始终是‘苏维埃政权’。”

(七)“国民会议的口号在五十四号通告中原是一种策略，但在宣言中素来即是‘反对国民会议’的口号，以后当继续在群众中宣传，反对御用的国民会议以揭穿国民党的欺骗。”

(八)“现在全国城市运动已有活跃的现象，党的独

立的宣传异常重要，中央虽历次督促，但各地对此工作仍缺乏，今后当更加紧此方面工作。”

中央（留守）对国际来电作了上述八条答复以后，并于八月十一日，发出《中央通告第六十二号——目前党的根本策略与政治宣传鼓动》，其中规定“目前政治上的中心口号”共十八条。这些口号包括：“一切土地国有”、“打倒卖国的国民党”、“打倒替资产阶级作走狗欺骗群众的第三党（中华革命党）”、“武装暴动是工农兵的出路”、“反对御用的国民会议”、“‘苏维埃’是工农兵自己的政权”，等等。关于对这些口号的运用，通告作了三条规定：“第一，利用每次群众运动和一切可能接近群众的机会，向群众宣传。第二，用党和团或秘密工会的名义口头的或文字的不断的向群众宣传，并加以解释。第三，这些口号当然不要与日常的经济口号及临时事件的口号隔离，而要使之联贯一气。又五十四号通告中‘民众政权’及‘召集国民会议’二口号须停止宣传，因为足以混淆工农对苏维埃政权的意识。”

从第六十二号通告的内容来看，当时中央（留守）已经接受了国际来电的批评，并在实际行动中有了表现。

现在回过头来看，对共产国际来电和六届中央政治局批评五十四号通告策略路线和政治路线右倾，我申述下列的见解：

(1)口号问题。党的口号历来分宣传、鼓动两种。宣传口号带战略性、纲领性，表达一个阶段的革命目标和革命任务，以教育和提高广大群众的革命觉悟水平；鼓动口号带策略性和临时性，是直接根据群众的觉悟程度和迫切要求，能够即时发动他们起来斗争的口号，引导群众从切身利益的斗争中逐渐认识党的宣传口号的正确加以接受而为之奋斗。中央（留守）一方面用党的名义公开发表宣言，提出“打倒国民党”、“暴动推翻豪绅政权”、“建立工农兵苏维埃政权”等口号；又一方面发出五十四号通告，提出一些带策略性的口号，是有意区别这两种口号的。

群众的觉悟程度往往有进步、中间、落后的区别，一般是两头小，中间大。我们必须从多数群众的觉悟水平出发，提出恰当的斗争口号。对于落后群众，也应当争取他们。但当多数群众的觉悟程度还处于比较落后的状态时，比如多数群众还对国民党存有幻想，坚持要向它提出实际上不能实现的以至政治上不适当的要求（如“召集国民会议”等等），我们应当怎样办呢？是退出运动，撒手不管，甚至与群众对立起来呢？还是始终同群众一道并领导他们前进，一方面，深入细致地进行宣传教育工作，另一方面，从实际的经验教训中帮助他们提高对国民党的认识，提高政治觉悟？当然应当采取后一种态度。因为群众的觉悟主要是靠从自己亲身的经历中提

高和发展起来的。但在“左”倾领导时期，我们还不懂得这条群众路线的领导艺术。

五十四号通告指示，提出斗争口号时要根据群众的觉悟程度，“我们在反帝运动中要时时增进反国民党的意识和行动，但我们的方法是曲线的，不是一开始便简单的叫打倒国民党吓跑了群众，因为群众反帝运动和自身斗争能够起来，必然的走到反国民党。”这个策略指导思想，在当时情况下，我看是正确的。问题在方法上，不是指导下级组织从当时当地多数群众的觉悟程度和要求出发，而是由中央一般地、主观地规定一些意在照顾觉悟程度较低的群众的口号，而且大都是采取向国民党反动统治提出要求的形式，这是不适当的，有错误的。

（2）“工人统一战线”问题。五十四号通告提出了“运用工人统一战线”的策略，指出：“有黄色工会或反动工会的地方，并且要注意运用工人统一战线打入他们的群众中去。”这是正确的，在当时尤为必要（关于这个问题，我在前面已作过一些论述）。中央（留守）在一九二八年六月四日给江西省委信中说得更加透彻。该信写道：“至于你们对于黄色工会的意见中央仍然不能同意。中央现在的策略，黄色工会如果是有群众的时候，我们必须加入到里面去活动，以公开的地位接近其群众，领导他们作日常的斗争，从斗争中揭破黄色工会的假面具，获得其群众。至于在宣传方面，我们当然要公开的

批评黄色工会的欺骗，但是不能够简单的站在群众以外笼统的提出打倒或反对黄色工会的口号。至于对于空招牌的反动工会天天去压迫欺骗工人，我们当然要无条件的号召群众起来推翻它。过去各地对于黄色工会的态度，一方面自己未去做职工运动组织群众领导群众斗争，一方面又不管是有群众的黄色工会或无群众的黄色工会，一概笼统地机械地提出打倒的口号，结果黄色工会并不因为我们的反对打倒而受任何影响。事实上，工人群众因为得不到出路反而一天一天接受黄色工会偶然的欺骗而受其影响。这从上海的教训告诉我们这种政策是错误的，希望你们仔细考虑此问题。”

我认为中央（留守）的这些意见是正确的，与六大《职工运动决议案》的内容也基本一致。中央（留守）提出的“工人统一战线”策略，很明确不是要同反动上层搞统一战线，而是要在工人之间结成统一战线。可惜六大职工运动决议说“此时不宜提出‘统一战线’的口号”^⑬，而六大后新中央对“工人统一战线”这个口号则正式予以批判和否定^⑭，自此以后，我们的职工运动长期遵循着赤色职工国际“左”倾路线，跳不出来。

（3）对待第三党的问题。否定统一战线的“左”倾策略，还表现在对待第三党即中华革命党的态度上。第三党的发起人亦即他们当时的领袖人物，如前所述都是真正的左派分子。他们的政治主张有妥协性的一面，如

不满意共产党所谓“超过时代”的政策，主张“工农小资产阶级政治同盟”，对土地革命主张和平地合法地没收地主土地，对国民党主张恢复民二时代的中华革命党。但他们反对国民党“在朝派”，不反对共产党，而“标榜以孙总理及其主义为圭臬”^⑮，并想与共产国际发生关系。对于他们，为什么不应该采取积极争取和联合的政策，反而只采取斗争，而且是公开的斗争的手段呢？在这个问题上，当时中央（留守）的策略也是错误的。但中央（留守）的错误仍然来源于共产国际，因为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九次扩大会议《关于中国问题的议决案》早已预断他们是“蒋介石及其他工农刽子手的走狗”^⑯。

综上所述，第五十四号通告虽有错误，但总的来说，是比较正确的，决不是政治路线上的右倾。而国际来电和六届中央政治局的批评则是过分的。他们进行政治批评的出发点基本上是“左”倾教条主义，是反对争取和联合民族资产阶级与城市上层小资产阶级。这一点，下文我将谈到。

我对六大的几点看法

我没有参加六大，对六大的具体情况我不清楚，不可能作什么回忆。下面根据学习有关文献，提出几点看法。

关于对六大的评价，过去是有不同看法的。直到一九四四年在延安学习两条路线斗争问题时，在一部分同志间仍有分歧，有争论。后来，统一于党的六届七中全会通过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

我完全同意《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毛泽东《学习和时局》以及周恩来《关于党的“六大”的研究》中一致肯定的，六大大会的路线基本上是正确的结论。这是经过长期历史证明了的。

同时，上述文献，在一致肯定六大路线基本正确后，又都指出六大有缺点和错误。几十年的历史也证明了这些评价是正确的。

那么，这些文献是怎样评论六大的缺点和错误的呢？

《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指出：“它对于中间阶级的两面性和反动势力的内部矛盾，缺乏正确的估计和政策；对于大革命失败后党所需要的策略上的有秩序的退却，对于农村根据地的重要性和民主革命的长期性，也缺乏必要的认识。”^{①⑦}

在《学习和时局》中指出：“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亦有缺点，例如没有指出中国革命的极大的长期性和农村根据地在中国革命中的极大的重要性，以及还有其他若干缺点或错误。”^{①⑧}

在《关于党的“六大”的研究》中指出：六大“在具体

的实际的问题上犯了许多错误：一、不认识中国革命的特点是农民斗争与武装割据，中国革命的中心问题是农民土地问题。二、不认识中国阶级关系变化的复杂性，没有把策略观点着重放在争取中间阶级上。三、不认识革命形势发展的不平衡性，因而没有重视农村工作与建党工作，虽然当时还不可能产生乡村包围城市的观点。四、没有更认真地总结过去的经验教训，从而认识武装的重要，以武装建党、建政、做群众工作，这些，毛泽东同志当时已经做了。所以说，‘六大’是有原则性的错误，对以后发生了坏的影响。”^{①9}

恩来是“六大”的主要负责人之一。他在《关于党的“六大”的研究》中，揭示了六大本身的一些重要事实和他评论六大的一些重要论点。但是，他和其他在中央工作的同志（周恩来、李立三、龚饮冰等），回国后在传达六大或关于六大的谈话中，很少提到这些。我想这可能是由于历史的局限，一是认识的局限，二是为了团结全党为六大路线奋斗，当时有许多实际情况要保密。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

我现在重新学习历史上的经验教训，认为六大的缺点和错误主要是“左”倾，又主要表现在两个重要战略性问题上：即城市中心论和反对民族资产阶级。现就这两个问题作些回顾和论述。

一、主张举行以城市为中心的武装起义。

六大《政治决议案》提出了“争取群众，准备武装起义，以推翻地主豪绅资产阶级政权”^{②①}的总方针，并说：“争取群众的任务，就是准备武装起义的任务”^{②①}，“党底总路线是争取群众，党要用一切力量去加紧团结收集统一无产阶级底群众，使他们围绕着党底主要口号”。^{②②}（着重点是我加的，下同。）这些当然是正确的。

但《决议案》又指出：“反动的统治在各区域巩固的程度是不平衡的，因此在总的高潮之下，可以使革命先在一省或数省重要省区之内胜利”^{②③}。同时又说：“这里，城市领导作用底重要，和无产阶级群众底高潮，都将要表显它的决定胜负的力量”^{②④}。这些论点都表明《决议案》提出的武装起义，是以城市为中心的。当时，毛泽东关于中国革命要走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的理论，还处在探索和孕育的过程中，关于武装起义还只知道巴黎公社和俄国十月革命的经验，广州起义就是这种经验的再现。总之是搬用了外国的经验。

其实，实行以城市为中心的武装起义这个观点，在一九二七年十一月临时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的《中国现状与共产党的任务决议案》中，在一九二八年二月共产国际执委第九次扩大会议通过的《关于中国问题的决议案》中，以及在六大的《政治决议案》中，基本上是连续一贯的。六大决议批评了瞿秋白“左”倾盲动主义的一些具体特征，却没有批评临时中央政治局十一月扩大

会议《决议案》的以下一段论述，即：“城市工人暴动的发展是非常之重要；轻视城市工人，仅仅当做一种响应农民的力量，是很错误的，党的责任是努力领导工人日常斗争，发展扩大群众的革命高潮，组织暴动，领导他们到武装暴动，使暴动的城市能成为自发的农民暴动的中心及指导者。城市工人的暴动是革命的胜利在巨大暴动内得以巩固而发展的先决条件。”²⁵ 更没有批评共产国际《关于中国问题的议决案》所说的这么一段论述：“党指导着各省区之农民自发的游击暴动，就应当注意到：这些农民暴动可以变成全国暴动胜利的出发点，只有在他们与无产阶级中心之新的革命高潮相联结的条件之下。”²⁶ 这是因为六大决议与十一月扩大会议决议以及共产国际一九二八年二月决议，所主张的都是搞中心城市的武装起义。

历史证明，这种中心城市的武装起义对中国革命的危害是很大的。李立三“左”倾冒险主义，正是坚决执行以城市为中心的武装起义论的错误，结果使党和革命遭受到很大的损失。比李立三的“左”倾冒险主义更“左”更冒险的城市中心论者王明等人，在把城市工作的资本几乎输尽以后，又要求红军进行最后决战，结果在一九三四年使党和革命遭受了类似一九二七年的大失败。

“城市中心”论的思想根源是教条主义。它不认识或不承认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这个根本特点，不了

解中国社会在经济上、政治上、军事上以及文化上的极大的不平衡性，不了解农民是中国革命的主力军，因此就不了解中心城市和交通要道都在帝国主义及其走狗中国军阀的武力统治之下，中国革命不能如俄国的十月革命一样走城市武装起义，夺取政权，然后进军农村的道路（这已有广州暴动的经验可以佐证）；而只有经过共产党领导农民利用经济、政治、军事等极不平衡的特点，实行武装斗争和土地革命，创立根据地和革命军队，走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全国政权的道路。虽然毛泽东已经创造性地探索了这条道路，大有希望地前进了几大步，取得了光辉的胜利，但教条主义者王明等，仍然不予承认，以致把革命引到失败。毛泽东当时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即已发挥和发展了党的四大关于无产阶级必须争取同农民的联盟才能领导革命到胜利的思想，肯定农民革命乃是“乡村的民主势力起来打翻乡村的封建势力”，是摧毁“帝国主义、军阀、贪官污吏的墙脚”的革命。他总结出“国民革命需要一个大的农村变动。辛亥革命没有这个变动，所以失败了。”他同时强调要“推翻地主武装，建立农民武装”。大革命失败后，他主张发展农民武装斗争。一九二七年七月，他说农民武装斗争有困难时可以上山。当有人主张集中农民武装在湘南建立一个师去援助八一起义军时，他主张把它留在湘南创立割据区。八七会议上他提出“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光辉

思想，八七会议后他亲自下乡领导秋收起义。而以后在长期实践过程中成功地开创了一条把中国革命引导到胜利的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在这个重要战略问题上，毛泽东思想的发生和发展表现了它紧密结合中国社会特点的一贯性和正确性。

二、反对民族资产阶级，排除小资产阶级。

早在一九二六年“三二〇”中山舰事件以后，共产国际和我们党的一些文件中就开始反对民族资产阶级。例如，一九二六年十一月，《共产国际第七次扩大执行委员会会议中国问题决议案》认为：蒋介石的三月二十日事变是民族资产阶级脱离革命联盟的开始，“革命运动已到了第三阶段之门”，即“无产阶级、农人及城市小资产阶级的结合”^{②7}之门。又如，一九二七年五月，《共产国际第八次执行委员会全体会议关于中国问题决议案》认为：蒋介石的“四一二”事变，标志“民族资产阶级离开了民族战线，跑到反革命的营垒去。”^{②8}再如，同年同月，《中国共产党第五次大会宣言》认为：“蒋介石及其部下的行动，自三月以后都是反对国民革命的，他们的行动决非个人的行动，乃是代表了一个阶级——民族资产阶级。”^{②9}

至于当时的“武汉国民政府及左派国民党，就其主要的趋势看来，是城乡小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的革命联合之表现。”^{③0}在以汪精卫为首的武汉国民党和武汉政府

判变以后，当时的中央领导机关又进一步认为：“城市底上层小资产阶级，极大部分是和封建的土地关系有密切的联系，并且同外国资本相关联。这种小资产阶级分子动摇而背叛革命。”^{③①}

党的六大并没有把民族资产阶级和买办资产阶级加以区别。也没有认识到民族资产阶级的不少分子虽然一度附和了反革命，但他们并没有取得政权和发展民族资本主义经济的条件，因而他们与帝国主义、地主买办阶级仍有矛盾。六大把国民党的反动政权断定为“地主、军阀、买办、民族资产阶级底国家政权”^{③②}，认为“中国之反对帝国主义的、彻底变更土地制度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只有反对中国民族资产阶级，方才能够进行到底，因为民族资产阶级是阻碍革命胜利的最危险的敌人之一。”^{③③}同时，对于城市小资产阶级，六大虽然认为“对于反帝国主义反军阀的运动，是要引进城市小资产阶级的参加”^{③④}，但又说中国革命的动力，“现在只是中国底无产阶级和农民”^{③⑤}，即把城市小资产阶级也排除在动力之外了。

党的五大和五大以后反对民族资产阶级，党的六大和六大以后进一步排除小资产阶级。特别在以教条主义者王明为代表的“左”倾冒险主义统治期间，这种政策发展到极点，使党和革命受到了极其严重的损害。这种“左”倾的阶级政策，直到一九三五年十二月瓦窑堡会议

及其以后才得到彻底纠正。

到了解放战争时期，毛泽东在《关于民族资产阶级和开明绅士问题》一文中，对阶级政策问题作了完整的分析和结论。他指出，中国的资产阶级有大资产阶级和中小资产阶级之分。大资产阶级即官僚买办资产阶级，历来是革命的对象。“一切受迫害、受限制的民族资产阶级，即中小资产阶级。”^{③⑥}“这个阶级曾经参加了一九二四年到一九二七年的革命运动，而在一九二七年到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变以前），他们中间的不少分子，曾经附和了蒋介石的反动。但是，决不能因为这一点，就认为那个时期我们在政治上不应该争取他们，在经济上不应该保护他们；就认为我们在那个时期内对民族资产阶级的过左的政策不是冒险主义的政策。相反地，那时我们的政策，仍然应当是保护和争取他们，以便我们能够集中力量去反对主要敌人。”^{③⑦}

产生这一错误的思想根源，也是教条主义，也是由于不认识或不承认中国的特殊国情，因此，就不了解不承认民族资产阶级（包括中等资产阶级和上层小资产阶级）在政治上的两面性，即既有革命性一面，又有妥协性一面。这种两面性，是他们“从娘肚子里带出来的老毛病”^{③⑧}。是同时存在不可分离的，只是在不同的历史条件下，表现为这一面或那一面占主导地位。历史实践正是这样证明了的。其实四届三中全会上的中央政治报告和

毛泽东在《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中，都早已指出民族资产阶级具有两面性的特点。毛泽东由此在实践中创立和发展了对民族资产阶级又联合又斗争的理论和政策。但是右倾机会主义者认为民族资产阶级只有革命性的一面，因而对他们节节退让，而“左”倾教条主义者拒不承认民族资产阶级有革命性的一面，坚持一切斗争、否认联合的“左”倾错误到底。

上述两个战略性的“左”倾错误观点——城市中心论和把民族资产阶级混同于买办资产阶级——及其实际影响，直到遵义会议后，在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新的中央的正确领导下，才获得纠正。

必须指出，六大的这些缺点和错误，虽然被后来的“左”倾思想片面发展和极端扩大，但仍然不足以掩盖第六次大会的主要方面的正确性。因此，党在这次大会以后一个时期内，即到六届四中全会以前的工作，是有成绩的。六大已作为在大革命失败以后的历史转折关头召开的一次具有重要历史意义的大会而载入我党的光荣史册。

注 释

① 周恩来：《组织问题报告和结论》（一九二八年六月三十

日)。

② 这个材料可能有超过实际之处，现在没有找到核证的材料，但革命斗争正在复兴，则是可以肯定的。

③ 《组织问题报告大纲》(一九二八年六月三十日)。

④ 《中央通告第四十五号——“五三”惨案后反帝斗争工作》(一九二八年五月九日)。

⑤ 《中央通告第五十四号——国民党军阀打下平津后的形势和深入反帝运动复兴城市工作问题》(一九二八年六月二十一日)。

⑥ 《中央关于城市农村工作指南》(一九二八年七月二十六日)。

⑦ 关于结拜兄弟姊妹的问题，六大《职工运动决议案》中说：“中国原有的许多工人群众自己的互助组织和斗争组织，如青帮等所谓‘抱义气’的组织，现在严重反动之后，甚至赤色工会会员也自己退而组织‘兄弟团姊妹团’等原始形式的组织——‘抱义气’的组织。这些方式党固然应当努力去领导和运用——这是群众深处自动发展的斗争方法；但是他们的短处便是复古到小的秘密结社，而不去创造或巩固赤色工会。党应当经过党团领导这些组织实行斗争，而在斗争的过程中领导这些组织，使他们合并统一团结到赤色工会的组织方面上来。”(引自中央档案馆编：《中国共产党第二次至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汇编》，第 272 页)

⑧⑨⑩⑪ 中央档案馆编：《中国共产党第二次至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汇编》，第 280 页。

⑫ 六大后的新中央对“恢复民众运动”的口号也是有不同看法的。一九二八年九月十八日《中央通告第三号——目前革命形势与党的战术和策略》在谈到当时“几个战略上的错误的倾向”时说：“认为现在部分群众的政治意识非常落后，现在党的战略上的口号太高，群众暂时不能接受，所以党应该把政治的口号降低（如主张党的口号可以与第三党大略相同或主张‘要求恢复民众运动’的口号，对国民会议根本不反对，只反‘善后会议’式的国民会议，而要求工农小资产阶

级的国民会议，又如对反国民党的动摇等），所以党的政治口号应该看群众接受的程度来决定这一偏向，实在含有莫大的危险，很可恢复到过去的机会主义。”

⑬ 六大《职工运动决议案》对这个问题是这样说的：“许多有工人群众的反动工会、改良工会、行会工会中，如广州的机器工会，广东总工会及上海几个工会（英美烟公司工会、商务印书馆工会、邮务工会、南洋烟草职工同志会等）中我们是应当到里面去作工的。我们同志并不是要加入政府或国民党所指导的反动工会的上层机关，乃是要在这些工会下面所组织的群众之中工作。若不派遣工作同志到这些工会中去，那就是我们对这一部分重要的工业无产阶级抛弃在反动的影响之下。无情的揭破反动领袖出卖阶级性，在群众面前揭破他们的法西斯面具，应当夺取这些工会中的群众，彻底的破坏反动工会，但此时不宜提出‘统一战线’的口号。”（引自中央档案馆编：《中国共产党第二次至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汇编》，第267～268页）。

⑭ 六大后的新中央于一九二八年九月十八日发出的《中央通告第三号——目前革命形势与党的战术和策略》中说：“我们不应采取‘统一战线’的口号，因为这些口号可以引起工人群众对于国民党工会的幻想，应普遍的发展工厂委员会（另有通告说明其作用），把在国民党及改良主义影响之下的工人群众完全夺取到我们方面来。”

⑮ 《中央通告第五十四号——国民党军阀打下平津后的形势和深入反帝运动复兴城市工作问题》（一九二八年六月二十一日）。

⑯ 《六大以前》，第934页。

⑰ 《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910页。

⑱ 同上，第893页。

⑲ 《周恩来选集》上卷，第186～187页。

⑳ 中央档案馆编：《中国共产党第二次至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汇编》，第213页。

㉑㉒ 同上，第222页。

- ②③ 同上，第 221 页。
- ②④ 同上，第 221~222 页。
- ②⑤ 《中共党史教学参考资料》(一)，人民出版社 1979 年 2 月版，第 130 页。
- ②⑥ 《六大以前》，第 933 页。
- ②⑦②⑧ 《六大以前》，第 625、807 页。
- ②⑨ 同上，第 821 页。
- ③⑩ 同上，第 809 页。
- ③⑪ 中央档案馆编：《中国共产党第二次至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汇编》，第 215 页。
- ③⑫ 同上，第 211 页。
- ③⑬ 同上，第 212 页。
- ③⑭ 同上，第 225 页。
- ③⑮ 同上，第 212 页。
- ③⑯ 《毛泽东选集》第 4 卷，第 1230 页。
- ③⑰ 同上，第 1232 页。
- ③⑱ 《毛泽东选集》第 1 卷，第 133 页。

(刘经宇、叶心瑜、颜广林协助整理)

山西抗战的回忆

任弼时

(一) 晋北战线的形势与山西 在抗战中的地位

当八路军进入山西的时候，平绥线上的敌人已经攻破了南口、张家口，占领了大同，正向晋北屏障——雁门关东西长城各口进攻，企图乘势攻破长城隘口，逼取太原。而在平汉线上亦正积极进攻保定，期与平绥之敌取得配合呼应，齐头夺取石家庄。据平型关战斗中夺取的文件说明，当时敌之主力还是用在晋北方面的。

因为雁门关及其东西附近地势险要，而且构筑了比较坚固的国防工事，敌知正面攻夺之困难，仍以攻占南口、大同之经验，在正面以其一部向雁门关及其东西之杨芳口、茹越口佯攻，用其主力绕由蔚县向国防工程较为薄弱之平型关进攻。企图突破平型关绕至雁门关以南，则雁门关可不攻自破。

当时的形势是严重的。因为前线退守雁门，长城各

口的军队已相当疲劳，如果雁门长城各口被突破，敌有很大可能逼近甚至夺占太原，这将要影响整个华北的战局。

山西自雁门以南、井陉娘子关以西系高原多山，对保卫华北，支持战局有极重大的意义。敌人要完成其军事上占领华北，非攻占山西不可。如山西高原全境保持我军手中，则随时可以居高临下，由太行山脉伸出平汉北段和平绥东段，威胁敌在华北之平津军事重地，使敌向平汉南进及向绥远进攻感到困难，故山西为敌我必争之战略要地。

依托山西宽阔而复杂的地形条件，不仅便于防阻和迟缓敌之前进，且利于我们部分的消灭敌人。因为敌人的攻击要依靠其重兵器——坦克、大炮、飞机，发挥其性能。这在山西的地理条件上，大大地减少了作用，甚至失去作用（如坦克、重炮在某种地形限制下不能使用），而极利于我们进行运动战来打击或部分地消灭其有生力量。在全国范围来说，上海、津浦和平汉三方都是平原，交通便利，利于武装齐备之日军进攻，山西方面地形交通限制了敌人之长处，恰又补足我们的短处，便于我们的防守、持久斗争与打击敌人。

如果我们从研究抗战经验教训的观点出发，我们觉得，在整个抗战布置，至少是华北抗战布置中，没有清楚认识到保卫山西的重要战略意义，而未能以更多的精

锐部队首先使用于山西的保卫，这是造成后来山西失利致使整个华北局势处于不利的一个重要原因。否则，雁门关长城各口也不致那样快就被突破，还可能在比现在有利的局势下支持更长久的斗争，并且可给敌以更多的打击，华北局势也必比今天不同。

（二）八路军作战的方针和 平型关的胜利

八路军是在支持华北抗战的斗争任务下开进山西的。它是编入第二战区战斗序列，协同该区内一切我国抗日友军来进行战斗的。

在晋北战线严重局势下，八路军成为这一战局的一支生力军。所以八路军入晋时，得到了群众的热烈欢迎与拥护，同时对于华北前线抗战军队与全国人民是一种极大的兴奋；并对我们寄托着极大的期望。路透社的电报也带着警告式的口气说，日军还没有开始与中国有名的红军作战，而红军正准备着与日军长期奋斗。

当时我们认为，与日本军队作战是一种弱国劣势兵器的军队与优势兵器的帝国主义国家的侵略军队作战，单纯采取正面防堵，依靠坚固阵地与敌对战是不适宜的，而且我们的消耗将比敌人还要大。我们认为应当采取新的战法，求得能消耗敌人，使敌人疲于应付，使战争能

持久，这就是利用山西有利的地形和群众条件，发挥我军历史上养成的特长——机动、果敢、迅速、秘密的运动战和游击战，同时组织和武装广大的民众，开展广泛的民众游击战，以这样的作战方针来配合我国其他部队，达到保卫山西、支持华北战局的任务。

在这样的作战方针下，取得了平型关战斗的胜利，以及在敌人侧后取得了大大小小的战斗的胜利。平型关战斗，的确是给了敌人主攻方向以有力的打击，部分的更动了敌人的作战部署。可惜在这一战役中的军队，没有取得很好的配合，未能一举将敌歼灭，使我们能够顺利地扩大战果，绕击进攻茹越口之敌。而茹越口终于在几天后被敌人攻破。敌人从茹越口绕至雁门、平型险口之侧，后使这些险口终不能保，晋北屏障乃为敌所占。

平型关的胜利告诉我们，日军并非是不可战胜的敌人。它虽是组织完备有训练有战斗力量的军队，但是它仍有很多的弱点。它的步兵攻击精神并不旺盛；它疏忽于侧后的警戒；它占的阵地并非不能攻破；它运动起来很迟钝；在它轻敌的观念下产生许多可乘之机。特别是山地作战，以中国军队的勇敢牺牲精神，是可能给它以打击和战胜它的。平型关的胜利，给抗战的军队和爱国人民一种很大的兴奋，并且大大地提高了自信心。

敌在平型关受挫，发现劲敌是八路军以后，也就不相当地改变自己的战术。它常用的支队包围或远离

主力迂回我军侧后，逼我正面混乱撤退的战法，因怕我们在运动中消灭它，也就不敢轻易采用了。当它久攻忻口不能突破的时候，也未曾采用两侧山地迂回的战法，而在别种情况下是必然采用的。

（三）忻口抗战的经过

在雁门关长城各口失陷后不久，保定、沧州相继失陷，平汉线上的国民党军队撤至正定、石家庄，敌进攻华北的第二步作战计划已完成，并开始了它的第三步计划——攻占太原、石家庄、德州，驱逐中国军队于黄河以南，完成其军事占领华北的侵略意图。为着最后努力保卫太原，主力部队于此时向晋北开进。在晋北之崞县、原平、忻口的激烈战斗相继开始了。崞县、原平都经过一星期的固守。我们对于崞县，特别是原平守城的晋绥军那种英勇壮烈牺牲精神是非常钦佩的。由于他们的英勇抵抗，从正面迟缓了敌人的前进，使增援的生力军得有充裕时间集结于忻口，使忻口后来能够坚持将近一月的抗战。

敌深入雁门关以南作战，其后方交通愈加延长。当时，不仅同蒲路北段因车辆南移不能利用，且平绥路因被破坏一时也不能利用，它依靠汽车和牛马车的力量运输。其主要运输线是经雁门至大同和经平型关、灵邱、

广灵、蔚县至张家口的两条汽车路。敌人不仅要供给前线大量的弹药、汽油（坦克车和飞机用），而且粮食、菜蔬也靠后方供给，因此，后方交通成了敌人前线军队作战的重要生命线。

我们把扰乱敌之远近后方，破坏、切断敌之交通运输，阻断敌之接济与增援，作为我们配合我国主要部队作战的主要任务，而以一部协同我主力军作战，以期陷敌于孤军苦斗，求得在较长的斗争中，削弱以至最后消灭其主力，从而改变晋北不利的战局。

这时候，如果在晋北有充裕的生力军，能够抽出适当的精锐兵团组织得力的野战军，沿太行山伸出保定、南口间地区，作有力的活动，威胁敌平汉、平绥线策源地北平，断绝敌后路，调动敌于运动中给以打击，则是增加敌之困难，配合正面作战最有效的办法。在顺利情况下，可以逼迫敌人改变其作战计划，引起战局的变化，至少使敌难于迅速完成预定计划。可惜，当时缺乏这种精锐兵团来组织这样远出的野战军。

敌曾以全力猛攻忻口，遭到了忻口抗战部队猛烈之打击。忻口战斗是华北抗战中最激烈的战斗，郝、刘两将军^①在前线阵亡，卫立煌将军指挥下的全线部队，虽遭受重大伤亡，毫未动摇。许多忠勇将士的英勇奋斗，

^① 郝、刘两将军：指国民党第九军长郝梦龄和五十四师副师长刘家棋。

是值得每个同胞永远纪念的。

我深入敌远后方，在平型关、灵邱以北及在崞县、雁门关、大同间活动的部队，经过无数次的战斗，打击敌之掩护部队和运输队，夺获很多辎重汽车，彻底破坏公路。首先，将平型关、蔚县至张家口的交通线完全截断，并乘势克复平型关、繁峙、沙河、大营、灵邱、广灵、涞源、浑源、蔚县、阳原、易县、完县、唐县、行唐、平山等广大地区，进而搞乱与破坏平汉、平绥铁路。在雁门南北活动的部队，曾几次占领雁门关，将大同至崞县之汽车道上的桥梁、险隘、电线尽行破坏，阻挠、迟缓敌之增援，袭击敌之飞机场，迫使敌人疲于奔命，无法保持其安全。因交通中断，敌辎重部队亦不得不停止行动；或者用大的兵力，附工兵与重兵器掩护辎重部队节节修路前进；然中途仍须遭受我们不止一次之袭击，始能到达。待通过后，其交通联络仍被破坏如前。

敌攻忻口遭受严重打击，后路又被截断与扰击，曾陷于非常孤立、困难状况之中。弹药和一部分粮食，依靠飞机运送。因为炮弹、汽油缺乏，大炮、坦克不能大肆活动。士兵依靠抢劫当地的小米杂粮充饥。它当时已无力量攻破忻口阵地。但同时，我守忻口部队经过二十余天的战斗，又无新的生力军增援，要迅速消灭它亦不可能。但如果有长久的时日，逐渐消耗其力量，断其后方接济、增援，在我方增加新的生力军的条件下，消灭

其大部或逼其向后撤退，不是不可能的。

在晋北之敌处于危困待援的情况下，石家庄、德州相继失陷。敌乃以平汉线上的全部力量及津浦线上之一部沿正太路向娘子关、太原进攻，以策应和解除晋北敌人之危，完成其攻占太原的任务。由于晋东战况日益严重，我八路军为挽救东线危局，协同其他部队保卫山西大部领土之完整，乃以一部主力由五台以北急向东线转进。但在部队尚未到达预定地区以前，娘子关，旧关已被敌突破。我军虽有广阳，估尚有几日之战斗，然已无法挽回战局。寿阳失陷，太原已危，忻口抗战军队乃自动撤退，东北两面之敌得以会攻太原，太原亦相继失陷。

（四）我们动员群众的基本方针

对日抗战是一种自卫战争，也就是一种革命的战争。只有动员起全民族的力量，经过长期艰苦奋斗才能获得最后胜利。因此，我们把动员、组织和武装民众，视为在抗战过程中最重要的工作。几个月来的努力，在战区和敌人后方，发动了广大的民众，建立起大批的民众游击队和义勇军。这些民众的组织和武装，已逐渐成为抗战中一支强大的力量。

根据几月来的经验，动员、组织和武装民众，虽然

需要艰苦和深入下层群众工作，但收到动员群众的实效，并不是艰难的。

日寇的进攻，特别是日军的残暴，是我们动员、组织群众最好的资料。

日寇在疯狂的侵略政策下，采用一切征服殖民地最野蛮凶恶残暴的行为来对待我被占区域的同胞。每到一一个城镇，多将未逃走的居民杀去半数以上（崞县县城被杀者二千余人）。对政府职员和抗日领袖分子，则用火烧和活埋的方法处死。二、三岁的小孩亦为其俎上之肉。房屋大部被其焚毁。青年妇女几无不被其轮奸，奸死者不知其数，未死者亦多遭杀戮。且大批强征青年妇女以汽车运去（仅朔县维持会，就为日寇强征三千青年妇女）。最残酷者，莫过于最近高邑县之惨案。其经过是：十二月十九日，日寇到东塔镇强奸妇女，激起当地群众愤怒，群起抵抗。二十日，开来日军，将该村群众一百余人均以铁钩悬于树上，割开肚子，提出肠胃，复将人头击破，灌以洋油，燃火焚之，然后将房屋焚毁而去。

这种悲惨残酷的事实，是最能激发同胞的民族仇恨的。只要我们能够很好抓住这种日本的“王道”，加以“宣扬”，是容易把群众发动起来的。

要把发动起来的群众组成为武装斗争的力量，要使壮丁离开家庭参加游击队、义勇军，要使妇女抽出时间参加洗衣队、看护队，要使群众参加放哨、侦察，组织

担架运输队等。只要有人去指导、推动和帮助，群众是愿意的。我们看到，山西的人民是负担着繁重战争勤务的，然而要使他们参加抗战的积极性提得更高，使他们无所顾虑地向前干去，则应从各方面减轻他们自身的经济负担，减少一些捐税、地租和利息，在可能范围内改善人民的生活，优待直接参加武装斗争者的家属，这又成为发动、组织群众坚持斗争最重要的方法。

然而，要使抗战的军队能够成为动员群众的组织者和领导者，首先决定于这个军队是否能够为群众所爱戴。如果这个军队处处脱离群众，侵犯群众利益，甚至抢劫奸淫，使群众望而远避，这就无法接近群众，更无法进行动员、组织群众的工作，而且对军队本身的行动增加许多困难。因此，严明军队纪律，使每个战士都了解军队是人民的，自觉地爱护群众，使群众感觉为和蔼可亲的自己兄弟，这又是军队动员、武装民众的先决条件。

我们是本着这些方针与方法，协同当地政府、抗日团体与各军去进行群众动员工作的。在第二战区及山西当局阎百川先生领导下，所颁布的一些进步法令和战地动员的组织方式——战争总动员委员会，更给群众动员工作以极有利的条件。

（五）敌人远近后方的游击战争与 敌人对晋察冀地区的“围剿”

有些人感觉抗战中群众动员工作是重要的，但总以为这非三个月半年之后不能见效，但事实上并非如此。我们到晋后不到一个月功夫，在东北和西北区极大地激发了群众参战的热情，成立了大批游击部队。这些群众武装组织，今天还留在敌人的远近后方，协同我们的正规军队在晋察冀地区、晋西北及正太路以南地区，进行着顽强的斗争。他们已不仅能够配合正规军的游击部队行动，而且可以独立行动打击敌人。那些区域，可以说是军队与民众亲密结合起来，创立了与敌人持久斗争的坚强根据地。

在那些区域活动的我军及群众武装，开展了模范的游击战争。由于他们的积极行动，不仅使敌人后方交通时刻受到破坏与威胁，而且在广大的领域内，敌人无法建立其伪组织。敌人的小部队不敢进入游击区域，而游击区域又随着游击部队的积极活动更加扩大，游击队也发展得更多。几百万同胞，在这些武装力量的掩护下保全了性命和财产，没有遭受亡国奴的惨痛。

敌未攻入太原前，虽已感受到其远近后方被破坏骚扰而带来各种损失与困难，然而为着达成其攻占太原的

军事计划，不能分出大的力量以对付后方。在占领太原以后，迫使它不得不以大的力量进行肃清后方的工作。它以将近两万人的军队，配备骑兵、大炮、坦克车、飞机，对晋察冀地区，分成八路，举行“围剿”，另以五个支队向晋西北地区进攻，以若干支队向正太路以南进扰，企图消灭晋察冀地区的军队和游击队，驱逐晋西北及正太路附近的游击部队，以便将来向南继续进攻。

一个多月的斗争，我们部队配合当地游击队，以灵活的游击战术，给进攻之敌以重大打击。虽有某些城市已被敌人占据，然而乡村仍在我游击部队手中。每次战斗的结果，敌人伤亡总是远远大过我们的。有些城市，敌来之时，进行了坚壁清野；敌进之后，被我游击部队四面包围，断其交通接济，敌在非常困难与不断削弱情况下，又将城市放弃。在那些区域，我们就是这样地正在与敌相互争夺着。

游击队在斗争过程中，学得了许多战斗的经验。他们与当地群众有亲密关系，熟悉当地地形道路，能常常给敌人以奇袭。有一次，敌千余由寿阳向孟县进攻，事前被孟县游击队侦知。他们就埋伏于险道，待敌深入突然袭击，敌伤亡五六十人，我游击队仅伤五人。敌人被迫停止前进。后敌查明是当地游击队，次日复进。然此时，附近正规部队已得游击队之报告赶来增援，又给敌

以严重打击，敌伤亡百余人而退。这里可以看出，游击队不仅是正规军作战最有力的助手，而且时常成为正规军的耳目。

地方群众在斗争的过程中，也学习了许多斗争的经验。在敌人奸淫烧杀抢劫之下，群众情绪愈加激昂。他们逐渐学会了坚壁清野和种种对付敌人、封锁消息、肃清汉奸的斗争方法。有一次，敌两三千，以坦克为前导，由易县向紫荆关方向进攻。沿途群众坚壁清野，逃避于两边山地。敌进入后，正规军队袭击其先头，两侧群众协同游击队登山袭扰。敌疑被我大军包围，仓惶后退。是役敌伤亡甚大，我缴获步枪数十支，并夺坦克一辆。

在群众斗争开展的条件下，汉奸不敢抬头活动。敌人进到之处，已不能顺利地建立伪组织和伪军队。因为群众相信可以与敌坚持斗争，敌人无法欺骗，汉奸分子亦畏惧群众力量，不愿出头组织。敌这次进占涞源将近一星期，伪政权始终没有建立，经过游击队配合群众包围袭击，敌乘夜逃退。

晋察冀边区乃太行山脉、恒山、五台山脉纵横交错复杂险要之广阔地区，极利于游击战争之开展，群众已经发动起来，敌人的“围剿”是无法征服我们的。相反，时日愈久，基础必愈巩固，将成为支持华北抗战的一个坚固的堡垒。

就在这样的形势下，迫使敌占太原后，不得不暂时停止南进，至少，这也是敌未即南进的一个重要原因。这就使得山西抗战过于疲劳的部队，得着机会收容整理与补充，保持晋南大块土地，直到今天还是完整的。

（六）山西抗战的几个经验教训

几个月的抗战，虽然有些地区与城市暂时被敌人占去，但是敌人还是付了很大代价的，而且占领地区只限于交通要道和重要城市，大块地区仍然无法统治。抗战的军队与人民中的自信心，却在斗争中大大的提高了。那种认为日寇为不可抵御之洪水猛兽的恐日观念，逐渐消失。在山西抗战的军队，大家思想着如何巩固与加强抗战力量，怎样努力向敌人进行长期持久的斗争。这的确是一个极大的收获，将成为最后战胜敌人的保障，中华民族解放的基础。

战争的经验告诉我们，要同日寇长期斗争，必须改善我们的作战方法。我们要依靠于持久抗战去消耗敌人，来争取最后胜利。单纯防御的正面抵抗是不能达到目的的。由于在敌人侧后积极活动的配合，忻口支持了将近一月的抵抗，而且还可以继续支持。敌占太原后不得不停止前进而去肃清其后方，这就使战争能持久，敌人的消耗愈大。平汉线的战斗，以绝对优势的兵力不能抵御

敌人的进攻，如果当时将主力使用于平汉线之西，依靠太行山脉侧击或扰击敌侧后以配合正面抵抗，这种积极的防御，我们相信，敌人决不能在突破保定后能够不遇抵抗地突进三百余里，而达正定、石家庄。这样不仅平汉线可以持久抗战，而且能够配合晋北抗战获得胜利，以扭转华北的抗战局势。

敌占南京、杭州、济南后，中国不屈服投降，它是不会停止向华中、华南进攻的。但敌人战线愈长，兵力愈分散，困难愈多，弱点愈容易暴露。根据山西抗战经验，我们认为今后的抗战，除正面必须选择要点，依托坚强工事，加以顽强抵抗外，应以精锐部队组织野战兵团，深入敌侧后，抓住敌之弱点，求得运动战给以打击，或诱敌于运动中消灭之。战争的运动性增大，是只利于我而不利于敌人的。

抗战的军队要有坚强的统一的指挥，并且严格军队的作战纪律，军队间应有坚强的互信心，以求作战中切实协同与配合。抗战军队，应在忠诚于民族国家前提下去执行自己的战斗任务，一方面保障每一个命令的完成，同时又须要能够见机而动，不失每一个能够打击敌人的机会。高级指挥机关应给前线指挥员以机动的可能，对其机动处置所得的胜利，加以表扬，稍有过失则不应责之过甚。

山西抗战经验又告诉我们，不仅在敌人后方可以发

展人民的游击斗争，而且能够收复广大领土，成为持久抗战中一个极为重要的力量。敌人以正规战从正面击退我军比较容易，而肃清后方游击战争则成为不可能。在今后抗战过程中，要以更大的注意和努力开展群众运动，特别是派出许多小的游击队，配带大批民运和军事工作干部，下定与人民同生死共存亡的决心，深入敌之远近后方，领导组织民众游击战争，是一个急迫的战斗任务。

抗战军队与人民关系急须求得改进。军队侵犯群众利益的现象，必须从加强部队政治教育和严格军队纪律的方面去加以消除。纪律好的军队，要进一步在自己活动区域加紧地方群众动员组织工作，要使一切抗战军队不独成为群众亲切爱戴的人民武装，而且成为动员群众的组织者和领导者，真正达到军民合作，一致抗战的要求。破坏群众利益，客观上帮助了敌人欺骗民众。“这样不如让日本军队来”的怨言，足够使我们警惕其危险！

最后，一切抗日军队必须建立健全的政治工作。应视政治工作是巩固和增强战斗力量的武装，是抗战军队的生命线。这首先要建立健全的政治组织，应把政治工作的基础建立在连队之中；要提高政治机关在部队中的威信，这又依靠于政治机关自己负责的实际工作和军事指挥人员对政治机关的重视与尊重去达到。政治机关应

当对部队进行系统的抗战教育，提高战士的胜利信心，保障战斗任务的完成。应当发动和指导部队进行居民中的工作和瓦解敌军工作。

一九三八年一月二日 于山西前线

国民党改组前后和大革命的失败

吴 玉 章

一、国民党改组以前

国民党是在辛亥革命后，于一九一二年八月，由同盟会联合统一共和党、国民共进会、共和实进会、国民公会所组成，目的是为争国会选举的多数。其成分非常复杂，许多官僚、军阀、买办都拉来入党，甚至袁世凯最下流的走狗赵秉钧也加入国民党，成了一个无所不包的垃圾堆。因为主张政党内阁，竟至把袁世凯派的阁员都加入国民党以作国民党的内阁，岂不滑稽！其政纲不仅把同盟会的平均地权取消，而且也把男女平权取消，以至唐群英殴打宋教仁。第一次国会选举，国民党固然占了三分之二的大多数，但因袁世凯操纵收买，连国民党想选一个议长都选不出来，不待二次革命、袁世凯解散，而国民党早已破产了。

一九一三年二次革命失败后，中山先生愤恨党员不服从他的命令，坚决要改垃圾堆的国民党为中华革

命党，以继承同盟会的精神来继续革命。这自然是他比黄兴、宋教仁等高明，但他只知道革命的党要有统一的意志，严格的纪律，而不知道只有思想的一致、目的的明确、行动的统一，党员对党任务的自觉态度作基础，才能实行铁的纪律。而且要有革命的理论，才能有革命的组织。革命的党、战斗的党，必须有坚强的核心作领导，必须是民主集中制，可是中山先生只要集中而不要民主，而且要党员绝对服从他个人，并要举行落后的会党式的打手模，这就引起了许多新旧党员的反对。至于革命理论方面，中华革命党只以实行民权、民生两主义为宗旨，目的在反对袁氏的专制，更无多的阐述，没有说明革命的性质、动力和前途，至多也不过〔是〕欧洲十八、十九世纪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旧理论，对于二十世纪帝国主义时代中国这样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的革命是不适合的。

中山先生在他数十年的革命斗争中，是一个很坚决的革命实行家。我自他创立同盟会以来就和他共同奋斗，我是很佩服他的。但我们要“好而知其恶，恶而知其美”，不歪曲事实，不阿其所好，才不至违背客观的真理。中山先生固然意志很坚强，他是代表革命的左派，但他所反对的几件事情，结果还是向黄兴等右派让步，甚至和他们合作。如右派妥协的行动，第一件是黄兴在南京政府即开始与旧官僚及大绅士合作；第二件是

包围孙中山让权袁世凯并政府北迁；第三件是孙、黄到北京和袁世凯筹商国是，协定什么内阁大纲八条；第四件是解散同盟会与几个非革命的政团合组国民党；第五件是向袁世凯要求组织袁派阁员都临时加入国民党的国民党内阁。这些妥协的责任，大部分固应归之右派，而左派的领袖中山先生为什么也尽量容纳右派的主张与之合作呢？直到民国二年，国民党完全失败，中山先生才公开指责党员不服从他的主张，才断然与黄兴派分裂，另组中华革命党。到了一九一九年又改名中国国民党，以别于从前的国民党，以实行三民主义为宗旨。

自民国成立以来，大家都认为革命没有成功，还须进行革命，但革命的目标是随时变换的。袁世凯专横称帝，则用“讨袁”或“护国”的口号；段祺瑞专横，国会解散，则用“护法”的口号，还有“讨徐”、“讨曹”、“讨吴”、“反直”等等口号。最奇怪的是段祺瑞一手造成的张勋复辟，而他又在马厂誓师讨伐张勋；官僚徐世昌等称这一幕儿戏战为“再造共和”，为“革命战争”，革命的意义混乱了。这一时期，始而是北洋军阀为消灭南方革命势力，以维持国家统一为名而战，继而是北洋军阀与南方新兴军阀战；随后北与北战，南与南战，或以为统一法纪而战，或以为省自治逐客军而战，演成军阀混战局面。而一般官僚政客、卖身议员，法统之战、制宪之争，闹得一塌糊涂，一般民众真不知何所为，不知如何

才能找得一条中国的生路。

无论中华革命党或中国国民党，中山先生在改组以前的政策，都是以军事行动为主，轻视民众的力量，因为注重军事，故不惜与失意的军阀、官僚、政客联盟，不仅南方的陆荣廷、唐继尧、岑春煊等，就是北洋军阀段祺瑞、卢永祥、张作霖等也都曾合作过。而结果不但受他们侮弄欺骗，甚至自己培植起来的陈炯明都直接叛变；就是他最亲信的陈英士，也不过是军阀而兼有流氓政客的才能罢了。因为轻视民众力量，不仅不作民众宣传，不援助罢工工人，甚至他的敌人吴佩孚屠杀京汉铁路工人，也未曾发过宣言来声罪致讨。〔对〕轰轰烈烈的“五四”运动，未曾表示拥护的意见，尽管这是打击他的敌人段祺瑞。相反的，对于当时的北京学生会派来的代表，初拒绝接见，及见后反大加批评，这就模糊了革命的面目，失掉了革命阶级的立场，即不为人痛恨（因为未得过地盘和政权），也已为人轻视。尤其是对于新文化运动及白话文的反对，违反了新时代的潮流，失掉了青年的信仰，国民党已为人所鄙弃厌恶。因此，当时的内政外交如此混乱，军阀混战如此频仍，已无人想寄托革命之重任于孙中山先生和国民党。这并不是偶然的，是因为中山先生这时的三民主义，对于民族则只在推翻满清（所以中华革命党不要民族主义），而不许蒙古独立，还是大汉族主义，而且有由家族发展到国族的糊涂

思想。对于民权主义则要经过军政、训政时期才能实行宪政。把民众当阿斗而自己作诸葛亮，看不起民众，主张愚民政策的“行易知难”的唯心论。对于民生主义则反对马克思的阶级斗争学说，而以马克思为社会病理学家而他是社会生理学家的武断“学说”，而且常要郑重宣言保护外人生命财产、履行条约义务等，甚至还要联美或联日来革命，使人几乎不能认识是一革命的人而是反动的人了。这是由于他不承认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的宇宙观和人生观。

但是，正如毛泽东同志说“灾难深重的中华民族，一百年来，其优秀人物奋斗牺牲，前仆后继，摸索救国救民的真理，是可歌可泣的。但是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和俄国十月革命之后，才找到马克思列宁主义这个最好的真理，作为解放我们民族的最好的武器，而中国共产党则是拿起这个武器的倡导者、宣传者和组织者。”（《改造我们的学习》）一九二一年中国共产党诞生，用马列主义的方法指出中国革命的前途，指出中国革命的性质是包含对内对外两个方面，是帝国主义时代半殖民地的国民革命（或称民族革命），而且是世界革命的一部分。‘决定中国革命性质的基本事实是：（甲）中国的半殖民地地位和帝国主义的财政经济的统治；（乙）因军阀和官僚的压迫而加重的封建残余的压迫；（丙）千百万工农群众日益发展的反封建官僚压迫、反军阀、反帝国主义的

革命斗争；（丁）民族资产阶级在政治上的软弱性，它对帝国主义的依赖性，它对革命运动规模的恐惧；（戊）无产阶级日益增长的革命积极性，无产阶级在千百万劳动群众中的威信的增长；（己）中国邻邦无产阶级专政的存在。”（斯大林）因此，我党就提出革命的目标是打倒帝国主义及封建军阀，革命的动力是工人、农民、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而革命的领导要有列宁的布尔什维克的坚强的阶级先锋的党来作核心，与各革命阶级结成统一战线，只有这样才能获得胜利。这样一来，就为中国革命开一新纪元，革命青年生气勃勃，尤其工人运动高潮，如火如荼的罢工威力，震动了全国。

中山先生毕竟是一个革命家，看见了共产党这个新生的蓬勃的革命力量，就想得其援助以一新他的腐朽的国民党。我党也以为国民党有革命的传统，而且可以结成工农、小资产阶级及民族资产阶级的革命联盟，也愿意与国民党合作。经过我党代表和林伯渠同志与中山先生接洽，同时苏俄的代表马林、越飞先后到桂林、上海，与中山先生联络。中山先生遂毅然“以俄为师”，并依靠工农广大的力量来进行革命，遂确定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重新以适合现状之要求来解释三民主义，以列宁的共产党的组织方式来改组国民党。当时国民党内许多人都反对，中山先生愤然地说：“你们都反对，我就一个人去加入共产党。”可见中山先生真有革命

的精神，值得大家的尊敬。幸而这时有廖仲恺先生是真正认识了改组的意义，为诚心诚意赞助中山先生改组的一人。一九二三年一月二十六日，中山先生与越飞共同发表宣言后，因越飞赴日养病，遂派仲恺先生与之同行，在日本热海花了一个月工夫，拟定了改组的一切计划。一九二四年一月，国民党改组后第一次代表大会于广州举行，发表了有名的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从此，就给了国民党以新的生命。

二、国民党改组以后，革命路线 与反革命路线的斗争

自从中山先生改组国民党，国共合作成立，革命的动力集中了；以反帝反封建军阀为对象，革命的目标确定了；以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的三民主义为革命的原则，革命的理论正确的了，这样就推动了革命大踏步前进。

中共加入国民党时，就有“左”右倾的两种错误思想。陈独秀领导的右倾思想，赞成加入国民党，同时主张“一切工作归国民党”，共产党不应该有什么独立的工作。甚至说：“中国共产党早生了五年”，这无疑是取消主义的思想。同时有张国焘一派“左”倾的思想，则“反对在劳动群众中发展国民党的组织，主张工人应该在自

己的政党旗帜之下参加民族革命，若加入资产阶级性的国民党，便不免有混乱无产阶级思想的危险”。他们起初反对加入国民党，后来赞成，但要保留产业工人不要加入。这是一样的不了解与资产阶级争夺革命领导权的策略。

这两派主张的根本思想，都是机会主义的“二次革命”的理论。前一派认为现在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无产阶级应该帮助资产阶级，将来的社会主义革命，等到将来再说，所以甚至觉得共产党都可以取消。后一派则认为现在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我们固然应该参加，可是我们的任务是准备将来的社会主义革命，所以产业工人决不应该加入国民党中去受资产阶级思想的洗染。这两种思想都是把资产阶级革命与社会主义革命看做有一座万里长城的隔离，而不知从资产阶级革命转变到社会主义革命的马列主义的路线。

因有这种机会主义路线，对资产阶级采取让步，要避免包办国民党之嫌。

一九二五年冬发生西山会议派，同时民族资产阶级已有反动端倪，已经开始反对工人阶级斗争，极力控制共产党，而陈的路线乃认代表半封建势力的西山会议派为右派，而以戴季陶思想为中心的资产阶级为中派，采取向中派让步以孤立右派的策略，实际上对右派也一样让步。当时广东的党，一方面反映着阶级斗争的发展，

另一方面在广东的国际代表鲍罗廷在那时还能相当执行国际的指示，于广东党与中央在许多问题上发生过争论。当时广东党的路线，一方面发展群众的组织与斗争，另一方面在国民党内采取不断地向右派进攻的政策。一般人叫它为“剥笋政策”。征服了商团事变之后，马上肃清东江，削平刘、杨，继续又驱逐胡汉民、许崇智等。左派与共产党的势力一天天地发展起来，机会主义的中央却天天斥责广东太激进了，叫广东的党破坏了中国民族革命联合战线。最值得记忆的一次争论，就是在国民党第二次大会以前，广东党坚主反对右派，把当时九个著名的右派领袖，如戴季陶、孙科等都驱逐出广东，并且准备在这次会议上把国民党造成左派与共产党联合的中央。可是当时中央的主张，却确实与广东相反，认为当时革命形势（郭松龄反奉失败后）在全国各处都受到了打击，因此必须向右派让步，以保持联合战线。于是广东驱逐出来的右派领袖孙科、叶楚傖、邵元冲等到了上海，中央却马上与他们实行“谈判”（一九二五年十二月），并订立了极可耻的条件：（一）共产党员在国民党各级党部指导机关中不得占过三分之一的人数；（二）由共产党中央命令广东党部延迟二次大会，等候这些右派领袖回到广东以后再开，于是这些右派领袖又回到广东参加二次大会。

二次大会胜利地完成了许多任务，但以中央的让步

路线与张国焘的不正确领导，没有达到共产党占中央委员三分之一，及左派占三分之一多和不要右派的目的，反而使右派占了三分之一以上(十五人)，左派反而比右派少了，这就使左派势孤而右派得势了。孙科、戴季陶等都为中委，而蒋介石更为他们利用来打击左派，戴、叶、张静江等与蒋勾结，孙文主义学会阴谋百出，于是三·二〇事变发生了。

三·二〇事变完全是蒋的阴谋，竟设一圈套把中山军舰骗到黄埔，逮捕舰长李之龙，大捕共产党的党代表，监视苏联军事教官等（当李之龙因中山舰案被捕消息传到此间时，我们因为李最近曾受留党察看的处分，以为他已加入反动派了。后来见报载中山舰案乃是李之龙受命于共产党的倒蒋阴谋，我们更觉得离奇，最后接恩来来信，才知道李之龙上了反动派的圈套）。蒋是极阴险狡诈的右派，而我们误认他为中派。这一事变的意义是资产阶级要先打击无产阶级的力量，取得国民党的领导权，然后再行北伐，使北伐的结果完全符合他们一个阶级的利益。

在这一事变中，广东党与中央又有不同的意见。第一讨论这事变的原因，广东党认为是“当进攻而没有进攻”的结果，中央则反是，认为是“当退步而没有退让”的结果。第二个争论是对于三·二〇事变的策略，广东党认为“退出国党就等于放弃群众，放弃革命的国党

旗帜给资产阶级，这就是莫大的损失。这时应采取暂时让步，以保留在国党内，同时积极准备新的进攻，以夺取领导权。”另外上海有少数同志，认为〔是〕莫大耻辱，应即退出国党。当时陈（独秀）却有第三种意见，就是有名的“办而不包，退而不出”，这话的意思就是说：三·二〇事变是共党的激进政策，是想包办国民党的事逼出来的，所以以后只应“办而不包”，马上退出国党是错的，但一定要向右派退让，所以只要“退而不出”——这是奴服资产阶级的机会主义的精神。

三·二〇事变已经在事实上充分暴露了资产阶级的动摇与反革命的必然性。共产党经过这一事变的教训，应该更坚决地在政治上扩大自己的政治影响，积极争取小资产阶级群众，尤其要争取农民与士兵群众，使之团结在无产阶级周围，并切实批评资产阶级的动摇，积极领导群众斗争，准备自己的力量，以镇压不可避免的资产阶级反革命的到来，以夺取这一革命联盟到自己领导之下。广东省委当时对于与国民党关系的策略，虽然比中央的投降路线要正确些，但是对于扩大群众基础的工作也不十分坚决。北伐开始的时候，曾向中央提出这样的问题：“在北伐过程中，到底准备推翻蒋呢？还是拥护蒋？”广东是主张前者，可是中央答复得妙：“不是推翻蒋，也不是拥护蒋。”总之，这是“既然要联合战线，就应当自己让步”的机会主义原则在作怪，绝不懂得“要联

合又要斗争”的原则。这次我们与国民党二次合作，如果没有毛主席的“要团结又要斗争”而实行了“一切服从统一战线，一切经过统一战线”的原则，那就不会有今天我们的胜利！

三·二〇事变，这时联共中央认为：“必须使右派退出，或开除他们出国民党。”（然而），左派自己认错，让右派气焰更高，汪精卫出走，蒋更得势。五月十五日，国党二中全会，蒋主持，提出“党务整理案”，并议决选举中央主席（原来国民党改组是仿效联共的民主集中制。中山在众推他为总理时固辞。他在列宁逝世时很沉痛地说：“政党之精神在党员全体，不在领袖一人。”他因列宁之死而触情感怀，似乎是预知他不能久领导党员，而望能实行民主集中制。现又设主席，违反中山先生之意了），西山会议的精神，一部分实现了，反动派还并不因此而骤然得势。孙科提禁止国党有左右派之分的案，遭否决。事前有共产谣言，军事暴动谣言，银行挤兑，但这时左派与共派联盟很固，民众赞成左派，单此一案还不足以决定国民党中央之右倾，还有“团结革命分子与反动派等战斗”之宣言。这是表明蒋之势力未充，还想借革命势力达他的愿望。他是上海交易所的老板，最富于投机权术。所以北方军阀“反共”“反赤”，蒋介石先生当时也是大骂他们的呀！

三、北伐胜利与革命阶级的分化

一九二六年正月，国民党二次代表大会刚开，广西就拥护国民政府，两广统一了。随后贵州黔军两军参加国民革命军，湖南唐生智率军来归，这是革命军事力量的发展。

自“五卅”上海惨案发生以来，罢工风潮愈趋激烈，广州、省港罢工委员会成了国民政府的支柱，各地工人运动蓬勃发展。一九二六年五一召开的第三次全国劳动大会，有组织的工人已经有一百二十四万一千余人，这是革命的骨干。〔这是〕工人运动的大发展。

广东农民协会成立，声势已大振。湖南农民运动虽还在秘密时期，却使农民大大的革命化。这是农民运动的发展。

一年以来革命声势的扩大，胜于十年二十年，而且革命反帝反封建军阀的口号，一针见血，大为全国人民所欢迎，大有箪食壶浆以迎王师之势。

北方军阀与帝国主义勾结，并想用什么约法、宪法之名来把持中国政权（他们以恢复所谓“国法”以与民众及中山所要的国民会议对抗。吴佩孚称护宪，使曹锟辞职，还有国会自动召集之说；这种贿选国会，军阀与英帝走狗居然想复活！张作霖另有企图，主张护法以与曹

宪抗衡。他主张约法，依法召集新国会)。今天时局变了，反革命与帝国主义就要用反共之名来把持政权。这时北方局势是吴佩孚、张作霖、段祺瑞奉日帝国主义等之命，联合向北京冯玉祥的国民军进攻，不但在“三·一八”发生屠杀学生惨案，而且以联军力量战胜了国民军。吴佩孚不能以武力在北方夺取完全政权，遂转而向南方发展。他向南发展之第一步，是以实力援助湖南所有的反唐军队，驱逐唐生智出湖南。第二步便是联合湘、鄂、川、滇、黔、豫、赣、闽八省反动军队围攻两广，也说要四面围剿以根绝“赤祸”呢！

民众有打倒军阀和帝国主义的要求，军阀又有围攻革命根据地之危险，国民政府遂于七月初出师北伐，以蒋介石先生为总司令。他在出师宣言中说：“吴贼所资为号召者，厥为‘讨赤’夫；‘讨赤’乃帝国主义者用以对抗全世界被压迫民族，破坏全世界革命联合阵线之口号也！”蒋之赞成北伐，是想利用革命达到他的企图，即向外取得地盘，并以军事力量限制革命的发展。

民众革命的力量是无坚不破的。尤其是国民革命军第四军张发奎部队，有共产党员叶挺等作先锋，军中大半为共产党员，与人民打成一片，成为人民的军队，往往兵未至而民众已蜂起，因而第四军与唐生智的第八军，于十月初即克服武汉。如此迅速，完全是由于军队革命的牺牲精神，工农广大群众的援助的结果。革命浪

潮极端迅速地使群众革命化了，成千成万工农卷入革命斗争，团结成突击的队伍。肃清中国封建残余的斗争，反对帝国主义奴役的斗争，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争夺领导权的斗争，日益带有极端残酷的性质。在一九二七年夏天，便达到最高程度。

当北伐初期，民族资产阶级还与革命工农和城市小资产阶级同道前进，这是全民联合战线的革命。因为资产阶级企图利用革命来达到自己的目的，这是国民党内右派反对左派激烈斗争的原因。当时我党也有广东路线与机会主义陈独秀的上海路线的斗争，广东路线是要我党党员与国民党左派亲密合作，以党的纪律打击右派向反革命走的道路，上海路线则向右派妥协投降。

中国大革命最激烈、最复杂的斗争时期，是革命发展到长江流域的时候。虽然很久以来中央就发展了机会主义与宗法家长制的领导，工人运动中都没有提拔工人同志来领导，而都是知识分子在干，但是客观上劳动群众的斗争却依然急剧的发展。赤色工会发展到将近三百万会员，吸收极多的店员、手工工人参加，农民协会只以湘鄂赣粤计算，发展将近一千万会员，国民党左派运动有极大的发展，军队中也有力量，虽然这些发展大半属于自发的，可是前一阶段中，共党加入国党的政策，以及客观上革命势力的发展，使“取得国民党，取得国民革命，取得一般小资产阶级”的策略事实上部分实现，而

形成部分的革命势力。共产党以工农团体中的领导权之取得，而成为革命的先锋与主干。当时的任务，就在一方面认清“五卅”以来“中国无产阶级暂时还没有革命的领导权”（一九二六年十二月共产国际杂志社论），一方面坚决地进一步而取得政权与军权的领导权。这是革命发展到长江流域的形势，中共中央便放在这种形势之前。

这时北方反革命的势力已不能阻止革命，帝国主义看见军阀不能作消灭革命运动的有效工具，于是用和平方法在民族革命势力找寻它的同盟者，因此反革命的大资产阶级甚至军阀开始转变到国民政府方面，与国民党内的反动派勾结。反动分子又起而破坏革命联合战线，欲使革命转入反革命。蒋介石要党政机关设南昌，就是想指导机关尽入其军事独裁之掌握。蒋企图分裂国民党，在南昌成立新中央，并于二月在庐山召集军事会议，拉拢许多初加入国民党的旧式军人，和他们拜把换帖，结为兄弟。武汉革命的国民党在三中全会上打击了他这个企图，执行了正确的广东路线，于是党和国民政府有了一番新气象，革命势力又为之一振。

当北伐出师时，蒋为总司令，并亲率其第一军出江西，以为黄埔学生及精锐武器都在这一军，前此打了许多胜仗，这次一定也是所向无敌。殊不知前此之所以打胜战，一面是共产党员英勇奋斗作了模范，一面是与工

农群众结合，成了不可抗的军队。自三·二〇事变后，共产党员被驱逐或陷害了，所谓蒋的心腹大都是骄奢淫逸，腐败不堪，并与工农为敌，因而处处打败战。江西久攻不下。而第四军张发奎部有叶挺等共产党员作骨干，与第二、第三、第六、第七、八等军一样，不仅有共产党员，还保存革命作风，与群众运动相结合，所向无敌。去年十月张发奎等即攻下武汉，现在二、六两军又攻下南京。蒋于迟迟攻下南昌后，见武汉政府势力完全统治了长江流域，三中全会又取消了他的党政军总揽大权，遂决心背叛革命。中国革命狂风般地发展而引起了阶级力量之分化。蒋到了上海，帝国主义慑于革命势力的可怕，知道蒋对革命路线不满，正好利用他在革命内部来分化革命力量，遂勾结蒋以图打倒革命。果然蒋借口开赴前线，下命令调二十六师离开上海，却于上海附近把忠于革命的军官换成自己的亲信，又重新开回上海来举行对工人的大屠杀。蒋之背叛革命，在南京成立政府，是表明资产阶级畏惧工人运动，退出了革命，产生了民族反革命的中心，国民党右派与帝国主义互相妥协来反对革命，投入到世界帝国主义所领导与组织的反动营垒中去了。中国革命分裂为两个政府、两个军队、两个中心：武汉革命的中心与南京反革命的中心。

汪精卫于四月初到上海，向右派哭诉道：“我也是反共的。不过方法不同，我此次到武汉去必有所表现，我

们是殊途同归。”汪奉了自告奋勇的秘密使命于四月十日到了武汉，我党机会主义的陈独秀也同时到了武汉，这就便利了他们危害革命。当时武汉革命的国民党也作了很多错误〔的事〕：第一是四月三、四两日，张发奎出发到南京去巩固革命的军队，既上船又调回，理由是不要太迫近上海，以免与帝国主义直接冲突，革命须向西北发展，以实行所谓“西北路线”。如果第四军到了南京，或者南京不至为叛徒所据，成为反革命的中心，革命发展的前途当又是另一种形势；革命或不至失败。第二是〔应〕不为汪精卫左的内奸的面目所欺骗，及毅然反抗陈独秀机会主义的投降路线，而实行更向前发展工农的革命运动，巩固工农群众组织，作为工农革命民主政权的坚实基础，来进行更坚决的反帝反封建军阀的生死斗争。共产党应与革命的国民党亲密合作，肃清国民党右派，把国家的一切政权集中在革命的没有右派分子的国民党手里，以保持共产党与国民党左派的革命联盟。共产党在和革命的国民党员在一个队伍中斗争的时候，必须比任何时候更应该保持自己的独立性，而不随他们动摇，或者作他们的尾巴。但是当时恰恰违反了这一个革命路线，更不知汪精卫的内奸政策而迷惑于他的革命词句，把一切政权都交与他，他在讨蒋和第二次誓师北伐的演词中都表现他“左”的面目，麻痹了一般人（共产党也在内）的警惕性。但事实是很显然的，这就是武汉一面下令讨

蒋，一面便已下令“讨共”。讨蒋和查办湘、鄂、赣各省“过激”言论行为的特别委员会组织的决议，差不多是同日同时的（四月十九日下令讨蒋，四月下旬即组织特委以“制裁违反本党（国民党）主义政策的言论行动”）。

五月中，北伐军正在艰苦战斗的时候，许克祥在长沙就举行马日政变，大杀共产党员和工农群众。同时夏斗寅、杨森叛军自宜昌向武汉进攻，夏斗寅已到武昌三十里的纸坊，杨森到汉口附近的蔡甸，情势危殆，反革命以为可以扑灭革命了。但叶挺率中央军校的子弟兵一击，就把他们打得落花流水。正要乘胜进攻长沙，而汪精卫严厉制止，说夏部已归唐生智收编，长沙事变要和平解决。而陈独秀也随汪之后极力压迫革命，汪说农民运动过火，陈也说农民运动过火；汪说工人不应该占领工厂，陈也说工人不应该占领工厂；汪说童子团胡闹，陈也照样说，甚至解散纠察队，自动缴械。何键在汉阳兵工厂发表反共宣言，反革命分子闹得乌烟瘴气。而一方面则革命怒潮空前高涨，有组织的工人已有三百五十万，有组织的农民已有一千万。特别是湖南的农民运动最有力量，农民协会成了农村的政权机关，打倒土豪劣绅，有些地方农民自动插标，分配土地。而最值得注意的是乡间治安从来没有这样有秩序，这样平静过，不仅没有乞丐、流氓，而且有夜不闭户、道不拾遗的现象。人民安居乐业，无不劳动之人，这如何不引广大人民来拥护

革命呢？被驱逐的土豪劣绅都跑到武汉来诉苦、造谣、诬蔑，汪精卫就作为资本，大骂革命破坏统一，破坏政府法令。陈独秀则发出许多制止工农运动的命令，大骂过火。唯恐不能倾长江之水淹息这革命熊熊之焰！帝国主义则尽力封锁，使武汉经济恐慌，并造什么裸体跳舞，禁穿长衣等等谣言。革命和反革命的斗争十分尖锐。幸而五月底北伐军攻下郑州，革命势力已发展到黄河流域，革命将由第二阶段发展到第三阶段，殊不知反革命已经准备好了埋葬革命。郑州攻下不几天，六月五、六日，汪精卫和几个党政要人就到郑州，与冯玉祥开会。这个会议的中心问题，就是如何反共，但他们秘而不宣。十九日我在国民党中央党部接到冯玉祥密电，说已完成了到徐州与蒋会面的使命。我质问汪精卫，他还坚决地说：“谁派他去？他造谣。”

分共的谣言一天比一天厉害，到了七月十五日分共的前一夜，汪召集国民党要人在他的寓所开讨论分共会议。孙夫人宋庆龄闻此消息，痛哭得不堪，且不愿出席，托陈友仁代述她的意见，坚决要国民党继续总理的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绝对反对执行与三大政策相反的政策，力言总理对于这政策的决心与临终谆谆的告诫及遗嘱，如果违反这个政策，称不得是总理的信徒。陈友仁也代为争论，斗争得很激烈。在一般人的幻想以为汪精卫是孙中山先生的信徒，一定不主张分

共。那知道，在这会上汪主张分共最力。谁是中山先生的忠实信徒，谁是中山先生的叛徒，这时才揭晓了。但汪于十五日正式决议分共后，还要掩盖他的内奸面目，大呼反共同时还要反蒋。胡汉民作文讥讽他说：“反共犹须反蒋，则联共尚须倒汪，天下滑稽之事，宁有过于此耶？”胡先生太老实，太落后了，怎能了解新时代流氓和戏子所玩的新花样呢？汪伪装反蒋的最后一幕，不久也就收拾起来，与南京反革命政府合流。一九二五——二七年的中国大革命，就这样告失败了。

汪精卫的叛变是表明上层小资产阶级又退出了革命。这时共产党还想同左派的革命的国民党用革命的武装力量以维持革命的胜利，于八月一日，以叶挺、贺龙两军在南昌起义，这是一个英勇的继续革命的企图。可惜在机会主义（者）谭平山不正确的政治指导之下，仅仅成了一个军事行动。没有用力组织群众，武装农民。柔和的政纲特别是柔和的土地政纲，不能动员群众。只在汕头、汤坑军事一失利，就完全失败了。这又一次的给革命以教训。所残余的工农武装战士编为工农红军，就是我们红军的基础。这以后，国民党已完全成了反革命的旗帜，中国大革命时期从此完结，中国革命转到工农联合更深入的土地革命的苏维埃阶段。

编 后

这篇文章是《吴玉章传》编写组杨世元根据吴玉章同志一九四三年在延安时的手稿残页整理的。吴老手稿是写在一种马兰纸的长卷上。“文化大革命”中，吴老寓所曾被“查抄”，这部分手稿不仅被扯凌乱了，且有所散失。整理时一律据原稿直录，仅对少数简称或明显笔误作了补正。小标题为吴老手稿提纲所原有，全文标题是整理拟加的。

解 放 长 春

肖 劲 光

一九四八年，当解放战争进入第三个年头时，我人民解放军已有了很大发展。经过新式整军运动，广大指战员的政治觉悟大大提高，战斗力大大增强。解放区扩大了，土地改革基本完成，人民群众支援战争的积极性更加高涨。与此相反，蒋介石在政治上更加孤立，经济上濒临破产，军队士气低落，作战能力下降，被迫进行“重点防御”。长江以北的兵力龟缩在以西安、武汉、徐州、北平和沈阳为中心的五个战略区内。

在东北战场上，我人民解放军已发展到七十万，地方部队三十万。东北解放区的面积已占整个东北地区的百分之九十七，人口占百分之八十六。而国民党在东北战场的兵力则下降到四十八万，地方军七万。东北战场成为全国五大战场中我正规军数量超过蒋军的唯一战场。东北敌军依据蒋介石的“重点防御”战略，确定了“集中兵力、重点守备，确保沈阳、锦州、长春，相机打通北宁线（注：指北平至沈阳的铁路线）”的指导方

针，并作了如下的兵力部署：以东北“剿匪”总司令卫立煌率第八、九两个兵团约三十万人，防守沈阳地区；以东北“剿总”副司令兼第一兵团司令郑洞国率两个军约十万人，防守长春；以“剿总”副司令兼锦州指挥所主任范汉杰率第六兵团等部四个军约十五万人，防守锦州、锦西地区。

根据全国战略形势的变化，党中央、毛主席和中央军委认为，战略决战的时机已经成熟，并决定把决战的首战选择在东北战场，这就是著名的辽沈战役。长春围困战役是辽沈战役的一个组成部分，也是我军历史上第一个大的围城战役。从五月二十三日长春外围战役结束到十月十九日长春解放，历时五个月。在我军事围困、经济封锁和强大的政治攻势面前，在我人民解放军攻克锦州这一决定性的影响下，长春守敌六十军军长曾泽生率部起义，郑洞国被迫投降，长春这一大城市兵不血刃地和平解放了。

一、兵临城下

长春位于东北的腹地，是贯通京哈、长图及东北境内各铁路线的交通枢纽，战略地位十分重要。伪满洲国就曾建都这里，称之为“新京”。从日本帝国主义的“关东军”占领时期起，就在城内街道及近郊区做了许多永久

性、半永久性的工事。特别是城中心的主要大楼和主要街道间，都有钢筋水泥的地下坑道连接。国民党进入长春后，进一步加强并增修了不少工事，使长春成了一个有着坚固的防御体系的大城市。一九四七年我东北解放军开展冬季攻势以后，长春虽然已丢在我们的后方，但敌人仍配有较强的防守力量。一九四八年初，敌东北“剿总”副司令郑洞国来到长春，组成第一兵团。三月，敌六十军在我军强大的攻势下仓惶退出吉林，进入长春，与蒋军嫡系部队新七军分守长春东西各半部。这样，敌人在长春的兵力就有新七军、六十军以及收编的地方杂牌部队共约十万人。敌人所以要困守这样一个孤城，一是由于形势所迫，不得已；二是舍不得丢掉这个可以向我东西南北满进攻的战略“宝地”，想在我们的腹地安上一个钉子，牵制我军主力，等待形势的转变。

我人民解放军将东北敌军逼进沈阳、锦州、长春三个孤立地区以后，部队便进行政治整训和军事训练。为了总结前一段工作的经验教训，布置一九四八年的工作，以统一思想，利于再战，东北局、东北军区利用战争间隙，连续召开了政治工作会议、省委联席会议和军事工作会议。一九四八年初，陈云同志、莫文骅同志先期离开南满，参加政治工作会议。我与肖华同志在主持了南满土地改革会议，布置了二线兵团的组建工作之后，于二月底离开通化去哈尔滨。

我们到达哈尔滨以后，先参加了东北局省委联席会议。会议着重总结检查了各地的土地改革工作，以期进一步发动群众，巩固地方政权，扩充兵源，准备迎接新的战斗。会议指出，一九四八年的任务是解放全东北，支援全国的解放战争。三月十二日，罗荣桓同志就东北的形势和任务问题作了报告。他指出，从夏季攻势以来的十个月里，我们取得了很大胜利，彻底改变了局面，由劣势转为优势。由于党中央的正确领导；由于东北局的“七七决议”确定了明确的方针，我们一万二千干部下乡，土改基本完成；由于我们关内关外的同志一致努力，加上华东战场连续胜利，牵制敌人不能北调……这些都是改变形势的重大因素。目前，敌人后备力量有限，大量增兵东北已不可能，蒋介石进退两难。罗荣桓同志说，我们的对策方针：一是切断退路，一是围困敌人，最后达到歼敌的目的。早在一九四七年十月十七日，中央军委、毛主席曾电示东北局：“应将主攻方向转至北宁、平绥两线”。一九四八年二月十八日，又电示：“你们应准备对付敌军由东北向华北撤退之形势”，“对我军战略利益来说，是以封闭蒋军在东北加以各个歼灭为有利”。但当时林彪并没有执行中央的这一正确的决策，而准备先打长春，或围点打援，而后一步一步地向南推进，解放东北。所以，从四月份开始，东北军区总部召开了一系列的军事工作会议，中心议题是解决“大兵团、正规化、

攻坚战”的问题，解剖分析了四平等城市攻坚战例，为强攻长春，进而解放全东北作思想上、组织上、战术技术上的准备。四月十八日，林彪将攻打长春的作战计划报告军委，计划从五月份开始，集中九个纵队围城和打援，以新成立的三个纵队和独立师，在沈阳与锦州、沈阳与四平间沿途牵制敌人。在完成攻击准备之后，对长春发动全面总攻，争取用十天半月的时间结束战斗。四月二十二日，军委、毛主席给东北局来电，一方面同意了打长春的意见，一方面也批评了林彪多次陈述的打沈阳、锦州、榆锦段以及入关作战困难的思想。五月中旬，军事会议结束。为了下一步作战，东北局决定成立两个前线指挥所：一个是第一前线指挥所（以后又叫第一前线围城指挥所），以原辽东军区机关为基础组成，准备指挥攻打长春。当时还印发了长春市区敌分布图、敌工事图等军用地图；另一个是第二前线指挥所，以原冀热辽军区为基础组成，负责指挥北宁线方面作战。两个前线指挥所不辖部队，由东北军区总部根据任务的需要配属部队。这两个前线指挥所也就是以后东北野战军的第一、第二兵团的前身。

会议结束以后，我们在太阳岛休息了几天，即与肖华同志离开哈尔滨。中途在西安碰到三纵队的罗舜初、韩先楚同志，他们正奉命向伊通集结，准备攻打长春。回到通化以后，即整顿辽东军区机关，将一部分人员和

装备补充了安东军区和其他部队，本着精干的原则，把原辽东军区机关的架子带到了长春外围。指挥所开始设在长春市东南四、五十里的李家屯，留守处在吉林。这时已是五月下旬。在我们去长春之前，除了围城的主力部队以外，周保中、陈奇涵、陈正人、陈光等同志率吉林军区（即东满军区）和松江军区各一个前指，参加了围城工作。我们去了以后，这两个前指都派来一些同志，共同组成东北人民解放军第一前线围城指挥所。我任司令员，肖华同志任政治委员，陈光、陈伯钧同志任副司令员（陈光同志不久调离），解方任参谋长，唐天际任政委兼政治部主任。

此时，长春外围战役已结束，郑洞国及其十万敌军已被我一、六纵队和三个独立师团团围住。五月二十四日，为了对空实行封锁，打断敌人空中增援和撤退的道路，我围城部队向长春西郊敌最大的飞机场——大房身机场发动了猛烈进攻，歼灭了敌人的守备部队。我们占领机场后，在水泥跑道上埋上炸药，炸了好几个大坑，将跑道破坏，接着严密布防，控制了机场。记得长春解放时，郑洞国还问我：“你们炸机场是什么意思？”我说，“这你最清楚了，还用问我吗？”这一仗以后，部队基本处于围城待命状态。六月，东北局向我们下达了“久困长围、政治攻势、经济斗争”的打长春的总方针、总任务，变短时间内大兵团强攻为以小部分主力与独立师久困长围

的方针。以后我们得知，在攻打长春方针改变的过程中以及在锦州战役之前，中央军委、毛主席连续发了一百多封电报，督促林彪率主力及早南下北宁线作战，切断东北与关内的联系，造成关门打狗之势。而林彪始终犹豫，最后在中央的一再批评教育下，才执行了党中央的英明决策。实践证明，主力南下北宁线作战是党中央、毛主席着眼于决胜全局的关键性的一着棋。对长春采取久困长围方针也是完全符合当时当地的客观情况的。

六月十五日至二十日，我围城指挥所在吉林召开了师以上干部会议，调整围城部队，全面部署围城工作。会议根据党中央和东北局的指示，决定解放长春采取“长围久困，展开政治攻势和经济斗争，使其粮弹俱困，人心动摇时再攻”的方针，并决定一、六纵队后撤整训，以十二纵队三十四、三十五师，六纵十八师以及六、七、八、九、十五几个独立师和一个炮团为围城部队，进行接防。当即发布命令：“为保证攻击长春的战略任务，决定对长春进行军事上、政治上、经济上的围困。总的任务是：断绝敌人粮柴，禁止行人进出，控制机场，不使敌人空运，扰乱敌机空投，并积极歼灭出扰敌人，寻夺敌之弱点，逐步压缩敌人，完成攻城战场之各项准备……”对围城部队的各师，均布置了具体任务。为了指挥及时、便利，以长春东北的伊通河及长春西南的孟家屯火车站

为分界线，将围城部队分为东西两个地区队。独六、独八、独九师为东地区队，十八师为其机动部队，统受围城指挥所直接指挥；独七、独十师为西地区队，十二纵两个师为该地区的机动部队，由十二纵首长直接指挥。六月二十二日前，所有部队进入指定位置，于是，十万大军兵临城下。

长春围困战役就这样拉开了战幕。在长春城外方圆五十里的地面上，形成了一个封锁区。我十万围城部队，筑起一道坚不可摧的“城外之城”，蒋军十万成了“瓮中之鳖”。

二、军事围困

“瓮中捉鳖”并非易事。此时驻守长春之敌约十万之众。其中西半部的新七军，是曾骄横一时的蒋介石的嫡系部队，有所谓“远征军”、“王牌军”之称；东半部云南滇系的六十军，虽到东北后屡屡受挫、士气不高，但还有相当的实力；其余那些东北的地主武装、土杂顽匪改编的部队，也非常反动。这些敌人，只要还有一线生存的希望，就决不会放下屠刀，也决不会立地成佛，而是千方百计地进行困兽之斗，垂死挣扎。因此，我军实行久困长围的方针，首先是以军事斗争为手段，以强大的军事力量为后盾的。

对长春这个有美式装备的敌人守备的大城市实行围困，对我军来说是史无前例的。敌我双方碉堡相对，在宽大正面上我与敌短兵相接，斗争十分严峻。由于我们经验甚少，在斗争中边摸索、边总结。开始就力争把工作做得细致一些，准备得充分一些。完成封锁圈后，部队即行构筑工事，架设通信网，勘察地形地物，侦察敌外围据点，做反突围方案。为了防止敌人突围和出击，围城部队作了纵深梯次部署。在第一线阵地上构筑了较坚强的工事，围城部队依托工事反击敌人的冲击。第二线阵地也构筑了工事。尤其是在封锁机场的阵地上和西南铁路口敌主要的突围方向上，部署了战斗力较强的兵力。在纵深有利的地域控制了机动部队，一旦敌人突破我前沿阵地，就在运动中歼灭敌人。这样，在长春城外，我军的封锁线密密层层，纵横交错，水泄不通。六月二十八日，围城指挥所发出“交通通信工作指示”，要求进一步加强工事，挖交通壕。除了有环城交通沟保证各部队之间、各部队与指挥所之间的联络外，各部队都有伸向前沿的壕沟，形成了一个地下交通网。从地面上看似乎是一马平川，不见我一兵一卒，但在地面下，却是千军万马，严阵以待。交通沟的最前沿，距敌不过百把公尺，连敌人吃的什么饭都可以看见。通信网也相当可观，环城架设两道电话线，一道在封锁区内侧，一道在封锁区外侧。各部队与前沿阵地都有电话联络，指挥畅通。当

时围城的目的是为了攻打。一是准备打突围的敌人，在运动中消灭之；二是准备将敌围困到山穷水尽之时，再行强攻。因此我们对长春敌人的城防工事和部队情况做了非常细致的侦察。六月三十日，围城指挥所发出“侦察工作的指示”，各部队的首长亲自动手，从部队、群众、俘虏三个方面，对长春敌外围据点和长春城内的情况进行全面侦察，绘出要图，因地制宜地作出战斗方案。后来，还研究整理成一本《长春匪情汇编》的小册子，并绘制了大量的军事地图。从以后解放长春的情况证实，我们的这些侦察材料百分之九十是正确的。当时，城里敌人有什么动向，我们这里马上就可以知道，情报来得很快。现在看来，当时我军的司令部工作，已有了相当的水平，是很值得称道的。

围城之初，敌人还比较嚣张，小股部队经常出来袭扰、抢粮，准备固守。后来，越来越感到问题严重，大概以为固守孤城实在是坐以待毙的下策吧，于是就开始做一些试探性的突围，有几次还有相当的规模。对于出扰之敌，我们的方针是：“如敌在一个师以下就原阵地迎击粉碎，如一个师以上，则诱敌深入，抓住敌人，使用机动部队歼灭之”。七月一日，围城指挥所在李家屯召开纵队、师以上干部会议，研究兵力部署和火力配备的问题，特别发出指示，加强各结合部的封锁，还根据情报，制定了打敌人向西或向南突围的预定方案。七月

三日夜，长春守敌以小部队向我独十师各团阵地出击，被我击溃。另一路敌军经丁家窝棚向我出击，由于其尖兵班集体投诚，其他部队不战而退。四日凌晨，敌由火磨公司出动约一个团的兵力向我独七师谭家营子阵地进犯，冲锋三次均被击退。六日拂晓，敌人用五个团的兵力分三路向我西南、正南和东南阵地出击。西南方向的孟家屯车站附近一仗最为激烈，这一带由于紧靠铁路线，估计敌人从此处突围的可能性最大，我们做了重点防守。围城之初，我曾经带着参谋人员到担任该地区封锁任务的独六师住过几天，利用夜间赴前线查看地形，与该师领导详细地研究了作战方案。独六师是一支老部队，战斗力比较强，加上做了周密的部署，部队警惕性高。这一仗打得很漂亮。那天，敌人采取小部队多方佯动，寻找我侧翼与结合部，然后集中主力重点出击。由于六日拂晓大雾，敌人进到距我警戒三、四十米处才发现。敌人在其据点炮火的掩护下，每次以四、五十人为一队，轮番向我阵地进攻。当时，我担任防御的一线部队虽只有一个班，但非常英勇，沉着应战，顽强还击，坚守阵地，直到主力赶到。双方激战至下午一时，打退了敌人的猖狂进攻，共毙伤俘敌一千余。这是敌人最大的一次突围。此外，敌人还组织了几次中等的试探性突围，均被我打退。

八月十六日，围城指挥所召集军事工作会议。根据

总部指示，压缩部署，进一步困锁敌人。这时，我围城指挥所已改称第一兵团。司令部亦向前压缩至距长春城二十里的四家子村。为了防止长春敌人突围，又调集了十几个独立师为二线兵团，布署在双阳、伊通、公主岭一线以及梅河口至开原一线，把长春重重围住，从而也保证了锦州战役的顺利进行。在这前后，我围城部队还组织了一些出击。如独七师袭击小南屯敌骑一旅，十二纵反击恩慈医院守敌等战斗。据九月份的统计，在围城三个多月中，共进行了大小战斗三十余次，毙伤俘敌近三千名。

九月，北宁线上的锦州战役打响了。我军进军的号角震撼了蒋家王朝，也使长春孤城中的敌人濒临绝境。为保证锦州战役的胜利，我东北各主力纵队均调集前线，六纵、十二纵也奉命调集通江口、开原之线。这时围城一线部队只有六、七、八、九、十和后调来的独十一师六个独立师，任务更加艰巨了。根据总部指示，为配合主力在北宁线上作战，我围城部队的任务是继续压缩部署，夺取一切能夺取的敌之外围据点，牵制迷惑长春守敌。如敌突围，坚决在运动中消灭之；如敌继续固守，则选择突破口，构筑工事，为正式攻取长春作充分的准备，以待锦州战役结束后，主力回头打长春。为此，我围城各部队作了多种作战方案。十月二日，围城指挥所在四家子召集师以上干部会议，详细研究了部署。这时，

城内情报源源不断地送来。我军获悉：蒋介石命令郑洞国率部突围；郑洞国在洪熙街查看地形；敌人连续几夜演习夜行军、急行军；敌人每人发了三天军粮；敌军官家属集中于海上大楼；敌将走不动的马都杀掉……这些重要情况说明敌人有突围的明显迹象。于是，我十万围城部队立即紧急动员，准备战斗。不久又获悉，敌人估计我主要防守西南口中长路，于是将突破口选在长春以西大房身机场方向，企图以最精锐的部队新三十八师作试探突围。掌握这一情况后，我第一兵团司令部又作了几个战斗方案，并交由前线部队进行充分的研究讨论。在讨论中我提出：估计敌人这次出来的兵力不会少，我们的“刀子”插的深一点好，还是浅一点好？如果插的深，把部队全调进去，固然可以多截击敌人，但是，就象流水一样，突然截住了，冲力大，就可能同时漏掉得多；如果浅一些，梯队配备，从侧面打击敌人，一个梯队消灭一部分敌人，放过的敌人，由第二个梯队再从侧面伏击，余下的敌人留给第三梯队去解决，这样也许更好一些，消灭敌人更彻底一些，自己伤亡也会小一些。经过大家反复讨论，同意了我的意见。这样，我们部队在几十华里的区域内，分三个梯队部署展开。十月七、八两日，敌全副美装的三十八师向我独七师阵地全力进攻，企图占领大房身机场，进而在增援部队或飞机的接应下突围。经我数次各个击破，敌军进展甚慢，气势渐挫。

遭此迎头痛击后，长春守敌便缩了回去，突围计划遂成泡影。此时的长春，飞机不能降落，步兵不能突围，内外联系中断，真正成了一座死城。

三、经济封锁

围困长春的斗争，是一场非常复杂的、全面的斗争。除了严峻的军事斗争以外，最尖锐和直接的斗争还表现在经济斗争上。实行经济封锁，是我围困长春的一项重要任务。我军在通往长春城的各交通路口，设立检查站、检查哨，禁止粮食、蔬菜、燃料等一切生活资料和牛、马入城，严禁一切走私分子入城，重点实行粮食封锁。对于军队来说，历来是“兵马未至，粮草先行”。我们实行严密的经济封锁，就如同卡住了敌人的脖子，把十万敌军的命运掌握在我们的手中。

困守孤城，历来为兵家所忌。郑洞国率十万敌军要在城内生存下去，等待蒋家王朝的接济进行反击，吃饭是起码的条件。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城内的守军绞尽了脑汁。围城之初，他们经常在长春城外的村庄里抢粮抢柴，储存起来以备后用。长春城外方圆三、四十里的中间地带，无一村庄幸免，粮食都被抢走，老百姓留的粮种也全被搜刮掉，许多房屋拆得只剩四壁，房上的草都被拉进城去喂马，木板木梁拆去做柴草。后来，随着我

围城部队日益向前压缩部署，距敌越来越近，敌人外出抢粮、拆房，只要被我军发现，即毫不留情地打回去，逐渐逼得敌人不敢出城，只好依靠空投。开始，敌长春警备司令、新七军军长李鸿还安慰部下说，“没有关系，没柴烧拆房子，没粮吃有空投”。然而，现实是无情的，随着旷日持久的围困，前景日益暗淡。就拿执行空投任务的敌机来说，遭我炮兵和高射机枪的射击，有时来不及空投，就掉转机头仓惶回窜，有的被迫高空或漫无目标的乱投，很多粮食落到我军阵地或封锁区内。这些南方的大米，四川的榨菜，猪牛肉罐头，均成了我军的美味佳肴。投入城内的粮食等物资，郑洞国专门设立了一个空投指挥所，由敌兵团参谋长杨友梅任总指挥，统一分配这些物资，规定大部分供给新七军。由于蒋军官兵饥饿难忍，谁抢到谁就私留分吃，加深了蒋军内部嫡系与非嫡系军队之间的矛盾，甚至发生械斗。后来，郑洞国不得不亲自签名出告示说：“倘有不顾法纪仍敢擅自抢藏者，一经查获，即予就地枪决。”足见矛盾之尖锐。据当时美联社的一些“专家”分析，空投粮食要二十架飞机每天飞行两次，才能供上长春的需要。可是，最多时每天只有十二架飞机，后来每天三、四架，再往后每周三、四架，阴天下雨无飞机，有的飞机还投不中目标。因此，空投粮食只是杯水车薪。郑洞国后来回忆这段历史时说：“当时最头疼的问题就是缺粮”。

在这种情况下，敌人只有加倍地搜刮长春市内的五十万无辜居民。长春市敌人组织了军政警合一的“战时粮食管制委员会”，将城内的粮食，包括麸子、糠粃、豆粉等，都搜刮殆尽，“管制”起来，统一分配。由于粮食奇缺，城内的粮价飞涨，下面的统计表是当时每斤高粱米价格日益飞涨的情况。

六月二日	四万元
六月二十三日	二十二万元
七月十四日	八十万元
七月二十八日	三百三十万元
八月十一日	七百二十万元
八月十八日	二千三百万元
九月十日	二千八百万元（均为东北流通券）

仅在六月到九月的三个月，粮价就上涨了七百倍。后来，粮价再涨，粮市上已无粮食可卖，有价无市了。据投诚的蒋军官兵讲，城里连青草都要一捆钞票买一捆。金子也不值钱了，一个金镏子只换一个馒头。

敌人为了减轻城内缺粮的压力，缓和矛盾，还采取了恶毒的“杀民养兵”的政策。他们将骨瘦如柴的长春市民，成群结队地驱赶出来。这对我部队的压力很大。我们既要执行封锁任务，又要维护人民群众利益；既要粉碎敌人恶毒的阴谋，又不能让成千上万的百姓饿死。这是一个非常复杂的政策问题。为此我围城对敌斗争委员

会专门设立了难民处理委员会，在前沿和后方设置了大大小小的难民收容所数十个，有计划地收容难民、疏散难民，有的单位还利用难民回去做侦察或瓦解敌军的工作。围城期间，难民委员会共发放了四千万救济粮，六亿元救济金及五百斤食盐。为了救济长春市的难民和减轻当地解放区群众的负担，我们的战士迅速自觉地开展每人每月节约一斤粮的运动。夏季，部队积极组织、帮助抢种荞麦、蔬菜，开展生产自救；秋季，积极帮助人民群众抢收粮食，保卫秋收。人民群众从切身的体验中，深深痛恨蒋匪军，深深热爱人民政府和人民军队。他们纷纷组织起来，配合人民解放军封锁长春。儿童团员站岗放哨查路条，青壮年缉私、抓坏人，昼夜巡逻。这样，军民就筑起了铜墙铁壁，努力做到一粒粮、一根草都运不进长春城。

敌人的阴谋失败了，饥饿降临到蒋匪军自己头上了。敌军从六月份开始，正规军每人每日定量一斤五两，高粱大豆各半；七月一日减少十分之四；八月初，除新七军三十八师每周偶尔能吃一顿大米饭，六十军一八二师能用三分之一高粱米换大豆吃外，余下的四个正规师都发粮代金，由各连自己去买，买到什么吃什么，每人每天发的钱仅够买一斤黄瓜，只能熬些菜汤喝。至于地方保安部队，只能靠抢了，抢到什么吃什么。这样，困守长春的敌军内部，除了共同面临的饥饿之危机外，正

规军中嫡系与非嫡系的矛盾，正规军与地方军的矛盾，再加上广大受害居民与蒋军的矛盾，都异常地尖锐起来，人心浮动，朝不保夕。郑洞国惊呼：“长春象一个断了线的风筝”。

线的确是断了。是被党中央、毛主席、中央军委的英明决策掐断了；是被十万大军筑起的钢铁防线掐断了；是被千百万人民群众的铁臂合围掐断了。

四、政治攻势

由于我人民解放军实行了坚决的军事打击和严密的经济封锁，长春成了一个孤岛、死城。敌人内外交困，呼天不应，叫地不灵，士气大跌，军心浮动。在这种情况下，我军又展开了强大的政治攻势，敌人内部开始崩离析。

六月二十八日，根据围城总方针，围城指挥所召开了第一次政治工作会议。肖华同志在会上提出“攻心为上，攻城为下，心战为上，兵战为下”，充分说明了政治攻势的重要性。会议分析了长春守敌的特点：（1）部队复杂，有中央嫡系部队，云南滇系部队和土匪杂牌军改编的部队，彼此间互相矛盾，相互排斥；（2）断绝了陆上供援，孤点孤军，完全处于被动挨打的地位。随着时间长久，内部困难必日增，士气也愈益低落；（3）经过

我地下党的工作和敌我双方对垒接触的过程中，敌人对我军的政策已有不同程度的了解；（4）东北籍新兵多，归乡心切，盼望东北解放。会议指出，我军必须利用这些矛盾，强化政治攻势，达到削弱敌人的斗志，瓦解敌人的战斗力，最后解放长春的目的。会议具体部署了政治攻势的任务，号召发动群众，创造多种生动、有力的形式瓦解敌军。

一个大规模的群众性的政治攻势在部队中迅速展开。广大指战员以高昂的政治热情和无比的智慧，创造了多种宣传形式。如广泛的阵地喊话。开始经验少，单纯用嘴喊，声音又小又容易暴露。后来，大家做土喇叭，利用各种掩蔽物，有的还发明了“弯形长话筒”，用长竹筒绑成弯曲的形状，一直通向敌人阵地前沿，这样既安全，效果又好。又如散发宣传品。部队创造了打宣传弹，在护城河内放宣传木船等办法，将宣传品送到敌阵地上；有的缝制慰问袋，内装宣传品，开展过节送礼活动；还有的采取给敌人送饭，请敌人过来吃饭，将食品和宣传品同时送给敌人。这些办法效果都很好。我独八师的一个班长李凤春，为了宣传喊话、接逃兵，饭都顾不上吃，觉也顾不上睡，夜以继日的工作，成绩显著。围城指挥所及时通报他的事迹，推动了各部队群众性的瓦解敌军工作的开展。

强大的政治攻势涣散了敌人的军心，大量敌人逃出

城来投诚。敌军为了抵制我军的政治攻势，不得不搞些反宣传。如组织“政工队”到阵地前沿骂阵，在部队实行“连坐法”等等，但终究抵挡不住正义的力量，逃亡投诚者与日俱增。开始，逃过来的人多系土匪杂牌部队的，正规军的较少。特别是新七军三十八师这个一贯妄自尊大的蒋军嫡系部队，逃亡投诚的更少。为改变这一状况，我们分析研究了敌三十八师的人员情况，针对该师多是关内人，思家心切的心理特点，有针对性的组织喊话。不喊让他们投降等带刺激性的口号，而喊“你们是怎样来当兵的”，“你们的家庭、父母妻子在盼望你们”，“你们为谁卖命，死了又是为谁”，“长春内无粮草、外无援兵，没有前途了”，“你们出来，我们一定发路费，放你回家”等等内容。这样喊话起了很大的作用，效果显著，敌三十八师中投诚的日益增多。过来的士兵纷纷说：“你们喊别的都没有什么效果，就是一提家的问题，我们就流泪。”

在军事斗争趋于稳定的情况下，八月五日和十一日，我们发动了两次强大的宣传攻势，八月下旬，又开展了政治攻势突击周，大打政治仗，人人作宣传，个个想办法。领导上组织了两次大检查，利用自己办的刊物《围城简报》推广先进经验。各部队领导带头，从干部到战士纷纷去前沿对敌喊话。有一个部队的机枪班由于不能上前线，全班自动捐献八月份的津贴费，给前线部队做瓦解

敌军之用。我们还组织城外的群众、老人、妇女、儿童以及从长春城内逃出来的难民做工作，利用蒋军家属、俘虏和投诚官兵对敌喊话，都收到了很好的效果。例如我们在解放吉林时，收容了六十军暂二十一师的一个团长的老婆和暂五十二师师长李嵩弟弟的老婆。我们对她们进行教育以后，派人送她们进城；后来还设法找到了李嵩弟弟的孩子，也送进去，给敌军内部以很大的影响。李嵩的弟弟感动地说：“共产党是自古以来最好的仁义之师，蒋介石使我妻离子散，共产党使我家人团聚。”这些对六十军以后的起义也起了很好的作用。在我军强大的政治攻势面前，城内敌人纷纷投诚。由土杂部队到正规军，由士兵到官佐，由徒手到拖枪，由个别到整班整排的投诚。我们在各阵地前沿设立了投诚官兵接待站，在我们敌工部设立总接待所，负责安置这些投诚官兵，愿意留下的就转到吉林后方留守处，愿意回去的发给路费，有些合适的对象就留下或派遣回去做工作。据不完全统计，从六月二十五日至九月底，我们共接收投诚官兵一万三千五百余人，其中新七军三千七百余，六十军三千八百余人，土杂部队六千二百余人。

在大规模开展群众性的瓦解敌军工作的同时，在另一条战线——即在敌军内部，尤其是对六十军上层军官的工作，也在紧张地进行着。六十军原属云南滇系，早在抗日战争时期，我党就派有几位共产党员在这支部队

中工作，使它们受到革命的影响。一九四五年蒋介石强行收编这支部队以后，将他们送往东北战场打内战。党中央正确分析了全国的形势，特别是正确分析了敌人内部嫡系与非嫡系之间的矛盾，精心布置了争取滇军起义的工作。据直接做这项工作的刘浩同志回忆，一九四六年四月，朱总司令、少奇同志亲自找他谈话，作了如何争取滇军起义的具体指示，朱总司令还以滇军旧僚的身份，亲自给孙渡、卢浚泉、曾泽生写信，要他们发扬滇军护国的光荣传统，站在人民一边。刘浩同志受中央委托来到东北后，与在滇军中的我党地下组织接上关系，做了大量的工作。我们将被俘军官中经过教育表现较好的，以派遣方式放回城去做工作。如在梅河口战役中被俘的敌一八四师团长张秉昌、李峥先等，就是这样有计划放回去的。九月二十三日，根据形势的发展，我第一兵团又召开了敌工会议，指出：今后政治工作的方针，除继续开展对敌猛烈的宣传攻势、大量瓦解敌人外，特别要注意做上层的工作，组织战场起义。制造里应外合的条件歼灭长春敌人。为加强策动六十军起义的工作，东北局还委派一九四六年五月在海城起义的原六十军一八四师师长潘朔端同志为我第一兵团副参谋长，同时派我党长期做滇军工作的刘浩、杨滨同志主持东北军区联络部前方办事处的工作。潘朔端利用各种关系给城内上层军官写了不少信。刘浩同志曾化装秘密进城做上层的

工作，六十军中以孙公达同志为首的地下党组织，在此期间也积极工作，扩大影响，发展了一批党员，为六十军起义创造了条件。

回顾围困长春战役期间，部队发扬了我军政治工作的优良传统，为我军的政治工作提供了很好的经验，特别是在瓦解敌军工作方面是有所创新的。

五、和平解放

根据党中央、中央军委和毛泽东同志的英明部署，东北我军出敌不意，首先在锦州摆开了战场。我军主力六个纵队，以雷霆万钧之力，扫清了锦州外围，逼进锦州城垣。十月十日，蒋介石急令郑洞国率部突围。长春守敌因数次突围均遭我痛击而失败，自知突围已是飞蛾投火，即使有幸突出去，这支饿兵困军，也必在半途被我层层截击消灭掉，因而无心再做这种愚蠢的尝试。十月十四日，我军对锦州发动总攻，经三十一个小时的激战，全歼守敌范汉杰部十万余众。锦州大捷，引起东北战局的急剧变化。十月十五日，蒋介石在长春空投手令，要郑洞国立即突围，并以“如再迟延有失机宜，陷全盘战局于不利，该副总司令军长等，即以延抗命令论罪，应受到严厉之军纪裁判”相威胁。这种形势，也加速促成六十军的起义。

十月十四日，我军派遣入城的张秉昌、李峥先同志携带着曾泽生（六十军军长）、白肇学（六十军一八二师师长）、陇耀（六十军暂廿一师师长）的联名投诚信，来到我兵团政治部所在地，政治部主任唐天际同志与潘朔端、刘浩同志研究了信的内容，认为比较可靠，便向兵团司令部报告。这时，我兵团司令部正在开会，研究布署打敌突围问题。会上对曾泽生的投诚信，有一部分领导同志持怀疑态度，认为曾泽生耍花招，以假降骗人，实质是想突围，主张不予理睬。刘浩同志认为，就他与陇耀等人的接触看，六十军在当前走投无路的情况下，起义是可能的，提出愿意冒险进去商谈起义。从当时的形势分析来看，我认为刘浩同志的意见是正确的，我们不应放过任何一个机会。如果能争取六十军起义，对解放长春将有决定性意义。退一步说，如果他们以此为手段突围，也没有什么了不起，我们完全有力量把他们消灭。于是，我即与大家商定，一面把情况向东北局报告，一面派解方参谋长与刘浩同志一起去向张秉昌、李峥先转达了以下意见：对六十军起义表示欢迎，请曾泽生派正式代表出城商谈起义。与此同时，我们也布置了防突围的准备工作。东北局接到我们的报告后，即回电示，应相信六十军是真起义。十六日夜间，六十军派暂廿一师副师长李佐和一八二师副师长任孝中携带蒋介石十五日的空投突围手令和郑洞国的突围计划出城，作为曾泽

生的正式代表与我方商定起义的具体计划。唐天际同志向他们转达了兵团领导的意见，欢迎他们起义，起义后的待遇与解放军完全一样。对他们提出要参加打新七军的要求，答复说：六十军被围时间已很长，官兵们吃不饱，身体虚弱，不必参加解决新七军的战斗了，起义后即出城。曾泽生得知我军的意见后很高兴，十七日便亲自与进城的刘浩同志一起出城，与我们最后商定防务交接计划。十七日午夜十二点，按照预定计划，我接防部队悄然进城，六十军同时撤出城外，开往九台休整。进城部队秩序井然，交接防顺利。天一亮，纵贯长春市南北的大同街以东地区便成了我们的天下。起义后的当天，我与肖华等同志在兵团司令部会见了曾泽生军长及部分起义将领。我说，你率部起义，我们竭诚欢迎。今后我们是一家人了。你们丝毫不孤立，前途是远大的。我们对待起义部队的政治、经济待遇和我们解放军一样，不受任何歧视。曾泽生军长说：我感谢共产党对我六十军四万余众的争取和挽救，得到生存，今后绝对服从命令，接受教育改造。我看曾泽生比较拘谨，就笑着说，你的思想上不要有什么顾虑，你打过日本人，还有战功嘛。今后对我们有什么意见和要求，都可以坦率地讲，一家人了，要情同手足，并肩革命。我与肖华同志与曾泽生军长在一起照了相，以后东北电影制片厂还来拍摄了《民主东北》的记录影片。在六十军开往九台的路上，

起义官兵有的将帽徽扯下扔掉，有的索性将帽子都扔掉了，心情十分高兴。六十军开到九台后，我们派慰问团去慰问，演《白毛女》、《血泪仇》等戏，启发起义官兵的阶级觉悟。大部分起义官兵表现是不错的，当然也有违纪现象。特别是地方土杂部队改编的暂五十二师，问题比较多。我即将离开长春时，去九台看了这支部队。当时有部分同志主张，将五十二师缴械，或官兵分开。我回想改造红五军团时期的经验和毛泽东同志对我的指示，认为这样做不妥，支持了一些同志主张教育改造的意见，并调整干部去掌握这支部队。当时要官不要兵的说法也传到曾泽生军长的耳中。他对我说，我的部队随你们调整，只是希望不要编的太散，我们师以上干部听从你们分配。我看他顾虑重重，即与他谈起自己参加革命的经历，特别谈到北伐战争。我说，那时你在三军，我在二军，我们两个军是同路。那时我参加了国民党，还是师党代表。你们在抗日战争中打过日本人，有战功。我们国共两次合作。现在你参加了革命队伍，就更是一家人了，我们对于起义官兵都是有政策的。我们已作了决定，不久即会将部队改编成中国人民解放军，还要派政治委员来，你的这些意见我们都会考虑，请曾军长放心，不要有什么顾虑。以后，这支起义部队被改编成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五十军，在后来的解放战争、抗美援朝战争中表现都是好的。这些都是后话了。

六十军起义后，郑洞国的后院起火，长春守军更是人心惶惶，朝不保夕。曾泽生起义时，曾想争取郑洞国和新七军一同起义，然而没有成功。六十军起义后，我们发动起义官兵利用各种相识的关系给新七军和敌指挥机关的官兵写信，促其举义。当时，中央考虑，郑洞国是东北“剿总”副司令，是黄埔一期生，所率是蒋军嫡系部队，又占据有着坚固防御工事的大城市，争取其起义，对全国各大战场的蒋军官兵都是一个极大的震动，有很大的意义。十月十八日，中央军委副主席周恩来同志亲拟电报给郑洞国，指出：“目前，全国胜负之局已定。……兄今孤处危城，人心士气久已背离，蒋介石纵数令兄部突围，但已遭解放军重重包围，何能逃脱。曾军长此次举义，已为兄开一为人民立功自赎之门。届此祸福荣辱决于俄顷之际，兄宜回念当年黄埔之革命初衷，毅然重举反帝反封建大旗，率领长春全部守军，宣布反美反蒋，反对国民党反动统治，赞成土地改革，加入中国人民解放军行列……”电报抄好以后，我们即派代表通过关系送进城去。但这时，郑洞国还颇有一些“正统军人”的愚忠愚孝思想，不肯起义。然而防守长春西半部的新七军却已土崩瓦解了。一些部队，已经与我军直接接触了。在大同街两侧，有的部队与我军的电话线已经架通，有的官兵过来与我军一起吃饭，从上而下都要求放下武器，纵然其长官一再命令突围，已全然无人听命。这真是“无

可奈何花落去”，众叛亲离了。十八日新七军派代表与我兵团洽降，达成了协议。十九日上午十时，按照预定方案，我军接收了长春市的西半部。至此时，长春市已全部解放，只有郑洞国与其卫队还占据着中央银行大楼。从当时情况看，要以武力攻占这栋大楼是轻而易举的事，但为什么没有用武力解决呢？一是为了给郑洞国一个最后投诚的机会，避免生灵涂炭，对起义投诚的部队也是一个教育；二是照顾郑部下的良苦用心。为了使郑洞国能“体面的投降”，其部下对我方代表提出以大楼为据点，“抵抗”一二日后再降，要求我们发表郑“负伤被俘”的消息。因此双方商定二十一日晨四时郑洞国率其卫队投降。二十一日凌晨，我带着部队接近了中央银行大楼准备接受郑的投降。四点钟，突然枪声大作，中央银行内向外无目标的射击，枪打得很高。当时潘朔端和我的秘书罗钰如同志正乘坐我的吉普车到前方来，我的司机高桥还被流弹击中了腿。天亮时分，从沈阳方向来了几架飞机，在高空绕了几圈后就回去了。不一会，枪声停止，敌人打出白旗，郑洞国率部投降。于是，长春最后一座敌据点也回到了人民的怀抱。事后我们问他们为什么这样，郑说，“不得不从长计议”。据说，枪响时，郑洞国打开报话机，向蒋介石作了“曾叛李降，弹尽粮绝，退出中央银行大楼”的最后交待。

就这样，敌我双方在对峙了五个月之后，在我军胜

利进军的凯歌声中，结下了这个富有戏剧性的城下之盟。说来也巧，郑洞国所率领的守城部队是国民党第一兵团十万人，而我围城部队的番号和实力也恰好是第一兵团十万人。历史上有时就是这样富有戏剧色彩。郑洞国率部投诚后的第二天，我与肖华同志在四家子兵团司令部会见了。谈话中，我们对他放下武器表示欢迎，并希望他能加入中国人民解放军的行列，为人民的解放事业做些事。郑洞国当时十分颓丧，心灰意冷地表示，从此解甲归田，做老百姓。会见以后，我们以丰盛的饭菜招待了他。饭后，他向我们道谢，说几个月来第一次吃这样好的饭菜。据我们的同志目睹，接收中央银行时，郑洞国的桌子上放着吃剩的马骨头。足见当时长春的困境了。

长春围困战役是我军历史上第一个大的围城战役，是我军采取“久困长围”的方法和平解放具有坚固防御体系的大城市的第一个成功的战例。这一战役的胜利，粉碎了蒋介石撤退长春、回兵沈阳，全力增援锦州葫芦岛的计划，彻底拔掉了蒋介石安在东北我军腹地的一颗钉子，使我军能适时集中全部力量进行辽西会战，从而加速了整个辽沈战役的胜利进程。这一战役的胜利，还为我军和平解放大城市提供了军事斗争、经济斗争和政治斗争等方面的经验，也为据守其他大城市的国民党官兵指出了一条通向光明之路。

长春和平解放，归功于党中央、毛主席的英明部署。长春和平解放，是我围城部队正确执行中央军委、东北局“久困长围”的指示，军事围困，经济封锁、政治攻势三管齐下的结果，这种创造性的工作是很值得总结的。长春和平解放，归功于在敌军内部冒着生命危险做地下工作的同志，他们不怕牺牲艰苦工作，掌握时机与围城部队里应外合，成功地策动了六十军的起义。长春和平解放，还应归功于人民群众的忘我支援。人民群众不但为我军提供后勤保障，还自觉地参加部队的封锁工作。同时曾泽生将军深明大义，毅然起义，为长春解放做出了贡献。郑洞国将军放下武器，率部投诚，也受到人民的欢迎。我们对一切起义和投诚的国民党军的官兵，都是以诚相待。只要是做过有益于人民的工作的人，为人民的解放事业做过好事的人，人民都是不会忘记他们的。

长春解放后的第三天，我们即接到总部的命令，日夜兼程南下，去参加沈阳外围战役。全东北解放后，即率部队入关，奔赴平津战役的战场。

(一九八四年二月)

洛川会谈前后

钱之光

一九三五年十月十九日，中央红军经过二万五千里的长途跋涉，突破了敌人的围追堵截，胜利到达了陕北革命根据地——吴起镇。十一月，中央红军和红十五军团配合，在直罗镇打了一个大胜仗，全歼敌人一个师，击溃一个师，师长牛元峰自杀身亡。这一仗缴获了许多武器弹药，抓获了很多俘虏，给敌人以沉重的打击。同时我党抗日救亡的主张和优待俘虏的行动，对东北军产生很大的影响。张学良本人也受到很大的震动，不得不重新考虑自己的出路。

我党在长征途中，就已经发表了著名的“八一宣言”，号召全国各党派、各界人士和各部队停止敌对行动，共同抗日救国。到达陕北后，十二月在瓦窑堡又召开了政治局会议，进一步确定了毛泽东同志提出的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正确方针。对于我党团结抗日的这些方针政策，当时张学良将军已有所了解。为了争取东北军停止内战，我们党释放了国民党俘虏，首先释放了张学良

的亲信六一九团团长——高福源。高是在榆林桥战役中被我十五军团俘获的，在瓦窑堡住了两个多月。他亲身体会到我军优待俘虏、纪律严明、秋毫无犯、官兵一致的优良作风。亲眼看到我党我军真诚团结抗日的言行。认识到只有团结抗日才有出路，悔恨自己不去打日本人，反而与自己的同胞红军作战，觉得对不起东北的三千万父老兄弟，要求回去做张学良的工作，争取张共同抗日。周恩来副主席亲自接见了高福源。在问明他的安全确有保证以后，就同意让他回西安去对张学良进行劝说。

高福源本来是东北讲武堂毕业的学生，做过张学良卫队营的营长，以后升任为尖子团团长，很受张的器重。

高于一九三六年一月起程，先到洛川，经由东北军六十七军军长王以哲的引见，回去见到了张学良。高向张详细报告了在红军中的所见所闻和自己的切身感受，劝张学良同共产党团结抗日，“打回老家去”。高的劝说，对张学良很有影响。与此同时，我党也通过多种渠道，对张进行了工作。加上张本人有家仇国恨，听了高福源的陈述，因此下了决心，决定与我党谈判共同抗日的问题。他让高立即返回瓦窑堡，请我军派出正式代表，到洛川会谈。这样，就为双方接触，建立了联系。

前 往 洛 川

二月中旬，中央决定，让李克农同志和我一起到洛川同张学良会谈。克农同志是代表团总的负责人。克农同志曾经长期从事党的地下工作，有丰富的斗争经验。中央到达瓦窑堡后，克农同志任中央联络局局长，当时的联络局对外实际上是外事部门的性质。因此，党派他全面负责这次会谈工作。当时我是苏维埃政府国民经济部贸易总局局长，让我负责谈判通商、贸易问题。如果会谈成功，还要我到白区去采购一批苏区急需的物资。

我们是二月二十一日从瓦窑堡出发的。代表团一行除克农同志和我以外，还有中央军委二局研究员戴镜元同志，他以机要译电员的身分参加；还有苏维埃中央政府的一位同志，负责警卫工作；另有中央保卫局的一位饲养员同志。此外，中央还派了两个同志护送，在我们到达郿县（今富县）后，他们就回去了。高福源作为联络员陪我们同行。

我们都骑着马，改了装。克农同志和我身着中山服。我改名叫“徐之光”。戴镜元穿学生服，当时他只有十七岁，个子小，加上很少讲话，有些羞怯，很象刚出远门上学的学生。警卫员是陕北人打扮，头上围一条毛巾，身着对襟白布衫，腰间扎一根布带，怀里藏着驳壳

枪，走在我们前面。高福源也着的是便服。

我们这次出来，是中央派的正式代表，首次与东北军会谈，能否谈成，是很难预料的。当时，我们作了两手准备：一是谈成，两军停战，互不侵犯，相互通商。根据张学良的态度和东北军的情况，以及我们党的政治影响和红军作战能力，这种可能性是存在的。但是，到底是首次接触，我们也不能不作好谈不成的准备。当时我们大家对于党把这样重要的任务交给我们，都感到很振奋，愿意尽最大努力去完成。同时，也感到任务是艰巨的。

瓦窑堡位于延安以北。我们一路从北向南经蟠龙、甘泉、鄜县，到达洛川。为了减少沿途的麻烦，每经城镇总是绕道通过，夜间也总是住宿在红军驻地的村庄。只是在鄜县进了城。那是二月二十五日上午，西北风卷着大雪，从我们的背后和侧面打来，路上积雪很厚，行路确很艰难。我们暂歇在城外一个村子里，由高福源进城联系。城里驻有东北军六十七军一个团，他们早有准备，知道我们已到城外，就由团长亲自出来把我们迎进城去，还款待我们吃了一顿午饭。饭后，我们急向洛川赶去。这时风雪小多了，行军速度也快些，到洛川时已近午夜。

洛川会谈

洛川是东北军六十七军的驻地。我们到达时，军长王以哲、参谋长赵镇藩热情地接待我们。这次会谈是秘密进行的。我们出发时，没有对任何人讲过要到洛川会谈；王以哲、赵镇藩他们更是小心翼翼，生怕泄露出去。他们把我们安排在一个事先准备好的、行人稀少、非常僻静的院子里。六十七军军部驻屯在洛川东门附近的孔庙大院内，我们住的四合院，就在他们的军部旁边。这是一个有三进的四合院，我们住在最后一进，外面有哨兵把守。他们派了参谋处长佟道和一名副官陪我们住在里面，负责双方的联络工作。在这里，他们把生活和伙食都安排得很好，据说是他们的上级长官亲自交待的。

王以哲、赵镇藩接待我们以后，很快向张学良秘密发报汇报情况。我们在出发前，我党中央也以总政治委员毛泽东和司令员彭德怀的名义，电告了张学良和王以哲。张曾表示要亲自参加会谈。但这时，张因事正在南京，所以回电要王、赵妥善招待我们，可以先谈局部问题、具体问题，重大问题等他回来再谈。

当时通商问题是双方都迫切要解决的问题，所以就先从通商问题谈起。在东北军方面有许多问题急需解决。因为我们到达陕北后，接连打了几个胜仗，解放了

许多地方，好些农村成了革命根据地。有些地方也是我们经常活动的游击区。六十七军的部分军队，几个月来被困在城里，买不到粮食和柴火。好些东西靠飞机空投接济，但数量远远不能满足驻军的需要。信件投递更谈不上。加上部队长时期得不到换防，军需装备不好解决。所以他们希望停止内战，互不侵犯，相互通商。当时我们红军也有些困难需要解决。如军需、武器弹药、医疗、器械、药品以及一些必要的电讯、文化设备都很缺乏。同时，陕北地广人稀，土地脊薄，再加国民党的祸害，人民生活极端困难。我们苏维埃政府和红军不但要解决军队自身的给养，还要解决人民生活疾苦的问题，因此通过会谈，打破封锁，也是我们在这次会谈中要解决的重要任务之一。

根据双方的迫切需要，我们到达的第二天就开始和王以哲、赵镇藩进行会谈。双方首先对通商问题交换看法。我们说：当前日寇烧杀掳掠，蹂躏人民，而蒋介石却搞不抵抗政策，给人民带来了深重灾难。我们都是中华儿女，应该枪口对外，收复失地。因此，两军不宜再对立下去，应该尽快解除封锁，实行通商贸易，互通有无，以解决彼此的困难。通过通商贸易，也可以相互走访，加深了解。为此，互相可派人到对方管辖地区采购所需物品，对方不得阻拦；还应给予方便，并保护办货人员的安全。他们说：城里部队被围困几个月，粮食、

柴火、蔬菜等农副产品供应缺乏，他们希望：一是由他们派人下乡采购，二是由我们动员老乡送货进城。他们还要求恢复六十七军在郿县、甘泉、延安公路上的交通运输，并允许被困在甘泉县的两个营换防。当时，克农同志又具体讲了大敌当前，应该停止内战、团结起来、一致抗日等我党的主张，并提出各守现有驻地等等问题。我们随时把谈判的情况，用密电向中央作了汇报。

会谈就红军与东北军六十七军局部合作问题达成了几项口头协议：

政治方面：他们正式同意我党提出的“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主张。

军事方面：确定双方互不侵犯，各守原防（包括六十七军在陕甘边区及关中地区的防地），我方允许在甘泉被围困半年的六十七军的两个营重新换防。

经济方面：恢复红、白区通商，恢复六十七军在郿县、甘泉、延安公路上的交通经济往来。延安、甘泉两地六十七军所需的粮食、柴火等物，一是六十七军自己向当地苏区群众购买；一是红军转饬当地苏维埃发动群众送粮、送柴进城出卖，便利东北军。双方都可互派人员到对方驻地办货。双方对办货人员要负保护之责，并给予方便。但为掩人耳目，办货人员应着便服。

以上口头协议商定后，我们也以密电向中央汇报，得到批准。双方约定自三月五日起秘密下达执行。

洛川续谈

张学良是三月三日从南京回到西安的。四日亲自驾驶飞机，飞抵洛川。到后就来我们住处看望。他身着便装，手拄文明棍，貌似商人。用他自己的话说：“我是来做大买卖的，搞的是整销，不是零售。”克农同志握住他的手说：“张将军，你解甲从商啦！”随即是一阵笑声。虽然是第一次见面，但主客之间都不拘形迹，比较随便。

下午三点左右，就在我们住地开始了会谈。张学良谈了几个方面的问题。他首先表示：会谈开始的情况，已听过王、赵的报告，认为很好，完全同意那几项协议。接着谈到国际国内形势。他先请我们发表中共方面的看法，并问中共对抗日战争的看法。对这两个问题，克农同志根据中央瓦窑堡会议的精神，作了解释说明。张又提出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和我军东征的问题。他认为我们东征既然是抗日，就不应该走山西，而应该走宁夏、绥远；认为我们讲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不包括蒋介石不行，他说蒋介石有国家政权、军队、财权，实力雄厚；还说蒋这个人什么都干得出来。

克农同志解释东征取道山西，是为了号召全国人民起来共同抗日和解决我军军需与兵源的问题。至于抗日统一战线包括不包括蒋介石，这取决于蒋介石本人。我

党“八一宣言”和瓦窑堡会议，对国际国内形势，对中日政治、经济、军事等情况，都已作了透彻的分析。提出停止内战、团结抗日、全国总动员、全民总动员、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等主张。目前我军正开赴抗日前线，对日作战。这些都是符合全国人民意愿的。而蒋介石从“九一八”事变以来，不仅不抗日，反而继续坚持反共反人民的政策，镇压抗日民众，“围剿”抗日红军，坚持他的“攘外必先安内”的错误政策。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与他合作，岂不是与虎谋皮吗？在这个问题上，双方展开了坦率的争论。最后克农同志表示：你的意见，我们可以向党中央汇报。这次会谈，对联蒋抗日还是反蒋抗日的问题，双方没有取得一致的看法。

我们的会谈，持续到五日凌晨四点左右才结束。双方确定了这样几条协议：

一、我方请示中央，请毛泽东同志或周恩来同志与张学良当面会晤，进一步商谈抗日救国大计。地点初步定在肤施县城（延安），时间由我方决定。

二、为了推动国防政府的成立和组织抗日联军的活动，由我方派一位代表常驻西安（即后来派的刘鼎同志），由张学良给以灰色名义作掩护，以便开展工作。

三、红军与东北军派代表出国的路线问题，由张学良负责与新疆盛世才联系。

四、这是一次重要的秘密会谈，不登报，不外传，

只在双方部队秘密实施。

会谈期间，除商定这些问题外，彼此还作了进一步交谈，使张学良对我党抗日救国的一系列方针政策，有了比较深刻的了解。这次会谈虽是初步接触，是打前站的性质，但确是很重要的。它在联合抗日问题上，迈出了可喜的一步，为周恩来副主席同张学良在延安进一步的商谈，铺平了道路。

四月九日，周副主席偕李克农同志等到肤施（延安）与张学良、王以哲会商联合抗日救国大计。在谈到是否联蒋抗日这个问题时，恩来同志说：抗战如果争取不到蒋介石这个集团参加，将是一个大的损失，争取过来是有好处的。但蒋介石是中国大官僚买办阶级的头子，视人民为死敌，他的指导思想是西太后的“宁予外人，不给家奴”的思想，所以他采取了“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对外实行不抵抗主义，使日寇占领了我东北全境，在华北长驱直入，如履平地。使我无数炎黄子孙，惨死在日寇的铁蹄之下。对内他又疯狂镇压抗日民众，“围剿”抗日红军，实际上充当了日本帝国主义的走狗。不过，为了抗日大计，我们可以既往不咎，愿意争取这个力量。但是先让步是不行的。让步太多，会使不知足的人认为我们软弱可欺，在这方面我们是有教训的。所以要让步，还得要斗争；只有经过斗争，才能达到真正的团结。最后商定：由张在里面劝，我们在外面逼，内外

夹攻，逼蒋抗日。这次会谈，就成为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和实行第二次国共合作的重要契机

前 往 西 安

由于洛川会谈顺利，我便执行中央交给的下一个任务——到西安采购苏区急需的物资。会谈后第二天，我单枪匹马前往西安。克农同志和戴镜元同志及一名警卫员共三人，于七日径返我军抗日前线——山西石楼，向毛泽东主席和周恩来副主席汇报。我在离开洛川时，为了让我行动方便，王以哲让我换上了他们的军装，骑上他们的战马，改扮成他们的军官；还派一名副官随行，作为我的联络员。

有一天上午，马跑得很累，需要加料，我们就在一个驻有东北军的地方休息下来。我让随行副官进营区联系，我就一个人在路边徘徊。路边有个球场，一个正在打球的东北军士兵走过来主动同我搭话：“你是哪一部分的？从哪里来呀？”我答：“是军部的，从军部来。”他听我是南方口音，以为我是南京方面派来的。他说：“你是南京派来的吧！我们政治部有个部门几乎都是南方人，他们都是南京派来的，你是跟他们一块的吧！”他边说，边用警惕和不满的眼光看着我。当我随便点点头以后，他勉强笑了一下，说：“对不起，打搅了”，就转身径向营区

奔去。他的行动，引起了我的注意。我本想同他聊聊，了解点情况。但他的突然离开，倒使我有点迷惑。我打量自己的装束和刚才的讲话，是否有什么破绽？等那位副官回来后，我问他：“你们政治部是不是有个部门南方人很多？”他说：“是的，这些人是蒋介石派来的特务。”这时我才恍然大悟，理解了刚才那个士兵为什么是那样的态度。从这件小事，可以看到南京特务活动的猖獗，也可以看出东北军普遍对南京方面的愤恨和不满。

到了西安，他们把我安排在他们的一个宿舍里住下来。这个宿舍，只有几个人住，很少有人往来。为了我的安全，他们告诉我尽量少出门，不要上街去活动。我要购买的东西，由我开出货单，交他们负责办理。有些东西，西安也没有货，要到上海、天津、北京订货。当时我们很需要一台好的石印机，解决印钞票的问题。本来在江西苏区时，我们有印刷机，长征途中由于要轻装，把它丢掉了。到陕北后，要稳定金融，发展生产，必需自己发行钞票。可是，当时我们没有象样的印刷机器，靠木刻手工印刷，要先在好的硬杂木上雕刻出图案、字码，然后再套色印刷。工序多，效率低，印不了多少又要换版，印出的票面很不清晰。印制速度慢，满足不了苏区生产发展的需要，而且图案不清，也影响货币信用的严肃性。所以到西安办货，购置一台好的印刷机，也是我这次出来要办的一件重要事。后来，得到东北军方

面的帮助，从上海给买来了一台好的石印机。当然，他们是不知道我们的用途的。

为了掌握一些市场的情况，了解一些政治动向和西安的风土人情，以利于开展工作，有时我也单独出去活动。一次，我在大街上迎面碰到我的同乡张以民和他的爱人。张以民原是大革命时期的党员，他领导诸暨暴动失败，被国民党通缉，流亡在外。一段时间与党失掉联系。这时我忽然见到了他们，因为不知底细，想马上转身避开，但已经来不及了。他们老远就按在家乡的习惯叫我：“光友哥，你在这里呀！人家都说你不在人世了，乡里人都传遍了，没想到你还在这里。”他们认为我死了，不是没有原因的。我参加革命后，反动派曾到我家里抓我，没有抓到。第二天夜间，我偷偷回去和母亲告别，就秘密离开，从此和家里很少往来。到苏区后，就中断了音信。所以他们在这里突然见到我，自然十分惊讶。当时我不好如实回答他们热情的问话，只是说：“我在他们军队里，住的地方经常变动。”后来，我知道张以民在西安《西北文化日报》工作，化名张从仁。同时知道，家乡的边雪风也在里边工作。边原来也是党员，不过已好多年不联系了。事后，我与张以民见了面。他邀我到饭馆便餐，我考虑后同意了。在吃饭中间，我问他这几年的情况，从各方面来看，他还是朋友。后来我们又在莲湖公园密谈了一次，就谈得深一些。他说：“他们的社

长是宋绮云，比较进步，同杨虎城的关系密切，是杨的秘书。”其实宋是我们的秘密党员。由于张的介绍，我与宋绮云同志见了面。他很热情，谈了很多情况，我在他这里了解到杨虎城已与我们有了接触，他也倾向停止内战，团结抗日。可惜后来宋绮云同志同杨虎城将军一起在重庆被国民党杀害了，他就是《红岩》中小萝卜头的爸爸。

我在西安住了将近两个月，办了不少东西，除印钞票的机器外，还有无线电器材、烈性炸药、贵重药品、高级纸张等物资。这些东西，都由东北军用汽车送到洛川六十七军军部。我则由他们的联络员陪同乘小汽车回到洛川。这次由六十七军的参谋长赵镇藩招待了我，并商定由他们负责把这批物资运到双方防地的交界处。

返回瓦窑堡

我在洛川休息了两天。他们调集了二十几匹牲口帮助我们运送物资，并派人护送。长长的马队，蜿蜒行进在山谷、田野间，乍看起来，很是壮观。从洛川到瓦窑堡有好几天的路程。有时走了很长时间，还是人烟稀少。并且要经过一些深山密林，这一带有土匪出没，经常发生抢劫。有些地方的“民团”，也在活动，杀人劫货，无恶不作。我们这么长的队伍，虽然进行了伪装，但还是

很惹人注目的。这时虽有东北军护送，但毕竟不是红军。我方只有我一个人，此时此刻，深感责任重大，所以警惕性很高，随时准备应付突然事变。每到险要的地方，我总要先派人探探虚实，然后再行进。晚上也尽量赶到有东北军驻屯的地方住宿。到达甘泉县时，东北军的驻防团长张文清接待了我们。原先是准备安排我们过夜的，但他们看到有这么多东西，怕在他们管辖区域内出事，所以让我们略为休息后，继续赶路。

在一天夜幕将临的时候，我们到达了与苏区交界的地方。本来事先商定我们的人马到这一带来接应，六十七军护送的人马就撤回去。可是到了这里，却不见我们的人，等到晚上还未见来。护送人员看到天色已晚，再向前就是苏区，不便前进，要求在这里过夜。我即安排住宿，招待他们吃饭。我就去找当地负责人接头。

我们停留之处，是一个小村庄，这里已有半公开的党组织。村长是我们的同志。我找他商量动员送货的事。他见东西很多，非常吃惊，说：“唉呀，这么多东西，动员人倒好说，一下子要那么多牲口，困难还不小。”我说：“不管怎么样，你得赶快想办法，我们不能在这里久留。”我还从他那里了解到，这里地势险要，四周都是高山峻岭，悬崖峭壁，常有土匪。“民团”到这里袭击，也是常有的事。于是，我们进一步伪装货物，又交待村长注意封锁消息，并请他派可靠的人看守。但即使这样，

这一夜我仍然辗转反侧，不能入睡，不时起来观察动静。天亮后，村长东跑西奔了一阵，动员的牲口陆续到齐。我很早就起来，先安排六十七军护送人员吃完早饭，送走了他们，我们的队伍才向前进发。大约到上午十点左右，碰上了贸易总局派来接我的同志。他高兴地说：“钱局长，可把你等来啦！”我见只有他一个人，不禁惊异地问道：“还有人吗？”他说：“还有呢，都在林子里。”说着用手指着路旁的树林，然后拾起几块石头，向林中抛去。不一会，我们的人和牲口都出来了。大家赶紧动手卸东西，换牲口。他们告诉我，已在这里埋伏等候一天一夜了，因为没有与我取得联系，不敢贸然行动，所以就在这条必经之路上隐蔽下来，等候我们的到来。

我们装卸好货物以后，辞谢了帮助运输的老乡，迅速赶回了瓦窑堡。当时采办的这些东西，对于本来就很贫困、又被国民党长期封锁的瓦窑堡来说，是十分稀罕的。老乡们都在门口看热闹。我回到外贸总局，我们的同志已来了不少。林伯渠、王稼祥等负责同志也来了解情况。他们听完我的汇报后，亲自去看买回的物资。他们都很高兴，认为这次收获不小。林老看到石印机高兴地说：“之光，你买回这部印刷机可解决问题呀！以后我们印票子，图案就不会那么模糊了，印起来也就快得多了！”王稼祥同志见到买回的药品中有他所需要的药物，更为高兴，说：“没有想到这种药你也弄到了！”我说：“这

是中央的决策好，也要感谢东北军的帮助。”稼祥同志的这种心情，反映了我们成百上千红军伤病员的共同心愿，因为有了药品，他们得到治疗，才可以重返前线。后来，这批物资分别交给有关部门，解决了一些急需解决的问题。

回忆这一段往事，不难看出，洛川会谈为以后的延安谈判开辟了道路，为红军与东北军的全面合作、一致抗日，为彻底打破国民党的经济封锁，都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对后来国共两党停止内战、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有很大的影响。洛川会谈的成功及在西安顺利完成办货的任务，都是我党在政治上、军事上胜利的结果。

一九八三年十二月

艳晚事件

宋 黎

一九三六年八月二十九日晚，在西安发生了令人震惊的“艳晚事件”。当时，我们作为张学良将军邀请的学生代表，曾是“艳晚事件”的主要当事人。

一、“艳晚事件”前的有关情况

一九三六年七、八月间，我从多方面得悉，国民党特务正在加紧活动，严密监视我们的行踪，当时我们处境十分危险，需要做好准备。因我们是东北大学校长张学良请来的学生代表，又是“总部”^①安排住在西北饭店的，搬迁需要通过张。刘澜波同志听了我的汇报后，即向上级党请示。上级党向张打招呼说：你的两个学生在西安宣传抗日，他们住处很不安全，是不是送到我们那里（指苏区）去？那边抗日自由，也安全。张表示不同意，

^① 指国民党西北剿匪总司令部。

说：“我这里也抗日，我的学生还是留在我这儿吧！”鉴于张校长这个态度，上级党要我们直接同张面谈，并指示：“如果他对你们安全不负责，可自行搬迁。”

根据党的指示，我到张公馆见张学良将军，直截了当地说：“张校长，我们想回北平。”张问为什么要走呢？我说：“我们搞抗日活动，国民党反对，要镇压。我们住在西北饭店很不安全，一些不三不四的人在窗前房后转来转去，还偷翻我们东西。我们想回北平，那里学生多，比较安全。”

张校长略加思考后说：“送你们去兰州暂时避一避，我通知于学忠让他安排，你看怎么样？”

由于我们的目的是为了得到安全保证，以便继续在西安从事抗日活动，所以我婉言谢绝说：“西安城市大，有校长在都不安全，兰州地方小，又远离校长，更不安全了。”张听出我不愿去兰州，马上问我：“你是不是共产党？如果你是共产党，我可以通过上海李杜送你去东北抗日。”

我理解张学良将军的心意，但共产党员不能随便暴露自己的政治面目，就说：“我不是共产党，也不去东北，我想回北平。北平有学联，抗日同学多，在同学队伍里可以互相保护，比较安全。在这里孤孤单单不安全。”接着我进一步说：“我们来西安时间不算短了，没做多少抗日工作，反倒给校长惹来许多麻烦。我走对校长好，不

至于因我出了问题引起人们议论，说张副司令带兵几十万，连一个抗日学生都保护不了。”

张听我讲完，心情十分沉重，在房里踱来踱去，随后果断地说：“你们哪儿也不用去，就住在西北饭店，反正我还带兵，可以保证你们安全。”

事后，我向刘澜波同志作了汇报。经研究决定，我们继续住在西北饭店。为了防止意外，我们做了必要的准备：将机密的東西处理好；通知与我们有联系的抗日人员暂停来往。

二、“艳晚事件”的经过

1、拒 捕

一九三六年八月二十九日，我接到西安绥靖公署交际处长申伯纯的电话，暗示国民党特务可能对我们采取行动，要我们加倍小心谨慎。情况危急，我让马绍周速到“总部”政训处找他的熟人弄清情况，以便决定对策。后来知道，他出去后就被特务逮捕了，羁押在国民党陕西省党部。

马绍周刚走，东北中学学生代表团几个人进来找我，研究撤换东北中学校长王化一的事。当时我心里很急，考虑他们年纪轻，怕吓着他们不好明讲，又担心随时可

能发生意外，只简略说了几句就让他们走了。代表团负责人曹富琨(曹裕民)留下来要跟我深谈，我不好推辞。他正在讲着，突然门被踢开，接着闯进两个人，进门就喊：“宋黎！”我一目了然，顺口回答：“不在家，出去了！”特务横眉竖目、声嘶力竭地叫道：“就是你！”说完猛扑过来把我和曹富琨一起逮捕了。两个特务架起我的两只胳膊往外拽，刚出房门，特务头目对他的喽罗宣布：“抓到了共产党要犯！命令谁也不许打电话，不许走露风声，来一个捕一个。”

我意识到事态极为严重，为了让别人知道我被捕了，避免再来我房间陷入罗网，我边挣脱边大喊：“你们这是干什么？”突然，一个特务朝我的背上狠狠地猛击一拳，顿时我觉得呼吸十分困难，腰都直不起来（因此患了肋膜炎，至今还留有后遗症）。特务边打边骂：“妈的，你还不明白?! 不许说话！”

西北饭店分前、中、后三个院落，我们原住在中院，因为六十七军参谋长赵国屏夫人有病，要和我们换房，为了统战工作，我们就和他调换了住室。我和马绍周住到后院，房间象个地下室，进出要走楼梯式台阶，经过东大新任秘书长周鲸文房前，我以为他在家，连声高喊：“土匪绑架！”“土匪绑架！”路过他房前时发现屋里没有灯光，显然他没在。我灵机一动，抱住身边一根木柱子不走。

这时，爱国民主人士车向忱先生迎面走来。一个特务说：“这个老头来了，逮捕他！”抓我的三个特务分出一个去抓车，剩下两个特务拖不动我。一会儿，那个特务空手回来造谣说：“车带了枪……赶快先把这个送走。”三个特务把我抬起来，我极力反抗，他们费了很大力气才把我弄出小院。我趁机猛然挣脱出来，又跑回小院，发现车向忱先生还没逃走。特务追进院来只顾抓我，七手八脚把我拖出西北饭店后门，车先生这才乘机脱身，离开了险地。

从西北饭店后门出来往北走有个十字路口，那里有杨虎城将军的岗哨，是通往新城方向去的，特务怕出差错，便直奔正南大街走。一路上，只要遇到树木或电线杆，我便抱住不放。那天是星期六，晚上行人比较多，我不断大喊：“土匪绑架！”一个值勤的警察端着步枪跑来问：“怎么回事？”特务说：“我们是省党部的。混蛋！你还看不明白？！”警察没敢还言，眼瞅着特务把我架走。忽然，我发现只有一个特务押着曹富琨，就向他高喊：“快跑！快跑！”曹一转身，从西北饭店前门跑进前院楼上。那里住着东北大学、东北中学学生代表团十多个人，其中东大代表有景全丰、萧润和等五、六个人。因学生较多，特务没敢进去，三、四个特务把我抬起来往省党部走。后来听说，有几个学生代表跑出来试图营救我，但没有成功。

2、截 夺

西北饭店与国民党陕西省党部在一条大街上，相距二里路左右。眼看快到省党部门前了，恰巧十七路军宪兵营骑兵巡逻队迎面而来，我大喊：“土匪绑架！土匪绑架！”巡逻队五、六个人跳下马先缴了特务的械，然后喝问：“怎么回事，为什么抓人？”

特务抢先说：“我们是省党部的，他是刚捉到的共产党要犯！”我赶紧分辩：“我不是共产党要犯，他们是土匪绑架。我叫宋黎，是张副司令请来的东大学生代表，我是副司令的秘书。”巡逻队中有人认识我，因为我在西北饭店已住了半年多，负责查店的宪兵知道我的姓名和公开身分，我又去过西安绥靖公署，在西北军中宣传过抗日，因此不少人认识我。一位巡逻队员机智地向特务要逮捕证，特务强词夺理地说没有逮捕证！巡逻队员质问特务：“没有逮捕证为什么抓人？”一个特务趾高气扬地说：“我们是奉蒋委员长命令逮捕共产党要犯，你们别来碍事。不信跟我们一起去省党部问问。”特务们蛮横地坚持要把我送交省党部。我强硬地说：“我是张副司令的秘书，要送就送交张副司令或杨主任。”这时认识我的巡逻队员向他们队长说：“他讲他们是土匪；他们说他是共产党要犯，我们管不了这些，我们巡逻队查街遇到此事，都应上交杨主任处理。若不然杨主任向我们要人我们怎

么办？张副司令知道后向我们要人，我们哪儿去找？”巡逻队长听了点头同意，便高声说：“带走，都上交。”特务们无可奈何，只好如此了。我想，若把我交到巡逻队连部，必得走西大街，从国民党宪兵一团门前经过，倘生不测，这岂不是躲过虎口又进狼窝！我连忙说：“你们连队处理不了我的问题，干脆送交营部吧，营部离这儿又近。”巡逻队长表示同意，于是把我和特务一起带往端履门十七路军宪兵营部。特务怕我跑了，拽着我的一只胳膊，巡逻队怕我被拖跑，拽着我另一只胳膊。路过西北饭店时，我要求进去给张副司令打个电话，巡逻队同意，特务不放心，跟在我身旁监视。

接电话的是张学良将军的秘书，他说副司令正在开会。我请他转告张校长：“我被省党部逮捕了，现在已被十七路军宪兵巡逻队截夺下来，正带往营部途中。为了避免学生代表驻地发生恐慌，请副司令派人到西北饭店维持秩序。”秘书说：“听明白了，我一定报告副司令。张副司令已经知道你们的事情了。”

到了宪兵营部，开始把我暂押在值班室，过了一会儿又被带到另一个办公室。一个排长对特务说：“我证明这个人是在东北大学的学生代表，住在西北饭店，是张副司令请来的。”特务坚持说：“这个人是共产党要犯，需要对他立即搜查。”说着一个箭步窜到我的面前，伸手就要翻我的衣兜。我双手捂住说：“你们是土匪，无权搜查我。”

你把手伸进我兜里，说是搜查，趁机塞东西栽脏怎么办？”那位排长厉声说：“这是我们宪兵营的地方，你们不能随便搜查！要搜查也得我们搜。”特务没办法，只好由宪兵营的人把我从上到下搜查一遍。翻出来的东西主要是名片，有张、杨两将军的，也有军长、师长的，我总是随身带着当挡箭牌用。宪兵营的战士把搜出来的东西都拿走了，然后把我和特务分别羁押在两个房间等候处理。

不久，宪兵营的营副谢晋生来了。他以特务捕人既无公文又无逮捕证，事先又没和宪兵营联系共同办理为由，严词拒绝交人。特务迫于无奈，提出让他们回省党部取公文来提人。谢营副明白硬顶顶不住，就同意特务回去办理提人手续，借此拖延时间再想别的办法。特务临走时威胁说：“宋黎是共产党要犯，蒋委员长下令逮捕他，不能让他跑了，也不准把他交给任何人！”此话，隔着纸窗我听得清清楚楚。接着听到谢营副在外面嚷：“你们办手续去吧，办妥了再来提人！”

3、协同营救

特务们刚走，大门咣地一声关上了。谢营副走进来让我到他办公室，对我说：“这件事闹得很大，各方正在设法解救。刚才搜出的东西全在桌子上，你看看，有碍事的就处理掉，特务回来还得要这些东西。”又说：“你放心，没有我盖章谁也提不走人，不过还得审讯一下，留个口

供。主持审讯的人你认识，是李木庵。我马上找杨主任去给你活动活动。这里有电话，你可以用。”说完急急忙忙地走了。

过了一会儿，十七路军的军法官李木庵（地下党员，西北特支领导成员）来了。我们一起研究了“口供”，除了姓名、年龄、籍贯、职业等俗套外，主要讲我来西安是张副司令请的，一贯奉公守法，不是共产党，我主张抗日，但抗日无罪……然后按一问一答形式记录在案。李木庵同志嘱我记住“口供”，按了手印，便匆匆走了。

李走后，申伯纯来电话说：“你的事张副司令、杨主任都知道了。你在宪兵营很安全，不要急，稍稍委屈一下。”紧接着，宪兵营的一位士兵（姓名记不住了）来看我，说有事要办可找他联系。我不认识他，不敢深谈，只写了一个报“平安”的便条，请他送到西北饭店东大学生代表团那里。

为了营救我，谢营副长急忙向杨虎城将军报告。当时杨已入寝，侍从副官不敢惊动；谢转向绥靖公署交际处长申伯纯请示，申立即转告了杨虎城将军的机要秘书王菊人，王报告了杨将军。杨当即决定迅速报告张副司令，由张下令提人，并研究了几条应付省党部的措施。

张学良将军得到报告后，立即派他的随从参谋孙铭久驱车急赴十七路军宪兵营部。孙见到我说：“你的事张副司令都知道了。我奉副司令的命令来接你。”就这样，

把我转移到张公馆。事后得知，我刚被接走，省党部的两卡车武装人员开到宪兵营部，持省党部公文提人。值班的讲：“张副司令把人提走了。”他们不相信，一再索人，并向宪兵营反要提人的证据。宪兵营一面跟特务周旋，一面火速派人去张公馆补办提人手续。张学良将军亲笔给十七路军宪兵营写了个手令，应付过去。特务们忙了半宿，只拿到一纸空文，垂头丧气地返回省党部。

4、调兵遣将

张学良将军听到我被捕的消息，愤然说道：“捉人居然捉到我头上来了！”他一面命令孙铭久去接我，一面由孙铭久派参秘室工作人员关时润（吴俊如）去西北饭店我的住室取筹办学兵队的材料，以免落入特务手中。关去后被守候在那里的特务逮捕了，同马绍周一起押在省党部。张学良将军得知这些情况，既为国民党特务如此胆大妄为而震怒，又担心被捕人的安全，为此断然决定采取军事行动。

我被接到张公馆时，张将军正在召开紧急军事会议，部署这次行动。我在楼下客厅等候不到半小时，张校长走进来对我说：“你被捕的情况我全都知道了。这件事不能小看，这是国民党看不起我们，欺人太甚！”接着又说：“刚才我开了个军事会议，要把被捕的人救出来。城里我的兵力少，只有一个警卫团，而国民党有三个团——

公安队一个团、别动队一个团，还有中央宪兵一个团。为了防止意外，我已下令从王曲调一个步兵团急行军进城；宣布戒严；调晏道刚到公馆谈话（晏是“总部”参谋长，蒋介石的亲信），防止他采取行动。这样部署，你看怎么样？”

我看张学良将军准备跟国民党公开干了，非常高兴，但觉得不够劲，为了扩大事态，促使张公开走向抗日，就加一把火说：“张校长是这里的代总司令，他们逮捕您的学生和职员，竟不通过您，这不是无法无天、目无副司令吗？要干就大干，越大越好！”张将军不露声色地看了看我，继续说：“我已命令今夜戒严，邵力子必来询问原因。他来时你到我的办公室去，听听他讲些什么，是否符合你的情况，如不符合要告诉我。”张校长带我到他的办公室。过了一会儿，侍卫大声报告：“陕西省政府邵主席到！”他随手把门虚掩上，来到外间客厅。

邵力子刚迈进客厅门槛，张学良将军一反谈笑风生的常态，勃然大怒地质问：“省党部逮捕我的学生、秘书和职员，为什么不通过我？我是‘剿匪总部’的副司令代总司令，是代表蒋委员长的；我是国民党中央常委，即使是抓共产党也应该让我知道！省党部竟如此藐视我，胆敢擅自抓我的人，我一定要严办！”

邵力子先生从未见过张学良将军发这么大的脾气，也从未见过对他如此不恭，不禁有些惶恐不安，连声说：

“副司令息怒！副司令息怒！这件事我不知道，我查明后马上报告，事情由我负责。”张说：“那就请你负责查明，把抓去的人尽快送回！”

5、查抄省党部

张学良将军对特务疯狂镇压抗日学生极为愤怒，同时也怀疑陕西省党部藏有诬告东北军的材料。邵力子告辞后，他便命令副官长兼一〇五师副师长谭海率领卫队营查抄了国民党陕西省党部，随同去的还有参谋孙铭久。他们救出了马绍周、关时润，还缴获了省党部诬告东北军的密电和准备逮捕的东北军参加抗日活动的三百多人名单。

张学良将军采取军事行动后，为了了解南京的反应，便同“总部”政训处副处长黎天才（原是共产党员，大革命时叛变）通电话，黎说：“……青年学生能靠得住吗？”只听张将军命令他立即把“证据”送来。“证据”送到后，张校长毫无戒心地让我跟他一起翻阅。特务的行动真可谓神速，已经把我的“罪证”编了号。“一号证据”是东大学生代表邹素寒学习俄语的单词纸条，放在我的房间里，特务把它当作“密码”搜走了。张见特务如此无知，讥讽地说：“什么密码！真可笑！这不算数。”“二号证据”是我向张校长建议为充实东北军抗日力量办陆军学校（后改称学兵队）底稿中的两页，是从我住室办公桌抽屉底

下报纸中发现的，上面有“卖国贼的头子蒋介石”等字句。特务如获至宝，在这句话下面重重地划了一条红杠。张校长看了说：“这也算不了什么，学生常常发牢骚骂人。”说完把它放在桌子上嘱咐我：“这上面已经划了红杠，说明他们看过了，不要丢掉。”他越往下看，“证据”越没份量，越不象“证据”，就放心了。而我的心里却很不平静。因为从敌人在我的住室里搜出上述两页底稿这件事，使我意识到，我对敌人还缺乏足够的警惕，保密工作做得不细，出现了漏洞。

6、斗争在继续

邵力子受命查明省党部捕人情况后返回张公馆，向张将军复命。其时，张已查抄了国民党陕西省党部，正同我继续在办公室里审查“证据”。邵力子到后，张在办公室外间客厅里第二次接见他。这次邵力子谈话的声音变高了，他说：“我已向省党部几位常委查明，捕人确有其事，是南京调统室派来的人直接指挥捕的，省党部常委也不清楚。他们捕人是奉蒋总裁的电令，点名逮捕的还有刘澜波、孙万发(孙达生)、栗又文。省党部事先没有请示副司令是他们的严重错误，现在托我向副司令请示如何处理。”张学良将军听到此处，只低声说了一句：“把原电送来。”电报很快就送来了，张将军看了电报，和颜悦色地向邵力子说：“深夜惊动很对不起，请回去休息

吧！”

邵力子告辞后，张校长走进办公室，疑惑地对我说：“这份电报有马绍周、刘澜波、孙万发、栗又文的名字，却没有你，没有马绍周也应有你呀！因为有你的通缉令。”他判断这是“抄件”，不是原件。后来得知，蒋介石亲自点名逮捕的名单里不仅有我，而且计划捉到后立即把我解到南京，押送我的飞机已经停在机场上随时准备起飞。由于我拒捕和张将军宣布戒严，调兵遣将查抄省党部，使蒋介石的计划破了产。

这就是一九三六年八月二十九日晚发生的事件，按韵目排列，这天是“艳”，因此被称为“艳晚事件”。

蒋介石亲自下令逮捕我们几个人，矛头也是指向张学良将军的。张意识到这点，来了个“先斩后奏”。“艳晚”第二天，他给蒋介石发急电，大意说：省党部捕去的马绍周等系“剿总”职员，如他们有越轨行为应通知“总部”惩处，省党部不经正式手续，派便衣夜里逮捕“总部”成员是不信任学良，不信任“剿总”，群情激愤，急于向省党部直接索还被捕人员。惟因事出仓促，未能事先呈请钧座，不无急躁之失，请予处分，并拟将马绍周等交“总部”军法机关严加审讯。

“总部”政训处长，蒋介石的心腹曾扩情于“艳晚”第二天清晨乘飞机赶往广州向蒋介石密报。蒋介石虽然收到了张学良将军的电报，又听了曾扩情的报告，仍觉

得心中无数，便从广州给邵力子发报，问查抄省党部是怎么回事？与张学良扬言抗日是否有关？邵回电说：事情已经结束，张确有抗日之心，但他抗日必听委座的命令。此时，蒋介石正忙于处理两广事变，一时腾不出手来，无暇对付西北。因此尽管他对张学良将军这一“不轨行为”恨得咬牙切齿，但为了缓和矛盾先把张稳住，很快给张回了个电报：我弟处理此案殊失莽撞，惟既知错误，后当注意，所请求处分一节，应免置议。至于马绍周等的审查，准如所拟办理。

为了应付蒋介石和国民党特务，避免新的麻烦，张将军在给蒋介石发出电报后，采取了两条措施：一是宣布我已“失踪”，二是主动按蒋介石捕人名单“逮捕”了马绍周、刘澜波、孙万发。刘澜波和孙万发同志事先已经知道了即将被捕。刘考虑孙在东北军没有军籍，于斗争不利，为了他的安全让他立即离开，自己一个人顶着。孙万发同志离开后，刘澜波同志被捕了。过了一、两天，孙万发同志给孙铭久打电话，孙铭久知道了孙万发同志的住址，因此亦将孙万发同志逮捕，同刘澜波同志一起关押在军警督察处。栗又文同志在“艳晚事件”前已被张学良将军派往新疆联络盛世才抗日，不在西安，“没有抓到”。

我“失踪”后，被安置在张公馆东楼里。张学良将军曾找我问：“刘澜波、孙万发是什么人，你知道不？”我回

答说：“刘澜波是黄显声军长的秘书，跟刘多荃师长是自家兄弟。孙万发是杜重远先生的朋友，是杜介绍到这里来的。”黄显声、杜重远都是张学良将军的好友，我强调这些关系，意在争取张将军尽力保护刘、孙二位同志。

几天后，张学良将军对我说：“事情还在继续发展，我们正在跟他们打官司。蒋介石要逮捕的人我都捕了，押在军警督察处。我看了这几个人的供词，刘澜波、孙万发据理驳斥讲得得体，马绍周供得不好。督察处是东北军跟国民党合办的，不安全。我准备把他们送到东北军军法处，处长是你的老师赵翰久（原东大法律系教授），会关照他们的。

事过二十多天，张学良将军告诉我：“蒋介石忙于两广事变，无暇顾及西北，官司基本结束了。你出去找找车向忱等人把刘澜波、孙万发、马绍周保出来吧。”我马上出去找人活动，“失踪”二十多天，从此又露面了。

刘澜波同志被捕后，黄显声军长一直很关心，在事情稍微平息下来后，他借向张副司令请示工作之机，请示是否可以把刘保出来？张表示可以。于是黄显声、车向忱等四、五位知名人士联名作保，张学良将军以“顺乎民意”为辞，将刘澜波、孙万发、马绍周三人释放了。至此，轰动一时的“艳晚事件”即告结束。

事件过去将近一个月，张学良将军又曾找我谈：“那天（指艳晚当天），你说要把事情闹得‘越大越好’。我是

国民党中央常委，抄了国民党的省党部，触犯了党纪国法，这干得还不够大？你说怎么才算大呢？”我当时是希望张、蒋矛盾加深，扩大事态，促使张学良将军公开脱离“剿共”阵线，走上抗日道路，至于怎么扩大并没有多想。事过这么多天，张学良将军还把那次谈话记在心上，可见他对此事十分重视。

三、“艳晚事件”发生的原因及影响

“艳晚事件”的发生不是偶然的，有其深刻的政治背景。自从我们几位学生代表应张学良校长之邀来到西安，便引起了国民党特务的注意。在半年多时间里，我们不仅对东北、西北的上层做了大量的统战工作，而且深入学校、东北军、西北军广泛进行抗日宣传活动，着重宣传东北军与西北军、东北人民与西北人民团结起来共同抗日，尤其是组织东大、东中学生联合代表团，大张旗鼓地到东北军前线部队中宣传抗日打回老家去的道理。接着我受张学良将军委派，到“剿共”前线的六十七军和一百零五师一部分向师、团、营、连军官宣传不打内战，团结抗日，收复东北失地的主张等。

我们这样做，有个明确的目的，就是努力使学生抗日救亡运动与军队武装抗日运动结合起来，组织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发动全民族对日作战，赶走日本帝

国主义。学生抗日救亡运动与东北军武装抗日运动相结合，势必使东北军脱离“剿共”阵线，停止内战走联共抗日的道路，这是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一个组成部分。这样做，必然削弱国民党“剿共”的力量，动摇“安内攘外”的反动国策，瓦解东北军、西北军“剿共”的军心，自然为南京反动政府所不容。

同时，南京国民党反动派也明白，我既是北平学联和东大学生代表，又是张学良将军的秘书，在东北军公开宣传抗日，肯定得到张的支持。张学良将军对“剿共”厌倦，对抗日却加快了步伐，同共产党在洛川、延安举行会谈，跟红军建立了联系；办王曲军官训练团，筹办学兵队，提高东北军各级军政人员的抗日思想，培训抗日骨干，等等。这些，国民党特务都有所风闻。

蒋介石为了镇压学生抗日活动，巩固西北“剿共”前线阵地，阻止张学良走联共抗日道路，下令逮捕我们几位学生代表和在东北军宣传抗日的刘澜波、栗又文、孙万发等同志，这是发生“艳晚事件”的直接原因。蒋介石和南京政府没有想到，这种倒行逆施非但没能把人抓到南京“正法”，反倒激怒了张学良将军，派兵一举查抄了国民党陕西省党部，弄得朝野上下沸沸扬扬。

“艳晚事件”持续了二十多天，从表面看是和平结束了，而它产生的影响却是深远的。

其一，“艳晚事件”增强了张学良、杨虎城两将军之间，东北军、西北军之间的团结。

西北军从普通士兵到杨虎城将军，担着风险抢救抗日学生；张学良将军和东北军官兵不惜兴兵动武，全城戒严，查抄国民党省党部，显示了张、杨两将军及东北军、西北军两支军队联合起来同蒋介石斗争的勇气和抗日的决心。我被十七路军宪兵营从特务手中截夺下来的第二天，张学良将军曾亲自登门向杨虎城将军表示感谢。经过这次事件，加深了张、杨两将军和东北、西北两军的相互了解和信任。

截夺被捕学生、查抄省党部的成功，也从心理上使张学良、杨虎城将军受到鼓舞，认识到蒋介石与各方面矛盾重重，只要利用矛盾，抓准时机，蒋介石也不是碰不得的。

其二，“艳晚事件”提高了抗日学生的威信，为以后进一步在东北军、西北军和群众中开展抗日宣传活动创造了有利条件。

“艳晚事件”结束我公开露面后，王以哲、刘多荃等军长、师长见到我便说：“原以为你是个白面书生，特务抓你还不象抓小鸡那样容易，想不到你还能跟他们搏斗。”“你真不愧是副司令培养的学生，副司令有眼力，现从几十里外调兵救你，值得！”有些战士见到我说：“那天突然紧急集合，命令我们跑步来西安，起初不知发生

了什么大事，原来是为了救你。”他们没想到为了救抗日学生，副司令竟如此兴师动众。官兵们和人民群众从这次事件中看到了张学良将军坚持抗日之心和保护抗日青年之情，这对西北群众运动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发展都有重要的意义。

其三，“艳晚事件”打破了西安“剿共”中心镇压群众抗日活动造成的长时间的沉闷空气，促进和鼓舞西北群众抗日救亡运动的浪潮逐渐高涨。

“艳晚事件”不久，抗日救亡群众团体“东救”（东北民众救亡会）成立，“西救”（西北各界救国联合会）公开，西安学联等也相继成立。这些团体在西安事变前组织领导了纪念“九·一八”五周年大会、追悼鲁迅大会、援绥抗战运动、“一二·九”一周年游行示威请愿等大规模群众运动，对促使张、杨两将军决心逼蒋抗日起了重大作用。

我和马绍周被捕后，“西救”曾发表了“援救宋、马及声讨特务蹂躏人权，执行日寇使命的宣言”，及时揭露国民党特务的罪行，扩大了舆论宣传。这对西安抗日救亡团体的形成和发展起了积极作用。广大军民通过“艳晚事件”，看到东北、西北两军共同努力和民众团体积极支援营救被捕抗日学生，受到了一次深刻的抗日教育，精神为之大振。这促使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蓬勃发展起了有力的推动作用。

其四，“艳晚事件”加剧了张学良将军同国民党蒋介石的矛盾。矛盾的实质，是在民族矛盾上升为主要矛盾，全国人民大声疾呼“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形势下，张学良将军用实际行动表明反对蒋介石的“剿共”政策，支持群众抗日运动，给“剿共”阵线打开了一个缺口。这次较量，沉重打击了反动派的嚣张气焰，动摇了西北“剿共”中心，使张学良将军同蒋介石之间的矛盾日益加深。“艳晚事件”后，张曾派莫德惠去南京面见蒋介石，想疏通紧张关系，缓和矛盾，但蒋却不明确表态。张预感到蒋绝不会善罢甘休，只是时间尚未成熟，暂忍不发。这预示一场更大的政治风暴即将到来。三个多月后，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就爆发了。可以说，“艳晚事件”是“西安事变”的前奏曲。

忆川陕根据地时期 与杨虎城十七路军的统战工作

徐 以 新

一九三三年春，在创建川陕革命根据地过程中，红四方面军曾与杨虎城十七路军达成互不侵犯、共同反蒋的协议。这对川陕苏区的巩固和发展起了积极的作用，并且提供了一条与地方实力派建立统一战线的重要经验。我当时任川陕军委参谋主任，受川陕军委与四方面军总部的委派，亲身参加了对十七路军孙蔚如（系十七路军三十八军军长）部的谈判工作。

一九三二年十月下旬，红四方面军主力从鄂豫皖革命根据地向西北转移，于十二月上旬在陕南城固渡过汉水，到达汉中盆地。汉中地区比较富庶，它南临大巴山，北依秦岭，中间有汉水穿过。在这个地区，我党有一定的工作基础。但该区地形比较狭窄，回旋余地较小，不利于大部队活动。当时我们已得悉四川军阀正在混战，四川内地长期有党的工作，川北山地便利打游击战争，于是决定入川。

大约在十二月中旬，我们全军经过三昼夜艰难行军，越过冰雪覆盖的大巴山，到达川北通江地区。由于我们入川行动神速，敌人不及防御，通江县城很快就被我们占领，田颂尧驻守在这里的部队也被赶跑了。

之后，我们相继占领了通江、南江、巴中等县，在川北取得了立足之地。大约在一九三三年二月中旬，田颂尧组织了三、四十个团分左、中、右三路围攻我们。我们采取部队收缩、收紧阵地、诱敌深入的战略方针，放弃了通江、南江、巴中三个县城，将部队撤到通江以北大约方圆一、二百里的地区内，以将敌之战线拉长，待机消灭他们。就在这样的情况下，四方面军开始了对杨虎城十七路军的统战工作。

我们和杨虎城的部队，过去没有正式打过交道，只是在我们转入川陕的路上，到蓝田附近的子午镇时曾经遭遇了一下，结果他们吃了亏。我军在川陕立足之后，十七路军沿大巴山脉东起镇巴，西至宁强约五、六百里的战线上，部署兵力，对我军北面一线进行封锁。

杨虎城将军虽为地方实力派的代表，但他具有民主主义思想和爱国热忱，早年参加过辛亥革命和北伐战争，曾与我党有过交往。“九·一八事变”后，国土沦丧，杨虎城将军对蒋介石的“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政策深为不满，要求抗日。但蒋介石对他的抗日要求怀有忌恨，因之变本加厉地玩弄排除异己的手腕，将杨部十七路军

推上剿共战场。

就在我四方面军进入川陕地区后，蒋介石一面急令十七路军孙蔚如部在陕南，刘湘、田頌尧等部在四川，形成对四方面军的包围并进行围攻；一面却派其嫡系胡宗南部进驻陇南天水，部署在十七路军之侧背，以图对陕甘宁杂牌部队进行监视。其用心在于使杨与红军两败俱伤，而他坐收“渔翁之利”。蒋介石的反动政策加剧了他与地方实力派之间的矛盾。一九三三年四月间，当胡宗南部队在陇南完成部署后，这种矛盾已经表面化了。杨虎城将军为摆脱蒋介石步步进逼下的窘况，保住自己的实力，并最终把胡宗南部挤出陕南，便不得不寻求与红四方面军合作的途径。

一九三三年一月十七日，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和工农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以主席毛泽东和朱德的名义发表宣言，宣布工农红军“准备在立即停止进攻红色区域、保障人民民主权利、武装人民”三个条件下，同国内任何武装部队订立停战协定，以共同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在这种情况下，我党对十七路军的地下秘密工作加紧进行。当时杨虎城的部队中有不少共产党员，工作有相当的基础。武志平同志就是根据党的指示，利用自己的公开身分（武为杨的三十八军孙蔚如部少校参谋），做争取杨虎城与四方面军建立联系工作的。

经过武志平同志的工作，通过爱国民主人士杜斌丞先生的疏通配合，终于使杨确定了与红四方面军进行友好联络的决心。

大约在一九三三年五月中旬，武志平同志以三十八军高级参谋的身分（他的秘密党员身分一直未公开），从汉中出发，来到当时四方面军总部的驻地川北苦草坝，会见了四方面军的负责同志傅钟、曾中生等。张国焘也和武谈过几次。四方面军总部和川陕军委研究，认为既然十七路军主动来和我们建立联系，这不论从战略上还是从整个川陕根据地发展考虑，都是有利的，也是一个极好的机会。一方面，在川北根据地的后方，翻过大巴山便是汉中，是杨虎城十七路军控制的地区，如果能和他们打通关系，就可解除我们的后顾之忧，集中全力向四川发展。另一方面，敌人对我们封锁得很厉害，我们急需打开通路与外面发生联系。当时临时中央已进入中央革命根据地，我们希望能与留在上海的机关取得联系，请他们给我们派一些干部并在工作上给予协助。同时，希望能解决部队物资上的困难。因此军委确定和十七路军建立联系。

经向武志平同志了解，得知上述问题，杨虎城将军基本上都可以协助。武志平时时就带了若干军用地图，这在当时是很珍贵的。于是军委决定由我作为四方面军的代表，到汉中与三十八军军长孙蔚如进行谈判，并对

谈判方针规定了三点：一，了解对方意图；二，了解杨虎城十七路军内部的情况；三，尽可能在杨虎城、孙蔚如内部找到可以争取的人。这些问题由于徐向前同志当时在前方指挥战斗，主要是由张国焘、陈昌浩、曾中生和我等几个人在苦草坝的总部商讨决定的。

在我和武志平同志起程前，红四方面军在空山坝一举粉碎了田颂尧三路围攻之左路纵队的进攻，全歼敌七个团，击溃六个团，使敌左纵队全线崩溃，敌之中央纵队、右纵队亦纷纷败退。空山坝大捷使敌人对川陕苏区的四个多月的围攻遭到破产。我们红军刚刚进川几个月，而且一路上打了许多恶仗，部队是很疲劳的，结果一下子把四川军阀消灭了这么多，这个胜利是敌人预料不到的，把四川、陕西之敌都震动了。

大约在一九三三年五月底，我和武志平从四方面军总部苦草坝出发，经新场坝到达碑坝，也就是靠近巴山南部赤白交界的地方。那里有我们一个师的部队驻守。我和武志平在碑坝化装成老百姓继续前行，穿过约有七、八里路程的无人区，进入孙蔚如的防地，然后到达汉中。

杨虎城授权孙蔚如为谈判的全权代表，并派自己的秘书王宗山（属于C·C·系，曾给孙中山当过秘书）参加谈判，协助孙蔚如工作。我们到达汉中的翌日，我便与孙进行了第一次接谈。孙急于要摸我们的情况，所

以一开始便问：“你们红军到四川来是干什么？是长驻还是路过？如果长驻是否能站得住？”而且他特别流露出想知道红军对陕西的意图和对十七路军的态度。我说：红军完全可以在川北站住脚。我们的军队来自人民，为人民谋利益，川北的人民同样是相信我们的，会尽最大力量支持我们，所以我们能克服各种艰难险阻，粉碎敌人的围攻，发展根据地，壮大我们的军队。这次红军在空山坝的大捷，想你们已经得知，这就是一个很好的证明。敌人围攻的兵力比我们多三、四倍，结果全部垮了，我们的脚跟就站稳了。我又说：我们中央政府和军委已经发表了“一·一七”宣言，只要你们遵守宣言提出的三项条件，我们愿意与你们保持友好的关系。我们可以巴山为界，你不过来，我们也不过去，互不侵犯。

对我上面所讲的话，孙蔚如表示相信和满意。

随后，他又谈到胡宗南的部队跟随红军到了西北，对他们地方军不怀好意，言谈中涉及到蒋介石对地方部队的排斥和矛盾等。我知道他是要了解我们对蒋介石的态度，摸我们对胡宗南采取什么政策。于是我说：“九·一八”事变后，蒋介石不顾民族利益，仍然坚持其“剿共”政策，数次对我各革命根据地进行疯狂“围剿”，坚持与我们为敌。我们是随时准备粉碎其进攻的。胡宗南从鄂豫皖一直跟在我们的屁股后面，现在他来进攻，我们就坚决打。你们能配合当然很好；不配合让路也可

以；不配合不让路只要不帮助胡亦可。孙当时表示希望我们打胡宗南，他的部队可以配合，并提出可以给我们一些帮助。

总的来看，孙蔚如的态度开始还是比较积极的。他主要是希望我们不要向陕西方面发展，同时能把胡宗南赶出西北地区。在这个原则下，他同意双方建立一条可以经常来往的交通线，并愿对我们提供物资。他们还将胡宗南部的一些调动情况告诉了我，给了我一部分军用地图。在这之后，我们又正式谈了一次，向他们交待了共产党、红军的政策，以加深彼此之间的了解。他们亦表示希望尽快和我们把关系确定下来。

这样，我第一次出使汉中算是取得了比较满意的结果。我在汉中药停留了四、五天的时间，于六月上旬与武志平一同返回苏区，并带了我们购置的二十余担物资。这时我们已经彻底粉碎了田颂尧的三路围攻，通、南、巴三个县城都已收复，因此总部已搬到新场坝。

回到总部后，军委立即召开会议，由我将汉中谈判的情况作了详细汇报。军委在分析了有关情况后，认为应该立即把与杨虎城的关系确定下来，订立互不侵犯的停战协定，并把交通线建立起来。军委决定我准备第二次出使汉中。

约在六月下旬，我第二次去汉中。在碑坝同武志平同志汇合。武已在这一段时间内初步建成了联络点。

这一次我们双方的谈判，一开始就谈到实质性的问题。经商订确定：第一，双方互不侵犯；第二，配合打胡宗南；第三，我们可以设立交通线，他们可给我们提供一定的物资。另外对联络办法也作了具体规定：由武志平在赤白边界地带设立一个联络点，并由他在那里全权负责等。

此外，孙蔚如又谈了蒋介石在西北的一些具体部署和安排。在谈话中孙又流露出希望我们很快把胡宗南搞掉的心情。这种心情我们可以理解。胡宗南在天水有两三万人，自然杨虎城深深感到这是一个祸害，所以迫切需要联合起来把他赶走。

因为我还想再了解一些他们部队的情况，于是便通过武志平，找了一些在他们部队中思想倾向进步的中下级军官，大约十几个人，召开了一个小型座谈会。他们提出了许多问题，如红军的政策及红军内部的有关情况等等。我都一一做了回答。通过接触，我感到十七路军中不少人对蒋介石的反共政策不满，对红军是同情的，特别是由于红军进入四川后，蒋介石玩弄排斥异己的阴谋手段，更促使他们向红军靠拢。当然以后得知，在与我接触过的人中，有些就是秘密党员。

我第二次在汉中大约停留了七、八天，采购了不少物资，记得装了许多挑子。这批物资是由我们带到武志平在赤白交界处建立的交通站，然后我们派部队来接收

的。从此以后，这条交通线就正式使用了。

我第二次返回总部后，军委再次召开会议，听取汇报。我把订立互不侵犯协定的内容及具体建立交通线的情况向与会同志作了介绍。军委认为今后应利用这条线加强对外往来，搞物资进来，亦应通过孙蔚如的关系，交换情报，以便掌握敌情。当时确定我们后勤部门的同志，直接与武志平联系，确保这条线路的畅通。这条线就是从西安到汉中，然后进入根据地。潘自力等同志都是通过这条线进来的，廖承志大概也是这条线进来的。大批同志进入苏区，带来了党的信息，增加了我们的力量。另外，在传送物资方面，在互通情报方面，这条交通线也起了重要作用。这样，就打破了蒋介石企图把我们包围封闭在川北地区然后加以消灭的妄想，使我们找到了一个突破口。

从战略意义上讲，由于有了一个互不侵犯协定，使川陕根据地不致腹背同时受敌，我们便可集中力量对付四川军阀的围攻。尤其是我们在四川刚刚站稳脚跟的开创时期，这一点显得更为重要。

回忆三十年代中共 东京支部的成长历程

陈 健 梁威林

三十年代中期，在日本首都东京，一批中国进步留学生在中国共产党东京支部领导下，开展了一个以学习宣传马克思主义为重点的革命文化运动，成为当时我党在国外进行革命工作的一支力量。

(一)

一九三四年至一九三五年间，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步步紧逼，从关外进入关内，中国革命处在非常困难的时期。一九三五年，共产国际提出建立广泛的反法西斯统一战线，中国共产党提出停止内战，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极大地鼓舞了千百万革命人民。这时，一批在国内从事地下革命斗争的共产党员、共青团员和革命青年，由于党组织遭受破坏，继续活动非常困难，于是被迫东渡日本，准备在留日学生中进行革命活动，并选择在被称为马克思主义东方图书馆的东京，

作为活动的基地。当年林基路（即林为梁）、官亦民、梅景铤、欧阳凡海、杜宣、林焕平、林林、陈辛人、李嘉人、黄新波、李云扬、伍乃茵、黄维克、丁克、蔡北华、魏猛克、侯甸、严尚民、杨克毅、陈秋焕、陈健、梁威林等，就是在这个时期怀抱着这样的信念先后到达东京的。

这些人都是在国内我党的领导下从事革命多年或受革命思想影响的积极分子，有较高的政治觉悟和一些斗争经验。他们到达东京后，虽然与党组织失去联系，但是为了革命的事业，立即投入学习和工作的革命生活，先后在东京参加了“左联”。这个时期，中国留学生仅东京一地就有五千多人，大多是在国内中学毕业后来到东京投考大学，希望学到一点知识和技能并取得文凭，以便回国后能够较好地立足于社会和谋取各种各样的出路；有一些是在国内不满国民党政府的腐败统治，找不到出路，而去日本寻找真理的；也有极少数是国民党高官的子弟和带着公费去留学的，其中有一些人在留学生中散布反动思想。因此，在留学生中开展马克思主义的教育和学习，宣传革命思想和我党的政策，争取、团结大多数留学生，特别是团结、教育那些为寻求真理的和中间思想的留学生，打击极少数国民党反动分子的破坏活动，就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于是“左联”成员根据这个情况，按照各人的特长和兴趣，从出版刊物杂志，开办各

种文化学术讲座和组织各种文化艺术团体着手，积极在留学生中开展革命活动。林基路与林焕平、陈辛人、林林、魏猛克等创办了《东流》、《留东新闻》、《杂文》等杂志，揭露国民党的黑暗统治，宣传爱国主义，响应国内抗日救国。《杂文》曾得到鲁迅、郭沫若、茅盾的支持。但出了三期即被日本当局查禁，后来改为《质文》，继续出版。陈健、丁克、侯甸、苏曼、潘沃权、蔡北华、杨克毅等组织“世界语学会”和“新文字学会”，开设拉丁语和世界语学习班，不少进步留学生参加学习。林基路又与杜宣等组织“中华留日剧人协会”，开展新戏剧活动，演出《娜拉》、《复活》、《大雷雨》等剧目。官亦民、黄新波等组织“美术协会”，进行木刻、版画活动。严尚民等组织“东京诗歌社”，得到郭沫若的大力支持。林基路、官亦民、梁威林、侯甸、李云扬等发起组织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文化座谈会”，吸收进步留学生参加，经常举行学习座谈活动。在“左联”的积极活动下，到一九三五年夏秋间，东京中国留学生的革命文化运动初步开展起来了。

(二)

随着运动的深入开展，争取、团结群众的工作和斗争日益复杂起来，骨干分子之间的意见分歧也不断发生。大家深深感到需要一个统一的坚强的领导核心来领导这

个运动。这个领导核心就是中国共产党组织。当时东京没有我党的统一组织，只是有些人与国内党组织有个别联系，或与上海“左联”有来往。因此，寻求党的联系，建立我党在东京的组织，成了最紧迫的需要。“左联”东京分盟负责人林基路，特地去访问一九三五年初来到东京的原在中共上海文委宣传部工作的共产党员何干之，恳求他出来领导。可是，何干之由于在国内曾遭国民党通缉，逃避到日本后不便出来活动，因而婉言推卸，但答应从旁出主意，指点活动。到一九三五年暑假，林基路又找到何干之，希望通过他到上海找文委负责人周扬，以便汇报东京“左联”工作和解决入党问题。何干之认为林基路很有革命朝气，年轻有为，很有志气，欣然答应，写了信给他。

一九三五年七月，林基路回到上海，住在共青团员陈洪潮宿舍里，准备去找周扬。当时，上海党组织遭破坏，隐蔽下来的同志处在极端秘密的环境中，林基路找不到周扬。后来陈洪潮找到闸北区党委的负责人周钢鸣，才由他带去会见周扬。林基路向周扬详细地汇报了东京“左联”的活动情况，并提出参加中国共产党的要求，以便在东京建立党的组织。周扬正考虑在东京留学生中建立一个核心组织，吸收具备共产党员条件的人参加，将来由党接收，故对林基路说：“现在党组织遭到破坏，我和中央失去联系，目前无法解决你的入党问题。你可以

在进步的留学生中建立领导核心，待我与中央恢复联系后，再来接收你们的组织关系。”周扬还写了一封信给任白戈，要林转交。任白戈当时也在东京，积极参加文化运动。八月中旬，林基路从上海返回东京。陈洪潮经团组织批准也于八月底从上海去东京，一起参加活动。

一九三五年九月，林基路邀请在“左联”中的中共党员官亦民，和刚从上海来的共青团员陈洪潮等人，讨论研究周扬的意见，一致决定按照共产党的组织原则建立党支部。当即推举林基路为支部书记，陈洪潮为支部组织委员，官亦民为支部宣传委员。于是，一个以林基路为首的秘密的我党组织——中国共产党上海文委东京支部宣告成立，担负起在特殊环境里领导革命斗争的任务。

东京支部成立后，首先积极物色对象，发展党员。对信仰马克思主义，拥护共产党，经过斗争考验的忠实可靠的积极分子，个别吸收入党。陈健、梁威林、李云扬、张建、伍乃茵、侯甸、邝启常、蔡北华、梁微娟、苏曼、黄维克、梅景铤、潘沃权、李隆等人，就是在党支部成立初期和中期先后入党的。还有一些人，名字记不起来了。这些同志积极参与东京革命活动的领导工作，后来回国，参加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以及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经过长期的严峻的考验，为党的革命事业做了不少工作。林基路、官亦民、苏曼、黄维克、梅景铤等

同志为革命壮烈牺牲，林基路在新疆被盛世才杀害。现在乌鲁木齐树有烈士纪念碑。

(三)

东京支部建立之初，即以秘密的直接或间接的方式个别联系党员，加强对留学生革命活动的领导。把党员派到各个群众组织中去作为骨干，曾采取“党团”形式，分别设立学生党团、艺术党团、社会科学党团、妇女党团，从各个领域广为开拓阵地。在文艺战线方面，继续出版“左联”所创办的杂志，还由侯甸主编文艺理论杂志《文艺科学》，倡导学习革命文艺理论，对指导东京留学生的新文艺运动起过良好的作用。不少留学生喜欢学习世界语，就利用世界语学会的公开合法地位，加强语联方面的工作，开办学习班。从旧书店搜购普罗列塔里亚的世界语讲座一套六卷作为教材。在教授世界语的过程中，灌输马克思主义思想，进行革命理论的教育。又用世界语学者名义提倡北方话新文字，举办新文字学习班。陈健、侯甸、苏曼、蔡北华、李慈、吕俊君、陈学书等主持这方面的工作，并参加教学。通过世界语的教学，与日本世界语学者、左翼进步人士秋田雨雀发生联系，聘请日本左翼分子中垣虎儿郎讲授世界语。又通过刘仁与绿川英子来往，同日本合法的世界语学会联系。中日世界语学者互相交流，建立起深厚的感情。在进行世界语

教学活动的同时，学习推广北方话拉丁化，拟订广州话、桂林话等地方语言的拉丁化方案，以同乡会名义出版，印发国内。为了团结留日的女学生，伍乃茵、张建、刘云与黄维英等发起成立“留东妇女会”，积极开展女留学生的革命活动。此外，还利用同乡会的形式，团结各省的留学生。

东京支部特别注意对“文化座谈会”的领导，以培养革命骨干，故调派梁威林、李云扬去具体领导，使它从仅有基本成员二、三十人的小型读书会，很快地发展到七、八十人，成为团结、教育留日进步学生，培养革命干部的党的外围进步群众团体。“文化座谈会”以学习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为主，五至七人编成一个小组，按照马克思主义三个组成部分进行学习，在取得基本理论知识之后，再按各人意愿选取一门（哲学、社会发展史或政治经济学），进行专门学习，深入研究，写出论文。在当时，“文化座谈会”是东京留学生中许多半秘密的革命群众团体中人数较多、组织较健全、学习较正规的一个组织。在两年多时间里，培养出一批有一定思想觉悟和理论水平的革命骨干。他们按照支部分配的任务，脱产参加有组织的学习和各项活动，从始至终没有间断，直到抗战爆发回到国内，参加中国共产党。他们投身于革命斗争，成为革命事业的干部，有些还在革命斗争中英勇牺牲。这些骨干成员有：杨克毅、邓楚白、宋兆萃、

胡成放、饶璜湘、刘向东、古子坚、刘坚、吕俊君、邓健今、陈茵素、刘云、黄荔容、刘立峰、谢爽秋、张维冷、何澄宇、梁炎昌、罗文坤、周可传、卫国尧、韩文潮、钟文杰等。

东京支部还通过“文化座谈会”去联系“社会科学座谈会”（负责人有熊唯知、李肇嘉、张持平、卓如、杨烈、林滔、黄维英等）、“现代问题座谈会”（负责人裘进）、“国际问题座谈会”（负责人林楚君）等群众组织，联合举办各种座谈会、报告会，以提高进步留学生对中国社会和中国革命问题以及党的当前政策的认识和理解。先后举办过《关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问题》的座谈会，《中国社会性质和革命性质》的报告会，《关于国防文学和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的讨论会等。还邀请郭沫若做《中日文化之交流》的报告。又举办过鲁迅先生追悼会，邀请郭沫若和日本知名进步人士秋田雨雀等参加，郭沫若在会上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赞美鲁迅的讲话，使留学生受到很大的教育。

（四）

东京支部在组织进步留学生学习革命理论，开展文化学术活动的同时，还领导大家同国民党反动分子展开针锋相对的斗争。一九三六年冬，“西安事变”爆发，革命形势发生了急骤变化，有力地推动了东京进步留学生

的革命积极性。东京支部根据建立和发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方针，通过“文化座谈会”与“社会科学座谈会”的活动，广泛地争取、团结留日爱国学生，组成广泛的留日学生的统一战线。首先在各大学成立中国学生的“同学会”，以留学生较多的明治、早稻田、法政、日本等大学为重点，动员和布置在这些大学读书的党员和积极分子回校，参加选举活动，取得了领导权。各校同学会相继成立后，即派出代表组成东京留日学生的统一战线组织——“中华留日学生联合会”。

但是，这时东京的极少数国民党反动分子，他们在各校选举失败后，很不甘心，在国民党留日学生监督处的支持下，企图成立自认为代表全体中国留学生的统一组织——“中华留日同学会”，并决定于一九三七年二月十四日下午在日华学会召开成立大会。东京支部了解情况后，即动员各革命群众团体的成员和部分爱国学生共二百余人参加了大会。本来准备劝告他们不要另组机构，应团结合作，共同对敌，可是他们拒绝劝告，竟殴打进步学生推举出来的大会主席卓如，引起一场武斗。进步学生把少数国民党反动分子及受其蒙蔽的群众二、三十人赶出了会场。全体进步爱国学生在林基路的率领下前往驻日大使馆请愿，初时手挽手列队前进，后经日警干涉，改乘出租汽车前往。全体同学举出卓如、林基路为代表，提出惩办打人凶手，承认“中华留日学生联合会”

为我国留学生的统一合法组织等项要求。请愿斗争从下午三时坚持到六时半，终于迫使许世英大使答应了这些要求。虽然后来一条也没有实现，但在这场斗争中进步学生取得了胜利。

(五)

一九三六年夏，陈洪潮因事回国。同年冬，官亦民回上海工作。支部书记林基路先后决定支部组织委员由陈健接替，宣传委员由梁威林接替。上半年，东京“左联”解散。八月初，支部派陈健去上海找周扬同志请示工作，适周扬离开了上海。到十月间，陈健再去找周扬，经过五个交通站的转折，在法租界霞飞路碰面。陈健向周扬请示对“左联”解散后工作的意见，周扬作了指示，强调指出：要用马克思主义社会科学教育中国留学生，团结、争取、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的中坚力量。并指出，东京党员回国，由上海文委接收。还拿出一份细字抄写的党内文件《中国共产党致中国国民党书》，给陈健带回东京传达，嘱咐先默读记熟，碰到情况立即烧毁。陈健返回东京经过神户时，果然碰上日本的严密检查，便立即烧毁文件，到东京后根据默记将文件主要内容写出来，交给同志们传阅。

一九三七年四月间，支部书记林基路、宣传委员梁威林与李云扬、伍乃茵先后回上海。上海党组织立即接

收他们的组织关系，并分配工作。当时上海党接收他们组织关系的负责人是周扬、李凡夫、柳乃夫等同志。

林基路、梁威林回国后，东京支部由留下的组织委员陈健主持工作，继续领导革命活动。“七·七”抗战爆发，留日学生纷纷回国，革命群众团体的一些成员也陆续回国。支部接到上海党的密信指示，要支部坚持到最后才离日回国。但是由于日军侵略中国的范围日益扩大，对留学生坚持下去十分不利，支部乃于八月初率领党员和“文化座谈会”成员三十余人离开东京。原定回上海，到神户时上海战争爆发，乘船改回广州。

当时国共合作抗日的形势已形成，广州开始掀起抗日救亡的群众运动。支部立即动员大家投入运动，参加广州文化界战时服务团、妇女会、锋社剧团、歌咏团、抗战教育实践社等群众团体，进行抗日救亡的宣传活动，并成立留东同学抗敌后援会，还同意了一些人前往南京参加国民党举办的留日学生训练班。同时，组织留在广州的人员学习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和群众运动、中国革命等问题，还办了一个叫《武装》的刊物，出了三期。在广州时共发展了十多个党员。

一九三七年底，陈健和从上海回来的梁威林一起，由广州去香港，会见中共中央派来的张文彬同志。张说：“接到延安电报，要我接收东京回来的党员同志的组织关系。现在广州市委正在进行调整，待调整后，你们的

关系即转到市委去。在转移前，你们可以继续独立开展工作和发展党员。”一九三八年三、四月间，东京支部的组织关系即由陈健、梁威林移交给广州市委，党员由市委接收和分配工作。

从此，中共东京支部的同志，在党中央的领导下，投入到民族革命的洪流中，发挥出了一定的力量。

后记：这篇回忆文稿，曾刊登于一九八三年五月《广东党史资料通讯》第2期，后又经当年在东京参加活动的周扬等同志审阅，在文中作了若干补充和修改，整理成现稿。

一九二一年至一九二七年 上海、江苏、浙江党组织 发展概况*

(一九八三年十月)

上海中共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档案馆
江苏中共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档案馆 合编
浙江中共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档案馆

一九二〇年三月，共产国际派魏金斯基来中国。四月到上海同陈独秀、李汉俊等人座谈，酝酿建党事宜。五月，陈独秀、李汉俊、陈望道等人在上海建立“马克思主义研究会”，由陈独秀负责。八月，成立上海共产主义小组。小组成员有陈独秀、李达、李汉俊、杨明斋、俞秀松、施存统、陈望道、沈雁冰、邵力子、李启汉、

* 一九二一年至一九二七年，上海、江苏、浙江党的组织同属一个领导系统。它的名称初期叫“上海地方委员会”，后来改为“上海地方兼区执行委员会”，一九二五年下半年又改为“上海区委”（即“江浙区委”），它所管辖的范围始终包括着这三省（市）。

沈玄庐等十余人，推陈独秀为书记。小组成立后，为正式建党进行了一系列的准备工作。（李达、沈雁冰、陈望道、邵力子回忆，见《“一大”回忆录》、《“一大”前后》）

一九二一年

七月二十三日，在上海举行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李达、李汉俊作为上海地区代表出席“一大”。大会选举陈独秀、张国焘、李达组成中央局，陈独秀为中央局书记，中央局设在上海。（《中共党史大事年表》）

党的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纲领》规定，有党员五人的地方，可建立地方委员会。年底，上海建立了中国共产党上海地方委员会，由陈望道任书记。（徐梅坤、沈雁冰回忆，上海市档案馆资料）

一九二二年

五月，上海地方委员会改组为中共上海地方兼区执行委员会^①，委员有徐梅坤、沈雁冰、俞秀松三人，徐梅坤任书记，沈雁冰负责宣传。（《徐梅坤回忆》）

六月，上海的党员人数为五十人。（一九二二年六月三十日《中共中央执委会书记陈独秀给共产国际的报告》）

七月，党的“二大”通过的党章规定，有党员三人至

五人均得成立一组。有两个地方执行委员会以上的区，得组织区执行委员会。

夏，津浦铁路浦镇机厂工人领袖王荷波（机匠师傅），经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北方分部负责人罗章龙介绍，在北京加入中国共产党。（一九八一年《罗章龙回忆》，江苏省档案馆资料）

秋，共产党员王振翼（即王振一、王仲一）到浦镇机厂开展工作。（据浦镇车辆厂几个老工人回忆，江苏省档案馆资料）

八月底，徐梅坤到杭州开展建党工作。九月，成立杭州小组。有党员于树德（在法政专门学校任教）、金佛庄（在浙江陆军第二师陈仪部队任连副）和沈干城（在铁路工作）三人。于树德任组长。（《徐梅坤回忆》）

一九二三年

上半年，上海地方兼区执行委员会改选，选出徐梅坤、沈雁冰、王振一等三人为委员，徐梅坤任书记^②，沈雁冰负责宣传，王振一负责职工运动。（《徐梅坤回忆》）

六月，上海地方兼区执行委员会派正式代表三人、列席代表两人，参加党的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徐梅坤、王振一为上海地区的正式代表；王荷波为津浦铁路浦镇工会的正式代表；杭州的于树德、金佛庄为列席代表。

《《中国共产党历次代表大会（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社会科学院现代史研究室编著；《徐梅坤回忆》）

七月，党的“三大”通过的党章规定，有党员五人至十人均得成立一小组。有两个地方执行委员会以上的区，得组织该区执行委员会。

七月八日，上海地方兼区执行委员会遵照中央第二号通告，召开全体党员大会进行改选。选出徐梅坤、甄南山、王振一、沈雁冰、邓中夏五人为正式委员，张特立（即张国焘）、顾作之、郭景仁三人为候补委员。

七月九日，上海地方兼区执行委员会举行第一次会议，讨论委员的分工，决定由邓中夏任委员长，徐梅坤任秘书兼会计，王振一、甄南山任劳动运动委员，沈雁冰任国民运动委员。

会上并决定设立“国民运动委员会”^③和“劳动运动委员会”。“国民运动委员会”由沈雁冰兼任委员长，林伯渠、张春木（即张太雷）、张特立、杨贤江、陈其寿、黄让之、董亦湘、刘宜之为委员。“劳动运动委员会”由王荷波兼任委员长，王振一为秘书兼编辑，甄南山负责机工方面的工作，林蒸负责吴淞方面的工作，周启邦负责邮差方面的工作（周走，许德良代）。

会上还决定将党员重新分组，分组的原则是将居住相近的党员编为一组。党员共五十三人，编为五组：

第一组（上海大学）十一人：林蒸（组长）、严信

民、许德良、瞿秋白、张春木、黄让之、彭习梅（修梅）、施存统、王一知、贺昌、邓中夏。

第二组（商务印书馆）十三人：董亦湘（组长）、徐梅坤、沈泽民、杨贤江、沈雁冰、张特立、糜文溶、黄玉衡、郭景仁、傅立权、刘仁静、张秋人、张人亚。

第三组（西门）十人：欧阳笛渔（组长）、林伯渠、赵醒侬、顾作之、雷晋笙、茅延楨、游星五、张铭世、刘宜之、邵力子。

第四组（虹口）九人：陈其寿（组长）、甄南山、方观林、谭国昌、谭子崇、王振一、王荷波、高保民、周耕庐。

第五组（吴淞）暂缺。

尚有周启邦、朱鹤琴、李启汉、韩白书、张学琅、李关松、陆增祥、袁长生、吴冰如、郭明友十人或因离沪，或在狱，或不明住处，暂未编组。

会上又讨论了扩充本区地方会^④问题，决定杭州、宁浦（南京、浦口）最先成立，由徐梅坤和王荷波负责；松江、无锡次成立，由邓中夏、王荷波负责；苏州、南通后成立。

七月十七日，上海地方兼区执行委员会召开第四次会议，批准南京宛希俨（东南大学学生）、浦镇工人田玉龙、丁发武、陆志明、史家良、徐邦玉，吴淞工人曾宪明、李炳钦、刘拜农（学生）为中共候补党员。

八月五日，上海地方兼区执行委员会举行第六次会议，决定对“劳动运动委员会”的成员作部分调整：主任王荷波（统揽全局，并负责铁路、船厂活动）；副主任王振一（秘书、编辑、教育宣传）；副主任甄南山（参与大计，负责机工运动）；邮差方面，许德良负责；吴淞方面，林蒸、刘拜农负责；杂务，刘华负责；《星期日》刊物，由徐梅坤、刘拜农，张特立、甄南山、邓中夏负责供给材料。

八月十二日，上海地方兼区执行委员会举行第七次会议，对徐梅坤因病请假的问题，讨论同意准假至病愈为止，以候补委员张特立递补。由沈雁冰代理秘书。

会上并提出小组改组的名单，共分四个组：

第一组十人：许德良（组长）、瞿秋白、张春木、严信民、黄让之、张特立、邓中夏、施存统、王一知、邵力子。

第二组十人：董亦湘（组长）、杨贤江、糜文溶、沈雁冰、黄玉衡、郭景仁、游星五、彭习梅、顾作之、沈泽民。

第三组十人：林蒸（组长）、张人亚、周启邦、傅立权、张秋人、徐梅坤、曾宪明、刘仁静、贺昌、刘拜农。

第四组七人：陈其寿（组长）、甄南山、谭国昌、谭子崇、方观林、王振一、王荷波。

尚有林伯渠、刘宜之、赵醒侬、欧阳笛渔、茅延

桢、雷晋笙、张铭世、高保民、周耕庐、朱鹤琴、李启汉、韩白书、张学琅、李关松、陆增祥、袁长生、吴冰如、郭明友十八人，或因病假，或已离沪，或在狱中，或不知住处，未编组。

八月，上海地方兼区执行委员会第八次会议，提到邓中夏因代表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赴宁出席团的全国代表大会，由沈雁冰代理委员长。

九月二日，上海地方兼区执行委员会召开党员大会进行改选。原委员长邓中夏已担任团中央执行委员，原正式委员王振一、甄南山和候补委员张特立、郭景仁等人或已调动工作，或已离沪，或因其他原因，委员会委员出现缺额。补选王荷波、徐白民二人为正式委员，递补候补委员顾作之为正式委员，补选瞿秋白、向警予、林蒸等三人为候补委员。这样，改选后的上海地方兼区执行委员会即以王荷波、徐白民、沈雁冰、徐梅坤、顾作之五人为正式委员，瞿秋白、向警予、林蒸三人为候补委员。

九月四日，上海地方兼区执行委员会举行第九次会议，讨论委员的分工，决定由王荷波任委员长，沈雁冰负责秘书兼会计，徐白民、顾作之负责国民运动，王荷波（兼）、徐梅坤负责劳动运动（徐梅坤病假期间由瞿秋白代）。

九月五日，邓中夏向新任委员长王荷波办理工作移交。

九月十二日，上海地方兼区执行委员会举行第十二次会议（组长会议），将经过详细调查长期留沪的党员三十三人重新分为四个组：

第一组十人：施存统（组长）、瞿秋白、邓中夏、严信民、黄让之、王一知、邵力子、张人亚、刘拜农、向警予。

第二组十二人：许德良（组长）、糜文溶、郭景仁、黄玉衡、顾作之、彭习梅、林蒸、张秋人、徐梅坤、董亦湘、杨贤江、沈雁冰。

第三组八人：陈其寿（组长）、甄南山、谭国昌、谭子崇、方观林、王荷波、游星五、傅立权。

第四组（吴淞特别组）三人：周启邦（组长）、曾宪明、董仲明。

九月十七日，上海地方兼区执行委员会举行第十三次会议，批准以下四人为中共候补党员：1、杨大元，南京浦镇工人，江西人，二十岁，王恩荣为入党介绍人；2、戴恒德，南京浦镇工人，安徽人，二十二岁，王恩荣为入党介绍人；3、顾钦，上海同德医学院学生，无锡人，二十岁，糜文溶为入党介绍人；4、张志和，无锡人，三十五岁。会议还提到，已派中共党员沈泽民、中共候补党员高尔松、高尔柏到南京，令浦镇支部与南京同志，时常开联席会议，共商一切。

九月二十日，上海地方兼区执行委员会举行第十四

次会议，决定“国民运动委员会”继续进行工作，由徐白民兼任“国民运动委员会”委员长。原有委员大半已因事离沪，改派杨贤江、陈其寿、黄让之、董亦湘、瞿秋白、张秋人、邓中夏、施存统八人为委员。

九月二十七日，上海地方兼区执行委员会举行第十五次会议，决定根据中央关于国民运动应包括劳工运动、妇女运动、学生运动、商人及农民运动等一切运动的意见，对所设的“国民运动委员会”实行改变组织方法，并改派王荷波等十八人为委员：

劳动方面：王荷波、徐梅坤、林蒸、陈其寿、许德良。

妇女方面：向警予、沈雁冰。

学生方面：杨贤江、黄让之、阮永昭、恽代英。

店员方面：郭景仁、徐白民。

此外，尚有委员瞿秋白、董亦湘、张秋人、刘拜农、邵力子五人。

这次会议还决定改组小组，党员三十一人分为四个组：

第一组十人：王一知（组长）、瞿秋白、邓中夏、施存统、向警予、卜士奇、许德良、徐白民、恽代英、黄让之。

第二组十一人：张人亚（组长）、糜文溶、黄玉衡、郭景仁、顾作之、彭习梅、张秋人、徐梅坤、董亦湘、

杨贤江、沈雁冰。

第三组六人：陈其寿（组长）、甄南山、谭国昌、谭子崇、林蒸、刘拜农。

第四组四人：周启邦（组长）、曾宪明、董仲明、阮永昭。

十月四日，上海地方兼区执行委员会第十六次会议决议：杭州现有党员五人编为第五组，以安存真为组长。

十月十一日，上海地方兼区执行委员会举行第十七次会议，批准瞿秋白辞去“国民运动委员会”委员职务。会上又决定将南京、浦口的党员分别编为第六、第七两个小组。

第六组（南京）五人：谢远定（组长）、沈泽民、侯曜、高尔松、高尔柏。

第七组（浦口）十一人：王恩荣（组长）。

会议还决定派共产党员糜文溶到无锡，帮助当时已在无锡的共产党员朱鹤琴、候补党员张志和组织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无锡支部，发展团员，办工人夜校。

十月二十五日，上海地方兼区执行委员会举行第十九次会议，批准顾作之因夜校职务关系，不能到会，辞去委员职务，候补委员瞿秋白递补为正式委员。

十一月一日，上海地方兼区执行委员会举行第二十次会议，决定改组小组：第一组组长黄让之辞职，改派

陈比南（即陈比难、陈碧澜）为组长。林蒸调入第三组为组长。增添第五（西门）、第六（法界）两组。第五组六人：郭景仁（组长）、顾作之、徐白民、游星五、傅立权、刘拜农；第六组六人：龚际飞（组长）、王基永、邵力子、恽代英、雷晋笙、韩觉民。

十一月八日，上海地方兼区执行委员会举行第二十一次会议，据南京党组织负责人谢远定报告，南京现有同志五人，连浦口约共二十人，批准成立中共南京地方会，并指示按照党章第六条办理。

十一月中旬，上海地方兼区执行委员会所属党组织党员数和分组情况：上海共有党员四十二人，分为六个组。第一组（上大组）七人，组长陈比南；第二组（商务印书馆组）十二人，组长沈泽民；第三组（虹口组）六人，组长陈其寿；第四组（吴淞组）四人，组长周启邦；第五组（西门组）五人，组长郭景仁；第六组（法租界）八人，组长龚际飞。（《上海地委组织部小组名单及分划》）

十一月，中央局报告中提到党的发展情况时，指出：南京党务比前略有起色，现拟合浦口成立一地方会。杭州同志太少，尚不能成立一地方会。（一九二三年十一月《中央局报告》）

十一月二十二日，上海地方兼区执行委员会举行第二十二次会议，讨论了南京、浦口合组建立中共南京地

方委员会的问题，谢远定来信催中央特派员即去，并希望于星期六以前到南京。因中央一时派不出人，要另约日期。

会议还批准：张景曾、龙康庄、薛卓汉、王逸常、徐梦秋、许乃昌、刘剑华和黄仪蕃为中共候补党员。

十一月二十九日，上海地方兼区执行委员会举行二十三次会议，再次讨论了南京、杭州成立地方会的问题，决定向中央要求增加津贴，以便促进该两处地方会的建立。

一九二四年

一月十日，上海地方兼区执行委员会举行会议，讨论了瞿秋白从广州来信提出辞职的问题，同意瞿秋白辞职。又决定将“国民党改组委员会”改为“国民党委员会”^⑤。因国民党改组事已了，将来一切关于国民运动的事，即由“国民党委员会”指挥，而该委员会又受两地方^⑥指挥。并建议将来正式的“国民党委员会”成员中包括：蔡和森、卜士奇（闸北），徐白民、顾修（南市），韩觉民、恽代英（法租界），张廷灏、张秋人（江湾），刘拜农（英租界）。

会上还讨论批准南京党组织介绍的彭振纲、曾万里、武之华和杭州的宣中华为中共候补党员。

一月十三日，上海地方兼区执行委员会举行全体委

员会议进行改选，选出沈雁冰、沈泽民、施存统、徐白民、向警予五人为正式委员，徐梅坤、杨贤江、张秋人三人为候补委员。会议还决定设立妇女部。

会议对在上海的共产党员四十九人重新分组，共分四个组，地方委员五人，分别代表地方参加。

第一组十七人：刘剑华（即刘华、组长）、邓中夏、瞿秋白、施存统、王一知、张其雄、黄让之、陈比南、张景曾、龙康庄、薛卓汉、王逸常、徐梦秋、许乃昌、向警予、许德良，地方委员沈泽民参加。

第二组十四人：林蒸（组长）、糜文溶、黄玉衡、张秋人、董亦湘、张人亚、孙瑞贤、赵白诚、刘仁静、周启邦、黄隋和、卜士奇，地方委员杨贤江、沈雁冰参加。

第三组十二人：刘拜农（组长，未到沪前先派龚际飞代）、顾作之、郭景仁、游星五、龚际飞、王基永、恽代英、邵力子、雷晋笙、韩觉民、柯怪君（即柯庆施），地方委员徐白民参加。

第四组六人：陈其寿（组长）、甄南山、谭国昌、谭子崇、方观林，地方委员徐梅坤参加。

会后举行了第二届执行委员会成立会。会上向警予提出因工作繁忙和其他原因，请求不担任委员职务；施存统因已担任社会主义青年团地方委员，来函要求辞去党的执行委员会委员职务。讨论结果，同意向警予辞职，徐梅坤递补为正式委员；批准施存统请假，待团上

海地方改选后，再正式就任，暂由杨贤江代理正式委员职务。这样新的执行委员会即以徐白民、沈泽民、杨贤江、徐梅坤、沈雁冰五人组成。施存统任委员长（施存统到任前，由徐梅坤代理委员长职务），沈雁冰任秘书兼会计。

一月二十日，上海地方兼区执行委员会举行特别会议，继续讨论分工问题。会议决定徐白民专管国民党运动，徐梅坤兼管劳动运动。

一月二十二日，上海地方兼区执行委员会和社会主义青年团上海地委举行联席会，讨论国民党委员会组织问题。会上指定：党由杨贤江、团由施存统负责组织国民党委员会。各区国民党委员会，第一区由卜士奇负责、第二区由黄仁负责、第三区由韩觉民负责、第四区由刘拜农负责、第五区（缺）、第六区由张秋人负责、第七区（缺）。

一月二十四日，上海地方兼区执行委员会批准杭州的戴立夫（即戴任）入党。

一月，张秋人在上海介绍杨眉山、许汉臣（广武）、周天僂和汪益增（维恒）四人参加共产党。自此，杨、许、周在宁波开始建党，随即建立了党小组，周天僂负责；汪在台州活动。（据许广武、汪维恒、华林、徐梅坤回忆，浙江省档案馆资料）

二月二十一日，上海地方兼区执委会会议上提到，

杭州有共产党员七人。

三月二十六日，上海地方兼区执行委员会举行会议，经过讨论同意沈雁冰、徐梅坤二人辞去委员职务。因无人可递补，两个委员的名额暂缺。

四月，遵照中央局决定，中共上海地方兼区执行委员会改组为中共上海地方委员会，取消兼上海区的建制^⑦。上海区取消后，上海、南京两地方党的委员会及杭州组均直属中央领导。（一九二四年五月十四日《中央局报告》和《上海地方报告》）

五月，上海党员人数为四十七人，划分五个组。第一组（上海大学）十六人，第二组（闸北）十人，第三组（西门）六人，第四组（法界）七人，第五组（虹口）五人。地方委员三人轮流参加各小组会议，未编入小组。

夏，上海地方委员会派顾作之到嘉兴，与王贯三（中共党员，国民党省党部派他在嘉兴筹建县党部）一起开展建党工作。冬，顾作之介绍沈选千（即沈志清）参加共产党。（《顾作之自述》，浙江省档案馆资料）

九月底，上海地方委员会的负责人是庄文恭。（《郑超麟回忆》，上海市档案馆资料）

下半年，上海地方委员会内设组织部、宣传部、工农部和妇女部四个部。

委员分工：委员长兼宣传部一人，秘书兼组织部一

人，工农部一人；由此三人组成地方委员会。（一九二四年十一月上海地委《关于四月以来工作报告》）

下半年，党的小组已由原来的五个发展为八个，其中有四个工人小组。党员共计一百零九人，其中正式党员六十七人，候补党员四十二人；男党员一百零二人，女党员七人。八个小组为：上大二十三人，杨树浦十三人，闸北十六人，虹口十五人，店联十四人，南洋厂八人，西门十人，小沙渡八人^⑧。（一九二四年十一月上海地委《关于四月以来工作报告》）

十月，谢文锦到家乡浙江温州（当时为永嘉县）建党，胡公冕同往。谢、胡到温州后，先发展郑恻尘、胡识因参加共产党。第一批入党的还有林平海、庄竞秋等人。（胡识因、陈仲雷、苏中常等人回忆，浙江省档案馆资料）

十二月，在温州新民小学内成立了温州最早的党组织，胡识因为负责人。（同上）

一九二五年

一月，党的“四大”通过的党章规定：有党员三人以上均得成立一支部。一地方有三个支部以上，组织地方执行委员会。有二个地方执行委员会的区，组织区执行委员会。

二月，浦口支部、南京支部已建立，仍属上海地方委员会领导。（《严侏纯回忆》，江苏省档案馆资料）

三月，嘉兴支部成立，顾作之任书记。（顾作之、朱亮人回忆，浙江省档案馆资料）

五月八日，上海地委举行会议，决定周启邦为无锡支部书记。

会上还批准郁士发、聂冬生、吴开先、蒋燮文、达昌晋、顾维桢、黄（王）亚璋、顾谷宜、金华等九人入党。

五月十五日，上海地委举行会议，批准戴盆天（丹阳）、黄竞西（丹阳）、孙选（江阴）、吴锡义、徐正海、翟福贵（早已加入）、孙道松（浦口）、肖青仲、石贤福、张云龙、刘峻山、韩扬福、俞福生、吴稽天、刘君襄、张长根、尤桢彦（上海）加入中国共产党。

五月二十九日，上海地委会议，讨论国民党上海执行部和江苏省党部的工作。决定指派我党指导员进行工作。因支部多，指导员不够分配，特设“指导委员会”，委员会由彭礼和、郭景仁、张蕴良、任作民、任弼时五人组成。决定游星五、郭景仁、蔡鸿干、杨裕发、谭麟伯、志球、侯绍裘、鹏万、陶准、顾谷宜十人为国民党上海执行部组织部指导员。指定侯绍裘、宛希俨、刘重民、高尔柏、戴盆天、孙选、杨锡类、朱季恂、柳亚子、徐章芳、黄竞西、吴启人、陈贵三等十三人为国民党江苏省党部委员。

上半年，据《上海地方同志名册表》统计，上海地方

所属共有二十六个支部，党员二百九十七人。其中上海本埠的支部十五个，党员二百二十人；外埠支部十一个，党员七十七人。

上海本埠支部：

上大支部：施存统、陶准、朱松年、王一知、彭习梅、朱义权、李秉乾、郭伯和、许德良、韩觉民、恽代英、侯绍裘、高尔柏、黄正厂、徐德据、刘移山、刘一清、钟复光、李咏、韩步先、刘峻山、韩扬初、吴稽天、刘君襄、何成湘，共二十五人。

商务支部^⑨：杨贤江、董亦湘、沈雁冰、糜文溶、黄玉衡、赵虎廷、沈泽民、张维杰、杨子立、孔德祉、顾庆，共十一人。

杨树浦支部：何量澄、涂作潮、田鹏飞、曾祥、高雷、张佐臣、黄抡先、刘玉峰、郑福宁、袁安志、沈永福、张云龙、万金福、谢文奎、余长盛、周锦昌、李桂卿、陈定观、少云、聂珍光、杨正思、甘麟、梁鹏万、邓松林、张瑞明、阿桂、张阿三、杨剑华、胡长生、罗阿言、朱天侠、孙云生、方定宇、李再之、谭仲廉、萧全胜、甄南山、沈其昌、陈其寿、谭国昌、陈卓熙、黄亚璋、尤桢彦、谭子崇、彭应生、黄超，共四十六人。

店联支部^⑩：孙瑞贤、郭景仁、洪杨生、陈竹山、黄雪渔、何味辛、方渊泉、韩白骋，共八人。

沪西支部：孙良惠、黄原昆、陶静轩、夏福生、李

瑞清、马彦波、王定玉、邓中夏、蔡支华、胡先清、刘剑华、江源清、顾修、余小峰、刘月柱、徐晋珊、孔燕南、郭尘侠、王瑞安、关明轩、盛松林、文巧云、刘贯之、朱国平、李金生、姜维新、郭干贞、李剑如、曹正甫、孙杰三、郑永寿、李天涯，共三十二人。

沪南支部：徐白民、沈资田、蔡希白、凌志霄、余茂怀、王作英、魏邦杰、李士林、陈达人、周民铎、张半泓、萧青仲、俞昌时，共十三人。

南洋支部^⑪：向警予、李成(即李立三)、顾顺章、唐景星、陈倩如、陈雁如、余得富、李一纯、姚堃发、欧阳贺之、石贤福、张云龙、俞福生、张长根、唐金生、钱华章、杜如生、杨有为，共十八人。

海员支部：李启汉、宣中华、朱宝庭、陈杏林、朱明江，共五人。

金银业支部：梁茂康、庄向初、王正鸿、曹昌镛、傅义堂、洪永庆、王体芳、肇元、黄宝棠、刘少奇、杨之华、张琴秋、杨寅寿，共十三人。

印联支部^⑫：徐树桐、郑福泰、江沛贞、徐洪生、陈醒我、宣文彬、郁士发、聂冬生，共八人。

徐家汇支部：梅电龙、高尔松、江锦炳、周应华、陆宗贻、顾谷宜、吴开先，共七人。

公共支部^⑬：张伯简、薛世纶、郑超麟、张蕴良、任弼时、张佐臣、张秋人、邵力子、庄文恭、谢文锦、贺

昌、任作民、俞秀松、彭礼和、吴雨铭，共十五人。

邮务支部：游星五、叶绍棋、黄小杨、葛锡堂、顾光荣、胡云仙，共六人。

浦东支部：杨裕发、朱谦志、蒋燮文、达品晋，共四人。

馆支部^⑭：蒋定颐、杨子敬、陈金阶、孔南山、李金山、胡桂发、马桂生、卢启秋、顾维楨，共九人。

外埠支部：

南京支部：宛希俨、谢远定、林剑城、曹壮父，共四人。

浦口支部：曾禄元、薛仁轩、唐绍元、徐邦玉、苏松桃、翁必兴、武之华、丁发武、沈锡圭、张振诚、戴恒德、徐家友、史家良、田玉龙、买雨田、郑宝顺、翟福贵、薛卓江、郭德成、郑大年、巴义昌、孙道松、王宇田、陈荣、曹国楼、冯立德、周汉靖、陈金源、余其鉴、秦启万、张文焕、吴锡义、徐正海、吴芳，共三十四人。

无锡支部：周启邦、薛萼果（即孙冶方）、徐萼芳、杨锡类、陈明焄、唐光明，共六人。

苏州支部：陆秋心，一人。

丹阳支部：戴盆天、黄竞西，共两人。

江阴支部：孙选，一人。

杭州支部：安存真、华林、倪忧天、詹绍鸿、王（黄）中美、岑仁明、汪益增，共七人。

嘉兴支部：顾作之、王贯三、沈选千，共三人。

宁波支部：周天僦、许孟起、杨眉山、谢传茂、石愈白，共五人。

温州支部：胡识因、郑恻尘、林平海、庄琴秋、胡惠民，共五人。

赴北省支部：王秋心、李炳祥、王环心、魏天翮、戴树棠、孙道济、金华、钱靖泉、张子和，共九人。

（一九二五年上半年《上海地方同志名册表》）

八月份以前上海地方委员会的负责人只有庄文恭和李成两人。“五卅”运动以后，李成在上海总工会工作，上海地委实际上由庄文恭一人负责。

八月二十一日，根据中央局八月十五日关于将中共上海地方委员会改组为中共上海区委员会^⑮的决议，指定庄文恭、何量澄、顾顺章、尹宽（即尹硕夫）、郑超麟、何今亮（即汪寿华、何晋亮、何松林、宋林）、李成七人为正式委员，张佐臣、戴三、陈竹山三人为候补委员，正式成立中共上海区委员会（简称上海区委）。上海区委由尹宽任书记。区委下设组织、宣传、工农三个部。组织部由庄文恭、何量澄、顾顺章负责，庄文恭任主任，何量澄负责召集会议，顾顺章负责党内工作，陈竹山负责书报流通处；宣传部由尹宽、郑超麟负责，尹宽任主任（兼），郑超麟负责传单和“号外”的出版、印发工作；工农部由何今亮、李成负责，何今亮任主任并负责对内的

工作，李成负责对外工作。张佐臣负责群众工作，戴三任交通。

八月二十二日，上海区委发出枢字第一号通告，宣布上海区委已于八月二十一日遵照中央决议正式成立，以尹宽为区委书记。上海区委的职权为管理上海地方，并领导杭州、嘉兴、宁波、温州、南京、浦口、苏州、无锡、丹阳、江阴等处党组织的工作。

八月下旬，上海区委会议讨论了整顿党团的问题，决定总工会与分工会党团受职工运动委员会指挥。又指定刘峻山为学联党团书记。

八月二十八日，上海区委召开全体会议，决定改组妇女委员会；指定钟复光、梁秋、吴先清、杨子立、朱秀英五人为委员，钟复光为书记。

九月一日，上海区委召开联席会议，决定取消由共产主义青年团设在总工会党团中的团组。又明确规定学生会党团与总工会党团同归共产党地方指挥，共产主义青年团指定一人专门负责。

九月十一日，上海区委举行全体会议，决定上总宣传科与区委职工运动委员会的负责人。上总宣传科以高语罕为主任，区委工委会由何今亮负责，党团书记仍旧。（按：原档案记录中还有五个人名单：何今亮、徐梅坤、王警东、宣中华、项英。）又区委委员何量澄已病故，候补委员楚三（即陈竹山）因负责书报流通处工作，决议

由梁茂康递补为正式委员。

九月十八日，上海区委各部主任会议，宣布了九月十七日中央局会议的决议：“尹宽病，允请假静养，区委书记职责兼宣传部暂指派王一飞担任。”九月二十日，上海区委以枢字第八号通告将中央局上述决议精神通知所属党组织。

九月二十一日，上海区委召开各部主任会议，指定秦怡君为妇女部负责人，何教明为救难会对区负责人。

九月二十五日，上海区委会议，决定改组上海总工会党团。改组后的上海总工会党团由何今亮、谢文锦、项英、林育英四人组成。会上批准成立浦口地方委员会，指定吴芳、曹壮父、丁发武、买雨田、张春山五人为委员，吴芳为书记。

九月二十七日，上海区委组织部报告中提到：区委所属本埠与外埠的支部共有七十四个。其中上海本埠的杨树浦、引翔港、小沙渡、浦东、曹家渡五个工业区的支联干事会共有五十个支部，计：杨树浦支联九个，引翔港支联十二个，浦东支联六个，小沙渡支联十五个，曹家渡支联八个。以企业、机关为单位的支部共十五个：工部局、电车、邮务、海员、铁路、金银业、商务馆、印刷、店联、上大、同文、通讯社、沪南、洗衣、俄馆。外埠独立支部九个：杭州、宁波、温州、嘉兴、浦口、南京、无锡、苏州、丹阳（其中浦口、杭州、宁波三处

即将建立地方委员会)。“五卅”前后党的发展情况是：“五卅”前为二百九十五人，其中正式党员一百四十四人，候补党员一百五十一人；“五卅”后新增加七百八十五人，其中正式党员一百零四人，候补党员六百八十一人，共计党员一千零八十人，男的八百九十四人，女的一百八十六人。(《一九二五年九月二十七日沪区委扩大会议报告》)

九月，徐州成立党的特别支部，有正式党员两人，候补党员两人。(一九二五年十月十五日《团徐州地委组织部九月份总报告》)

十月，中央扩大执行委员会通过的《组织问题决议案》指出：“象上海这种地方我们的党现在扩大了不少，现在已经要在区委之下按区域分划几‘部’，组织‘部委员会’。这一组织上的新办法非常之必要，一则因为指导上方便，二则因为更容易扩大党的组织。”上海区委即根据这一决议，按区域分划为杨树浦、引翔港、浦东、小沙渡、曹家渡、闸北、南市七个部委。

十月，据《上海区委组织系统表》所列，上海区委委员为王一飞、庄文恭、梁茂康、顾顺章、郑超麟、何今亮、李成七人，候补委员为张佐臣、戴三、陈竹山三人。王一飞任区委书记兼宣传部主任；庄文恭、梁茂康、顾顺章任组织部，以庄文恭为主任；郑超麟任宣传部；何今亮、李成负责工人工作。

上海区委所属党组织计有：上海、浦口两个地方委员会和苏州、丹阳、无锡、杭州、嘉兴、温州六个独立支部和宁波支联。上海地方下设杨树浦、引翔港、浦东、小沙渡、曹家渡、闸北、南市七个部委和徐家汇独立支部。其中杨树浦十三个支部，一百六十一人；引翔港十二个支部，一百四十人；浦东六个支部，一百二十人；小沙渡十五个支部，一百四十九人；曹家渡八个支部，一百三十六人；闸北九个支部，一百七十人；南市四个支部，七十八人，徐家汇独立支部九人。浦口地方下设四个支部，党员五十三人，其中浦镇第一支部、第二支部共三十六人，浦口支部十人，南京支部七人。苏州独支三人。丹阳独支三人。无锡独支六人。宁波支联共三个支部(女中、四中、铁路支部)，共二十一人。杭州独支十五人。嘉兴独支四人。温州独支十二人。以上合计：本埠共六十八个支部，党员九百六十三人；外埠共十三个支部，党员一百十七人。总计共八十一个支部，党员一千零八十八人。

十月，上海区委所属上海地方各部委委员及独立支部书记名单：杨树浦部委书记林仲楠(即林育英)，组织廖仁光，宣传聂珍光，妇女王亚璋，交通陈定观；引翔港部委书记蔡支华，组织陈维毅，宣传张佩琳，妇女王永吉，交通余长盛；浦东部委书记张人亚，组织俞伯良，宣传杨鸣皋，妇女张妹英，交通朱俊生；小沙渡部委书

记郭景仁，组织朱国平，宣传张应龙，妇女孔燕南，交通张顺卿；曹家渡部委书记陈竹山，组织糜文浩，宣传吴福星，妇女钟复光，交通王定予；闸北部委书记宣中华，组织郑复他，宣传周天僂，妇女黄胤，交通朱步景；南市部委书记张佐臣，组织沈资田，宣传沈至精，妇女戴希和，交通陈熙征。徐家汇独立支部书记梅电龙。

浦口地方委员及外埠各独立支部书记名单：浦口地方委员会书记兼组织部负责人吴芳，宣传部曹壮父，工人部丁发武；候补委员：买雨田、张春山。宁波支联书记杨眉山，组织部潘枫涂（即潘念之），宣传部陈国咏、陈鸿，交通李宪仲。苏州独立支部书记叶天底。丹阳独立支部书记黄竞西。无锡独立支部书记杨锡类。杭州独立支部书记华林。嘉兴独立支部书记顾作之。温州独立支部书记胡识因。

各种委员会书记及党团书记名单：工人委员会——上海地方：何今亮；外埠：徐梅坤。军事委员会——刘重民，调查：陆震。“民校”^{①⑥}党团——浙江：华林；江苏：侯绍裘；上海：张廷灏。学生党团——上海学联：刘峻山；全国学总：李硕勋。济难会上海代表——黄中美。（上海区委《组织系统表》、《党内负责同志名册表》）

十月七日，上海区委召开各部主任会议，对国民党上海市党部的工作作了研究，对市党部的工人运动委员会拟指定陈秀林或徐梅坤为主任，朱季恂为工农部秘书，

沈雁冰、林钧为组织部指导委员，恽代英为宣传委员。

十月十九日，上海区委枢字第十一号通告提到有关党组织的发展情况是：“五卅”运动中吸收新党员八百人，连原有党员三百人，共有一千一百人。支部增加到七十四四个。

十一月，宁波支联扩大为宁波地委。（丁超、潘念之回忆，浙江省档案馆资料）

十二月，浦口地方委员会已改为南京地方委员会。（一九二五年十二月五日中共南京地方委员会、团南京地方委员会传单，江苏省档案馆资料）

十二月十九日，上海区委发出第二十六号通告：“中央局派罗亦农为上海区委书记”。

十月至十二月，引翔港部委报告中提到部委本身四个月来组织与分工的变动情况：十月，部委书记蔡支华，组织陈维毅，宣传张佩琳，交通余长盛；十一月，部委书记兼组织陈维毅，宣传张佩琳，交通余长盛；十二月，部委书记兼组织陈维毅，宣传蒋仁东（即蒋振东），交通洪继贤。又据十二月份统计，引翔港部委所属支部共十一个，党员一百五十六人。

十二月二十四日，南市部委所属支部共十个，党员八十九人。

十二月，杭州独立支部书记华林接上海区委通知组织杭州地委，这时党员已发展到三十余人。（《华林回

忆》，浙江省档案馆资料)

据十二月统计，上海区的党员总数为一千零二十二
人(男七百七十二人，女二百五十人)，支部八十六个。

一九二六年

一月，引翔港部委书记为陈维毅，组织嵇直，宣传
蒋仁东，妇女蒋自权，交通洪继贤。二月至三月，嵇直
调走，组织部先后由朱鹤鸣、汤育光负责。(《一九二六
年三月三十日引翔港部委工作报告》)

小沙渡部委的组织机构和人员分工情况为：部委书
记郭孟陶，组织梁润庵，宣传俞伯良，交通戴起家，妇
女原由文巧云担任，后指定孔燕南负责。外部的分工：郭
孟陶负责“民校”工作，陶静轩负责工会工作，梁润庵负
责济难会工作，俞伯良负责自卫团训练及经济调查。部
委所属共十五个支部，党员三百一十人。(《一九二六年
一月小沙渡部委工作计划》)

一月，上海区委派顾作之任杭州地委书记，华林移
交工作后即去宁波地委任职。(《华林回忆》、《顾作之回
忆》，浙江省档案馆资料)

一月，上海区委派华林任宁波地委书记。(王安卿、
华林、沙文威回忆，浙江省档案馆资料)

年初，顾作之调任杭州地委书记后，嘉兴独立支部
书记由沈选千代理。(一九二六年一月十五日、二十六

日《志清给曾延^{①7}的信》、《顾作之自述》，浙江省档案馆资料)

一月，苏州乐益女中停办，原校内共产党员侯绍裘、张闻天、叶天底、徐诚美离苏州赴沪，苏州独立支部由许金元接任书记。(《姜长林回忆》，江苏省档案馆资料)

二月十六日，上海区委主席团召开会议，决定设立高级党校，学习期限为八个月，由罗亦农、尹硕夫担任教授。课程有马克思主义概论、经济学、阶级斗争史、列宁主义等十种。

二月，据一九二六年二月十四日陈美红工作汇报的信说：常熟特别分校已经组织好了，前天报告了曾延。

另据李强回忆，上海区委派共产党员、常熟旅沪学生曾培洪（即李强）回乡建立党组织。曾培洪找到共产党员、上海大学学生周文在，发展了王耕英、曾雍荪为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员，成立了常熟特别支部（党团混合支部）属上海区委领导。(江苏省档案馆资料)

三月九日，上海区委主席团会议，决定上海大学支部直接受区委领导。

三月十一日，刘尊一向上海区委报告，要求辞掉区委妇女主任职务，以便以更多的精力注意妇联等外部工作。

三月十三日，上海区委对各部委负责人作了调整：杨树浦部委林仲楠任书记，张叔平（即康生）改任组织；

小沙渡部委苏爱吾任组织；引翔港部委张佩琳改任浦东部委宣传。

三月十六日，上海区委全体委员会议，决定王亚璋为区委妇女副主任，负责女工工作，名义为上总女工指导员。

三月，曹家渡部委及各部负责人：书记陈竹山，组织部糜文浩，宣传部梁郁华，妇女部周月林。由书记、组织、宣传三人组成主席团。所属共有十三个支部，党员二百二十三人。（一九二六年三月三十日《曹家渡部委工作报告》）

三月，绍兴独立支部成立，暂指定蒋仁东任书记。（《上海区委组织部各部委及外埠组织负责人名单》）

三月，据上海区委组织部统计：上海区委所属共有党员二千一百零七人，其中上海地方的党员为一千七百二十九人（男一千二百九十八人，女四百三十一人）；外埠党员三百七十八人（男三百四十九人，女二十九人）。四月，上海区共有党员二千二百四十一人，其中上海地方一千八百零九人（男一千四百二十六人，女三百八十三人）；外埠四百三十二人（男四百零一人，女三十一人）。

据上海区委组织部另一统计表所列：四月份上海区共有党员二千二百六十九人（男一千九百二十八人，女三百四十一人）。其中上海地方一千九百六十四人，外埠

三百零五人。

四月六日，上海区委主席团举行会议，对区委负责人的工作作了分工：庄文恭负责对外埠，何松林对本埠；各部会议由何松林、尹硕夫分别担任；书记处接洽由罗亦农负责。会议并决定组织地方政治委员会，委员为丁晓先、沈雁冰、韩觉民、张廷灏、顾谷宜、黄正厂六人，黄正厂为主任。同意区委妇女主任刘尊一辞职，决定由杨之华继任；妇联改选，找熊季光代。会议还决定派庄文恭到南京改组南京地方委员会。

四月十八日，上海区委主席团临时会议，认为绍兴最近新发展党员三十七人，应成立地委，决定派梁茂康任书记。还决定改派程仰山（即陈养山）负责书报处。

四月二十日，上海区委主席团会议，决定国民党浙江省党部组织党团，直接隶属上海区委领导，杭州地委参加，并指定潘枫涂为党团书记。

四月，上海区委的正式委员为罗亦农、庄文恭、尹宽、何今亮、陈比难、沈雁冰、顾顺章、林仲楠、郑复他、谢文锦十人；候补委员为张佐臣、陈竹山、朱阿毛（即朱英如）三人。以罗亦农为书记，庄文恭为组织部主任，尹宽为宣传部主任，何今亮负责工人工作，陈比难负责妇女工作，沈雁冰负责“民校”工作。（一九二六年四月上海区委组织部《上海区委委员、各部人员名单》）

上海区委所属共有三个地委，七个部委，十五个独立支部。

三个地委为：南京地委，书记吴芳，组织丁晓峰，宣传吴亚鲁，委员韩连会、丁发武，候补委员吴长松、买雨田、严绍彭。杭州地委，书记兼组织顾作之，宣传允秉，工人沈干城，农民张寅仲。宁波地委，书记兼组织杨眉山，宣传陈国咏。

上海按地区划分为七个部委：第一部委（杨树浦部委）书记林仲楠，组织张叔平，宣传林登岳，妇女千如嫦。第二部委（引翔港部委）书记陈维毅，组织汤育光，宣传陈亦新，妇女王辉（黄辉）。第三部委（浦东部委）书记江元青（即江源清），组织张人亚。第四部委（小沙渡部委）书记郭伯和，组织苏爱吾。第五部委（曹家渡部委）书记谢文锦，组织糜文浩，宣传陈竹山，妇女朱阿毛。第六部委（闸北部委）书记（暂缺），组织李德馨，宣传王少渔。第七部委（南市部委）书记梁郁华，组织沈资田，宣传蔡肖鸿。

十五个独立支部为：苏州独支，书记许金元。无锡独支，书记杨锡类。南通独支，书记邱会培。丹阳独支，书记夏霖。江阴独支，书记孙选。徐州独支，书记贾绿芸。嘉兴独支，书记沈志清。温州独支，书记胡识因。上海徐家汇独支，书记张永和。法租界独支，书记姜长林。先施独支，书记孙瑞贤。学总独支，书记李硕勋。

吴淞独支，书记王警东。上大独支，书记高尔柏。正太独支，书记陆震。（上海区委组织部《组织统计表负责人名单》）

四月，上海区委所属计有职工运动、妇女运动、军事运动、学生运动、宣传运动五个委员会和“民校”、学生、国民会议促成会、济难会四个党团。职工运动委员会，书记何今亮。妇委，书记陈比难。学生党团：学总由李硕勋负责，学联由余泽鸿负责。“民校”党团：上海，张廷灏任书记；江苏，侯绍裘任书记；浙江，宣中华任书记。国民会议促成会党团，书记郭景仁。济难会党团书记肖朴生。（上海区委组织部《各部委员会书记、各党团书记名单》）

四月，上海区委组织部统计：南京地委所属浦镇大厂、小厂、浦口、下关、城内支部及蚌埠特支六个支部，党员一百二十三人；徐州独支所属陇海路、津浦路、平民公司、中学师范、衣庄五个支部，党员二十四人；无锡独支，党员十人；苏州独支，党员二十人；丹阳独支，党员六人；南通独支，党员六人；江阴独支，党员一人。

杭州地委所属安定中学、工业专门学校、省立一中、医药专门学校、英文专修、铁路工人、联合支部七个支部，共有党员六十人。宁波地委所属启明女中、和丰纱厂、铁路工人、农村支部和镇海支部五个支部，共有党

员四十五人。嘉兴独支有党员九人。温州独支有党员七人。绍兴有党员四十二人。

五月二日，绍兴地委成立，梁茂康任书记。所属有第五中学、女师、印刷局、下方桥丝绸四个支部。（一九二六年五月三日《绍性德致曾延信》、《梁茂康自传》、《何步云回忆》，浙江省档案馆资料）

五月四日，上海区委主席团举行会议，决定调龙大道任曹家渡部委书记；谢文锦暂调上总工作。

五月七日，上海区委主席团举行会议，决定组织军事特别委员会，成员为罗亦农、何松林、钟汝梅、余在墨四人，由罗亦农任主席。

五月，华林调离宁波，上海区委派庄文恭去宁波改组地委，由赵济猛任书记。这时党员数量有较大发展，据上海区委组织部统计，共有党员一百二十二人。（华林、潘念之回忆，《上海区同学数量统计》，浙江省档案馆资料）

六月二日，罗亦农在上海区委全体委员会议上谈到上海党组织的发展情况：一九二五年十一月二十日统计，全上海有党员一千三百五十人，一九二六年五月统计为二千五百人。

在这次会上宣布赵世炎任区委组织。

六月四日，上海区委主席团举行会议，对区委负责人的分工又作了研究。分配庄文恭、赵世炎任组织，庄

文恭管统计，多注重外埠；赵世炎到下面去跑。尹宽、罗亦农多到下面去跑，尹宽多注重宣传方面，罗亦农注重接洽及市党部学生的事。会议并决定将徐家汇、法租界合并成立法界部委，指定张永和为书记。又决定调整各部委负责人：杨树浦部委，由谢文锦任书记，张叔平任组织，苏爱吾任宣传；引翔港部委，马如虎任书记，王少渔任组织，何××任宣传；浦东部委，由江元清任书记兼工人（部），张人亚任组织兼宣传；闸北部委，以吴芳为书记兼工人（部），李德馨任组织兼宣传；南市部委，以梁郁华为书记兼宣传，葛毓奇任组织，马祥生任工人（部）；曹家渡部委，以龙大道为书记兼工人（部），曾延生任组织兼宣传。

六月八日，上海区委主席团举行会议，提到最近注重市民运动太笼统，应注重商人运动。决定市民运动委员会改成商民运动委员会，林钧为主任。

六月十七日，上海区委主席团会议宣布，项英以中央职工会名义参加区委的每次主席团会议。

六月十八日，上海区委全体委员会议宣布，区委新任正式委员为：罗亦农、何松林、赵世炎、庄文恭、尹宽、张佐臣、顾顺章、郭伯和、贺昌九人；候补委员为郑复他、丁郁、梅电龙、沈雁冰、余泽鸿五人。会议讨论了委员分工问题，决定由赵世炎、庄文恭任区委组织，赵世炎主管本埠，庄文恭主管外埠并兼理外埠工农运动；

郭伯和以部委兼任区委特派员，贺昌代表青年团，丁郁为妇女主任，余泽鸿为学生主任，沈雁冰为“民校”主任，张佐臣多注意曹家渡方面工作。会上提出：在书记处下设立秘书处，配备一名秘书长，负责起草文告和收集、统计材料，在全委会时报告；并提出正式任命韩步先为秘书长。又决定暂以罗亦农兼任国民党上海市党部党团书记一个月，从事整理，以后准备以梅电龙为党团书记。

这次会议还传达了中央和陈独秀的意见：中央曾主张区委与上海分开，现仍主张混合；又中央起初主张取消部委，现在决定部委不但不能取消，且须巩固。

据六月中旬统计，上海已设立小沙渡、杨树浦、引翔港、南市、闸北、浦东、曹家渡、法租界八个部委，共有支部一百零二个，党员一千八百五十一人。

六月二十二日，上海区委主席团召开会议，决定以陈子安为区委组织部外埠技术书记。

六月二十五日，上海区委主席团举行会议，讨论了国民党江苏省党部的工作问题。江苏省党部的负责人原为侯绍裘，侯自五月份离沪赴广州后即由姜长林负责。会上又决定以庄文恭兼任国民党江苏省党部党团书记；曹壮父为秘书长。还决定致电广州区委调侯绍裘回到江苏省党部工作；刘重民（当时为区委军事委员会负责人）待侯绍裘回来即调往广东。

六月，吴致民为南京地委书记。（《一九二六年林组生组字报告第一号》）

六月，汪伯乐继任苏州独立支部书记，王芝九等为委员。（郑子嘉、张一声、华有文回忆，江苏省档案馆资料）

六月，上海区委决定，将滁县、蚌埠两区与南京地方委员会脱离，直接隶属上海区委领导。

六月，温州独立支部书记胡识因调任国民党浙江省党部妇女部长，独支书记由陈仲雷担任。（胡识因、陈仲雷回忆，浙江省档案馆资料）

七月六日，上海区委主席团会议提出，学联要设特别执行委员会党团，成员共六人，由韩光汉任书记，王深负责交际。

七月十一日，上海区委“民校”扩大党团召开会议，罗亦农在上海“民校”工作状况的报告中指出：国民党（上海）市党部执行委员中，C. P. 占九人。市党部组织党团，直接隶属区委，区委书记兼党团书记；各区区党部要组织党团，由各区的部委直接管理。

七月十六日，上海区委主席团举行会议，决定派赵同仁到引翔港部委负责宣传工作。

七月二十五日，上海区委指定阮仲一为上海区济难会^⑮特派员，主持上海区济难工作。

七月二十七日，上海区委主席团会议提到，上海区

的济难会开始只有阮仲一、肖朴生、韩觉民、熊季光等几个人负责，因人少，工作难以开展。决定在特派员下设济难会委员会，成员为丁晓先（知识分子运动）、蒋宗文（学生运动）、姜长林（“民校”运动）、帅曹林（工会运动）、王弼（救济）。江浙方面，在南京、丹阳、杭州、温州、镇海、嘉兴等地都有济难分会，各地方党组织要指定负责人。

七月三十日，上海区委主席团召开会议，决定吴致民调离南京，由谢文锦任南京地委书记；马禹夫调吴淞；林仲楠任曹家渡部委书记；卓恺泽任闸北部委书记。并决定陈之一任印刷总工会党团书记，闸北、曹家渡部委书记加入，另再增添三人。该党团直接受区委领导。还决定李硕勋任国民党上海市党部秘书长；梅电龙仍任青年部长。

七月，上海区委主席团曾决定调唐公宪任杭州地委书记。唐公宪因故未到职，又改派贺威圣任杭州地委书记。

七月，顾作之从杭州回嘉兴，继续担任嘉兴独立支部书记。（《顾作之自述》，浙江省档案馆资料）

八月三日，上海区委主席团举行会议，决定调张昆弟任引翔港部委书记；小沙渡部委暂以陈之一代理书记。

八月二十日，上海区委主席团会议，通过了组织特

别委员会领导内外棉纱厂罢工。委员会由罗亦农、赵世炎、何松林、李成、项英五人组成，以何松林为书记。尹宽多负责宣传部的工作。

八月，上海区委妇女部的工作自八月份起分为两大部分：一、上海工人区域的一切工作由王亚璋负责；二、上海的普通妇女运动及外县地区工作由陈碧澜负责。（《上海区委妇女部两个月——九、十月工作报告》）

八月，常州党团临时混合支部建立，徐水亭为书记。十月，常州支部建立，徐水亭仍为书记。（一九八二年九月《徐水亭回忆》、恽逸群叙述，江苏省档案馆资料）

九月三日，上海区委主席团举行会议，讨论国民会议促成会问题，指定李硕勋、唐豪、林钧负总责，由梅电龙、侯绍裘等人协助，并组织党团。会议并讨论了济难会的工作，决定向中央请示，将原由阮仲一负责的职务改由肖朴生担任；上海济难会由区委另派人。

九月八日，上海区委举行特别会议，决定部委人员的分配：闸北部委以郭伯和为书记，刘一清任宣传；杨树浦部委以张叔平为书记，苏爱吾任组织，吴致民任宣传；南市部委以梁郁华为书记，钟梦侠任组织；浦东部委以张佐臣为书记，绍虞任组织；小沙渡部委以余立亚为书记，刘伯清任组织，林育英任宣传；引翔港部委书记张昆弟；法租界部委书记张永和。

会上还决定上海总工会组织部、宣传部和各产总的负责人选：李震瀛（即李泊之）任上海总工会组织部主任，龙大道、帅朝吟任组织部干事；何味辛任上海总工会宣传部主任，魏金枝、吴兆鸣任宣传部干事。各产业总工会负责人：邮电：郑复他；码头：沈良惠、陶静轩，码头组织主任马禹夫；海员：梁润庵；印刷：王荃；店员：郭景仁；手工业：王承伟；丝厂：王亚璋。并决定组织码头运动委员会，由沈良惠、陶静轩、马禹夫三人组成，沈良惠任主席，张叔平、李震瀛、张佐臣参加。

九月十四日，上海区委主席团举行会议，讨论了工会的整顿问题，并原则上规定了部委与工会的关系。关于原则上的问题，由部委直接与区委发生关系；纯属职工运动的问题，部委职工委员会与上总发生关系，因上总对内即为区委职工运动委员会。各产总、各码头等由上总管辖，但部委须参加。会上还决定调李硕勋任南市部委书记，派叶学纯、高教之、千如嫦到无锡，赵永生到常州，张文斐到苏州，徐辉祖到杭州担任职工运动的工作。

九月十七日，上海区委举行全体委员会议，提到中央局要调李硕勋到四川，部委负责人又要更动。会议并讨论了小沙渡部委的名单，决定余立亚任书记，林育英任组织，唐海任宣传，程寄如任妇女。

九月十八日，上海区委各部委书记会议，决定调郭

伯和任闸北部委书记。又决定商务印书馆不成立独立支部。

九月二十一日，上海区委主席团召开会议，罗亦农谈到了上海的市民运动问题。他说，今后的目标是组织市民协会及恢复沪商协会。其分工：章郁庵负责发展沪商协会，商余社仍要居益政负责，知识分子由丁晓先、沈雁冰负责。此外，市党部要马上组织市民运动委员会。会议又决定吴致民调浦东部委工作。为了加强对无锡工人运动的领导，会议决定派上海区委委员张佐臣到无锡工作，担任无锡独立支部书记。

九月二十三日，上海区委主席团临时会议，认为应集中力量于城市工作，并着重在交通方面。决定海员支部划归南市，陈之一负责海员工作，并任南市部委委员。董星五负责铁路工作。

九月，俞甫才、陆铁强等自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回到崇明，先后成立了党支部五个，有党员六、七十人。（一九二七年十月十日《江苏省各县党的组织及工作概况》）

九月，管文蔚在丹阳加入中国共产党。管文蔚入党后，党组织派他到无锡等地进行党的工作。（一九八一年五月十八日中共江苏省委文件）

十月十二日，在上海区委主席团会议上，罗亦农提出整个主席团可作为军事委员会，以实行武装起义的准

备。会议决定在十天内召开各地负责同志会议，布置斗争策略。应参加会议的：徐州的曹壮父，南京的谢文锦、刘少游，苏州的汪伯乐，无锡的张佐臣，宁波的赵济猛、王嘉谟，杭州的贺威圣、潘枫涂及江苏省党部一人。

十月十五日，赵世炎在上海区委会议上谈到这一个时期党组织的基本情况，党员人数虽然减少，但党内组织比较稳定。党员人数八月份为二千二百二十三人，九月份为一千三百八十五人，减少了八百余人，但支部数从原来一百三十个增至一百五十个。

十月十七日，上海区委主席团召开临时会议，讨论关于武装起义的组织工作。决定武装起义的总指挥：秘密的由罗亦农负责，公开的由李震瀛负责；技术由奚佐尧、钟汝梅负责。又决定组织工人自卫团指挥处，成员有李震瀛、奚佐尧、钟汝梅、何松林、罗亦农。

十月十七日，上海区委召开外埠负责同志会议，听取各地的工作情况汇报和研究问题。上海区委出席会议的有：罗亦农、赵世炎、庄文恭、袁孟冰、尹宽。外埠负责人参加会议的有：南京：谢文锦、刘少游；苏州：汪伯乐；无锡：张佐臣；宁波：赵济猛、王嘉谟。各地在汇报工作时，都谈到党组织的发展情况。南京地方有十二个支部，党员一百三十人；苏州有十个小组，党员三十余人；无锡有五个支部，党员五十余人；宁波有党员一百六十人。

十月十九日，上海区委主席团会议提到，武装起义的内部秘密总指挥为李震瀛，区委秘密接洽为罗亦农、赵世炎、何松林。

十月二十四日，上海区委主席团举行临时会议，罗亦农在报告十月二十三日晚上海工人第一次武装起义的经过及善后问题时指出：以后区委要指定一个负责总指挥的同志，经常负责军事工作。当即指定李震瀛参加区委主席团。又决定各部委原有军事训练班要进行整顿。

十月二十四日，杭州地委书记贺威圣被捕，暂由蒋仁东代理书记。（中国济难会全国总会一九二九年三月十五日出版的《牺牲》第一集、蒋仁东回忆，浙江省档案馆资料）

十月二十八日，上海区委主席团召开会议，决定军事工作以后不隶属上海总工会，而完全隶属于区委^①，区委每次主席团会议都要讨论。并以李震瀛、钟汝梅、元信三人合组委员会，以李震瀛为主任。开会时罗亦农、赵世炎参加。

会上并决定熊季光担任国民党上海市党部妇女部秘书。

十月三十日，上海区委妇女部九、十月的工作报告中提到：区委妇女运动委员会由王亚璋、熊季光、刘尊一、张应春、李思安、童国希、廖竹君、吴蔷葆、秦坤华、孙似璜、梅玉呵、陈碧澜十二人组成。报告中还提

到各部委妇女部的组织情况：小沙渡妇女部书记程寄如，引翔港妇女部负责人王兰英，闸北妇女部负责人王亚璋兼，曹家渡妇女部负责人缺。

十一月六日，上海区委主席团会议，讨论了上海武装起义问题，认为中央军委兼任沪区军委很不方便。会上提出由钟汝梅负责组织沪区军委，赵世炎、李震瀛、何松林都参加，另外从部委中再找些人。武装起义指挥仍由罗亦农、赵世炎、李震瀛、何松林负责。在组织上，组织一个总的会议，罗亦农多管军事，赵世炎负责党内工作，李震瀛负责工会方面的工作，何松林管外交。

十一月六日晚，上海区委主席团特别会议讨论了区委主要负责人的分工问题，决定赵世炎偏重于党的内部工作，何松林负责对外，贺昌负责学生工作，罗亦农负责军事工作。总的以赵世炎及罗亦农为主。

十一月十六日，上海区委全体委员会议，罗亦农在会上提出，区委要正式组织农民运动委员会，以参加农民运动的同志七人或五人（每区一人）组成之。主任由上海的戴益天担任，宁波竺清旦，泰兴可找陆铁强或俞甫才，浙江省党部也要有人参加，共青团代表一人。另外，在上述四个区中都要分别组织委员会。

会上并决定区委正式组织军事委员会，主任赵世炎，委员钟汝梅。罗亦农平时以党的身份参加，武装起义时则仍然负责。

十一月三十日，上海区委主席团举行会议，讨论了工会的组织问题。讨论中认为过去工会的组织形式，即：上总以常务委员会即为区委的职工运动委员会、各部委书记为上总代表、支部管理工会等等，存在缺点，使得上总不能领导整个职工运动。因此决定对工会的组织领导作适当改变。上层组织中，上总改选执行委员会。区委职工运动委员会改组，并决定以郑复他、陈之一、李震瀛、何松林、王亚璋、顾作霖、陈春林七人为区委职工运动委员会委员，以何松林为主任。中层组织中，组织各产总代表联席会，各部委组织职工运动委员会。基层组织中，以工厂为单位组工会党团，受支部领导。

下半年，如皋青年陆景槐（即陆植三）在上海学联暑期讲习班被批准入党后，回到如皋鄂家埭。十一月间，上海区委又派党员两人来如皋鄂家埭，成立了党支部。党员有叶胥朝等人。（陆植三、叶胥朝回忆，江苏省档案馆资料）

下半年，绍兴地委书记梁茂康调杭州，由何步云继任。十二月，上海区委派朱义本到绍兴改组地委，由朱义本任书记兼组织。（《梁茂康自传》、何步云回忆，浙江省档案馆资料）

十二月六日，上海区委召开特别市市民公会^{②①}党团会议，决定由加入市民公会的各团体的同志组成市民公会党团，区委负责同志参加。市民公会党团的成员为宋

林、赵子敬、孙良惠、范云卿、王景云、张佐臣（上总）、唐鉴、林钧、陈廷勋、林隶夫（学总）、刘荣简、谢祥生、古汉忠十三人，以林钧为党团书记。

十二月七日，上海区委全体委员会议，赵世炎在关于组织工作的发言中提到：到十一月为止，上海的党员已发展到二千五百人，杭州也增加了百余人。

十二月上旬，闸北部委改选。改选结果：书记郭伯和，组织于达、赵之乾，宣传李德馨，职工李世标、章郁庵，妇女朱英如，“民校”丁晓先，学生刘端洲，济难会汪绍之。

十二月中旬，浦东部委改选。改选结果：书记马禹夫，组织杨培生，宣传叶呈兴，职工张培林、妇女施林弟，“民校”张剑白，青年团叶放吾。

十二月，曹家渡部委在工作报告中提到，部委主席团由俞伯良、马天恨、冯丹白、黄超裳、黄临川五人组成。

十二月，松江支部有党员吴志喜、贾愚（韵）生、王济才、金子文、沈选千、王天任、祝国音七人。（一九二六年十二月《松江十二月份报告》）

十二月二十五日，上海区委召开各部委书记联席会议。会上各部委书记汇报党员数字：杨树浦部委所属有党员四百人，引翔港部委五百人，浦东部委二百七十二人，小沙渡部委五百零六人，曹家渡部委一百四十人，

闸北部委四百一十人，南市部委一百六十人，法界部委一百二十五人，吴淞独立支部七十七人，上大独立支部一百一十人。合计上海共有党员二千七百人。

一九二七年

一月二日，上海区委召开支部书记联席会议，会上提到全上海共有支部一百四十二个，党员三千人。

一月四日，上海区委全体委员会议，讨论了上海总工会的工作，决定由何松林、郑复他、李泊之、龙大道四人组成上海总工会主席团。并提出新的职工运动委员会名单：李泊之、何松林、郑复他、顾作霖、余立亚、龙大道、赵世炎、帅朝吟、王承伟九人为委员，李泊之为主任。会上，罗亦农提出，各产总组织党团隶属区委，各工会党团隶属部委。决定手工业党团书记为王承伟，店员党团书记为章郁庵，邮电党团书记为帅朝吟，海员党团书记为梁润庵。

一月初，徐州独立支部下设城内、东关、北关、南关、南乡、东南乡、北乡七个支部，共有党员五十余人。此外，还设立了军委、民委、农委、职委、妇委、编委六个委员会。（一九二七年一月八日《中共徐州独支报告》）

一月十日，中央、上海区委举行联席会议，会上赵世炎在组织问题的发言中提到：上海共有支部一百四十

三个，其中一百人以上的五个，五十人以上的四个，三十人以上的二十二个，二十人以上的十七个，十人以上的三十六个，十人以下的五十九个。上海的党员人数，去年九月底为一千七百人，现为三千零七十五人。全区共有党员四千五百人，外埠以宁波、杭州、南京、无锡的党员较多。上海共有八个部委和两个独立支部。八个部委为：杨树浦、引翔港、浦东、小沙渡、曹家渡、闸北、南市、法界。两个独支为：上大独支、吴淞独支。部委与独支委员、干事都经过改选，人数共九十四人。每个部委的委员人数，少的为七人，多的有十三人。每一部委都由委员三人及C. Y. 一人组成主席团。

一月二十日，经上海区委主席团会议决定，并于一月二十三日正式发出通知：区委妇女部主任陈比难因病辞职，改由刘尊一担任。

一月二十五日，上海区委召开全体委员会议，罗亦农在政治报告中提到：一月份上海有党员三千五百人。

一月二十八日，上海区委主席团举行会议，决定派孙津川、王再生等九人参加铁路工人代表大会；并决定办一期由部委、地委书记参加学习的高级党校。

一月，上海区委决定改组杭州地委，派庄文恭任书记。（庄文恭、华林回忆，浙江省档案馆资料）

一月，如皋党的组织仍为支部，陆景槐为支部书记。（一九二七年一月三十一日《戴盆天向罗亦农的

报告》)

二月四日，上海区委主席团会议，会上罗亦农宣布原定于二月一日召开的全区第一次代表大会改在二月十日召开，会期五天。这次大会为江浙区第一次立法会议。大会议程为：1、中央政治报告——《全国的政治现状及中国革命的前途》。2、区委政治报告——《江浙两省的政治经济状况和今后工作进行方针》。3、区委党务报告。4、职工运动报告。5、农运报告。6、学生运动报告。7、C. Y. 报告。8、妇女运动报告。9、提案。10、选举。

二月八日，徐州独立支部有党员四十二人，党的支部七个，白兴民为独支书记。（一九二六年十二月三十日《中共徐州独支报告》、一九二七年二月八日《中共徐州独支书记白兴民报告》）

二月九日，上海区委召开全体委员会议，讨论江浙区第一次代表大会的筹备工作。代表大会定于二月十一日上午召开。决定代表大会主席团由张佐臣、华林、罗亦农、赵世炎、何松林五人组成。并决定组织以下几个委员会：

政治问题委员会：由罗亦农、华林、张佐臣、赵世炎、谢文锦、侯绍裘、何松林和中央代表一人共八人组成，以罗亦农为主任。

组织问题委员会：由赵世炎、王嘉谟、张永和、刘

少游、周恩来、郭伯和、徐伟七人组成，以赵世炎为主任。

工人问题委员会：由何松林、李泊之、郑复他、张佐臣、谢文锦、陈鸿、江元青、余立亚、张叔平、张之甫（即张昆弟）、杨杏根、赵世炎、章郁庵、王承伟、顾作霖十五人组成，以何松林为主任。

农民问题委员会：由罗亦农、戴盆天、侯绍裘、华林、竺清旦、朱务平、彭述之、徐伟、崇明一人共九人组成，以罗亦农为主任。

学生问题委员会，由余泽鸿、徐伟、张永和、陈余星、刘尊一、刘荣简、上大一人共七人组成，以余泽鸿为主任。

提案审查委员会：由谢文锦、华林、张佐臣、罗亦农四人组成，以谢文锦为主任。

妇女问题委员会：以刘尊一、杨之华、陈比难、世瑜、徐伟、朱英如六人组成，以刘尊一为主任。

会上还提出区委改选的名单，计正式委员十三人：罗亦农、张佐臣、赵世炎、李泊之、尹宽、何松林、张之甫、谢文锦、郑复他、余立亚、庄文恭、张永和、王亚璋。候补委员七人：张叔平、余泽鸿、江元青、杨培生、刘尊一、郭持民、王承伟。

二月十六日，在上海区委改选后的第一次全体委员会议上，选举罗亦农为区委书记、赵世炎任组织、尹宽

任宣传、何松林任职工，由以上四人组成区委主席团；韩步先为秘书长。并决定调张永和任杨树浦部委书记，刘平衡调法界部委。又决定镇江归南京；无锡、江阴、常州、苏州等合成为无锡地委。

在这次会上，还提出了各个委员会的人选：

职工运动委员会：主任赵世炎，委员王承伟、余立亚、何松林、李泊之、郑复他、张永和、马禹夫、龙大道、徐梅坤、张叔平、江元青、郭伯和、C. Y. 一人。

学生运动委员会：主任余泽鸿，委员郭子民、刘振铎、陈曷德、刘尊一、刘荣简、王心远、杨振铎、黄承镜（即黄澄镜、黄逸峰）、蒋寿田。

妇女运动委员会：主任刘尊一（负责知识分子工作）、王亚璋（负责女工工作），委员陈比难、世瑜、朱英如、钟鉴、陈彭、叶素芳、姚云漪、李咏、吴蔷薇。

军事委员会：主任顾顺章，委员钟汝梅、徐梅坤、赵世炎。

济难委员会：主任王弼，委员杨世昌（南京）、杭州、宁波、徐州、丁晓先、张应春、何洛、周莫英^{②1}。

农民运动委员会：主任罗亦农（兼），委员戴盆天、曹家渡、宁波、无锡、徐州、安徽（朱务平）、如皋、泰兴、崇明、温州、江阴（孙选）、杭州、南京^{②2}。

二月二十三日，中央、上海区委举行联席会议，决

议停止当天的武装起义，由上总发布复工命令，并决议组织特别委员会指导工作和组织特别军委和宣委。

特委名单：陈独秀、罗亦农、赵世炎、何松林、尹宽、彭述之、周恩来、肖子璋。

军委名单：周恩来、顾顺章、颜昌颐、赵世炎、钟汝梅。

宣委名单：尹宽、郑超麟、高语罕、贺昌、徐伟。

二月，经上海区委批准，建立常州独立支部，徐水亭为书记。党员四十余人。（《徐水亭回忆》、恽逸群叙述，江苏省档案馆资料）

三月四日，特委会议提到，全上海有党员三千八百五十六人，南京有党员二百余人。

三月五日，特委会议决定武装起义的指挥人。闸北：赵世炎、顾顺章；南市：周恩来、徐梅坤，如南市不重要，恩来可调至闸北；浦东：马禹夫、宣中华、孙良惠。

三月七日，上海区委主席团会议提出，区委组织改变为主席团、政治局及组织部、宣传部等，并作了分工。主席团的成员为赵世炎、尹宽、何松林、罗亦农、张昆弟、李泊之、王亦飞（即王一飞）、徐伟八人。政治局的成员为赵世炎、罗亦农、何松林，日报主笔蔡和森。组织部由赵世炎、张昆弟负责；宣传部由尹宽、王亦飞负责。会上决定将上海划分区域，成立闸北、南市、沪

东、沪西、公共租界（沪中）、浦东、法租界、吴淞八个部委（江湾属于闸北）。并确定了各部委的负责人：闸北部委郭伯和，南市部委江元青，沪东部委张永和，沪西部委余立亚，公共租界部委余泽鸿，浦东部委马禹夫，法租界部委刘平衡，吴淞部委俞伯良。

在这次会议上，还研究了上海总工会的工作，提出要恢复上总常务委员会；上海总工会的内部组织机构增设经济斗争部、交际部和纠察部三个部，连原有的秘书、宣传、组织共六个部。由汪寿华任上总委员长，杨培生任副委员长，李泊之负责组织部，赵子敬负责宣传部，龙大道负责经济斗争部，顾顺章负责纠察部，郭景仁负责交际部，赵并懽任秘书长。又决定全上海工人划分为二十二个产总：1、市政，2、城市交通，3、纱厂总，4、码头运输，5、海员，6、丝厂，7、纺织，8、印刷，9、铁路，10、金属业，11、烟厂，12、木行，13、建筑，14、洋行服务，15、店员，16、衣业，17、艺界，18、化学品，19、食料，20、教职员联合会，21、手工业，22、皮件工会。各产总的负责人为：市政：郑复他、王克全，纱厂：张维尊，码头：张叔平，海员：李金福，丝厂：朱英如，纺织：章勤英，印总：徐梅坤、王景云，金属业：杨培生，铁路：孙津川，烟厂：罗冰，手工业：王承伟，店员：章郁庵，医药：陶文波，艺界：倪子侠，化学品：沈资田。

三月七日晚，特委举行会议，到会的有陈独秀、彭述之、罗亦农、赵世炎、周恩来、何松林、肖子璋、徐伟、尹宽九人。会上罗亦农汇报了当天在区委主席团会议上提出的在区执行委员会中设政治局，政治局下面设主席团，主席团扩大为八人。主席团下分组织、宣传等部的意见。陈独秀在发言中不同意区委设政治局，并认为主席团的人数八人太多。他说：“政治局只中央需要。”又说：“主席团人数太多，如多则反减少负责的力量。主席团五人够了，政治局包括在内。”会上对区委主席团的人数进行了讨论。最后陈独秀的意见是，主席团人数尽可能以五人为限，万不得已时加添一、二个人；政治局可并在主席团之内，将来在主席团内以一人去负责机关报。^{②③}

三月十三日，在特委会议上，赵世炎报告宁波党内情况时指出：宁波现有党员六百人，其中市区三百人，知识分子占百分之二十，工人占百分之四十，农民占百分之四十。城市中铁路支部最好，干事会很起作用。

三月十四日，上海区委主席团举行会议，赵世炎在浙江问题的提案中指出：目前浙江已有党员一千二百人；杭州是浙江的中心，受上海指挥实多不便，是否应另成立省委。万一不改变，杭州地委应成为全浙江的指挥中心。讨论结果是，区委要有步骤地指导工作，地委间加强相互联系，仍为地委建制不变。会上并讨论了外

埠的工作问题，决定外埠工作由主席团讨论，不设专人负责。

三月十五日，特委会议提到党的发展情况：据三月十四日统计，有党员四千四百余人。

三月二十三日，特委会议提到，郭伯和仍任闸北部委工作，调若飞到南市部委暂代理几天，王荷波调吴淞部委工作。

三月二十八日，上海区委主席团举行会议，罗亦农在发言中指出：以后区委要组织一政府党团，以区委政委为党团书记，在政府附近定一房子，为党团办事机关，上海市政府党团以罗亦农、何松林、林钧、丁晓先组干事会，丁晓先为秘书。

会上还讨论上海总工会的工作，并选出以汪寿华、杨培生、张之甫、李泊之、龙大道、赵子敬、顾顺章七人为上总常务委员会委员。由汪寿华任委员长、杨培生任副委员长，张之甫负责组织部，李泊之负责宣传部，龙大道负责经济斗争部，赵子敬负责交际部，顾顺章负责纠察部。

三月，川沙独立支部建立。（一九二七年三月二十六日《川沙独立支部的报告》）

三月份统计，江苏（包括上海）^{②④}的党员人数为一万三千人^{②⑤}。（一九二七年四月二十九日《陈独秀在中国共产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

三月，上海区委批准，宜兴特别支部建立，史曜宾任书记，有党员十一人。（一九二七年下半年《中共宜兴县委报告》）

四月十日，南京地委谢文锦、文化震、陈君起被捕，遭杀害。“四·一二”后，上海区委先后派刘少猷（即刘少游）、万益到南京恢复组织。四月中旬，刘少猷任南京地委书记。（《黄逸峰回忆》）

四月十五日，上海区委主席团会议决定，调赵济猛任南市部委书记，张叔平去杭州。

四月十六日，特委举行会议，到会的有陈延年、李立三、罗亦农、赵世炎、周恩来、尹宽。李立三在发言中说：“中央局派我、陈延年及维金斯克来上海，并加入赵世炎及周恩来五人组特务委员会。”又说，我们来是催党的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出席大会；要罗亦农去，陈延年留上海代理书记。

四月十七日，上海区委主席团召开会议，决定参加党的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的代表为：罗亦农、张佐臣、庄文恭、赵济猛、杨培生、杨阿根、郑复他、顾顺章、王根英、林钧、宁波农运一人、南京一人、妇女一人。会上传达了关于召开全国劳动大会的问题，全国劳动大会将于五月一日在武汉召开，每三千（工人）派一代表，沪区可派二百余人，要求代表于四月二十七日前到武汉。

四月十八日，上海区委举行全体委员会议，会上罗亦农谈到的出席党的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名单，基本上与四月十七日区委主席团决定的名单相同，只是增加了李泊之。会上谈到了罗亦农走后代理书记的问题：中央指定陈延年，区委的意见要陈延年参加大会，因广东问题重要；书记由赵世炎代理。决定致电中央征求意见^{②6}。

四月下旬，上海区委宣传部主任尹宽离沪，由周恩来担任区委宣传部长。不久周恩来又被调回武汉，由赵世炎代理宣传部长。六月，中央派王若飞负责宣传部工作。

周恩来担任区委宣传部长期间，宣传部的内部组织和工作人员为：部长周恩来，秘书梁志修，编辑主任张子余，编辑员程新健、林一。

王若飞担任区委宣传部长期间，宣传部的内部组织和工作人员为：部长王若飞，秘书梁志修，鼓动科黄鸣世，宣传科主任程新健，出版科程新健（兼）。出版科下设印刷局和分配局，印刷局由彭礼和负责，分配局由张人亚负责。（一九二七年四至八月《中共江苏省委宣传部报告》）

四月二十九日，上海区委主席团举行会议，讨论苏州、宜兴等地党的工作。区委指定周学熙为苏州独立支部书记。

绍兴地委在“四·一二”以后，基本瘫痪。五月，庄文恭派徐梅君（即徐雪寒）到绍兴整理组织，并由他任书记。（徐梅君、朱义本回忆，浙江省档案馆资料）

五月，张佐臣已返上海工作，上海区委派江元青到无锡担任无锡地委书记。六月初，无锡地委机关遭到敌人破坏，江元青等人被捕。（一九二七年十月十日《江苏省各县党的组织及工作概况》）

五月，上海区委派共产党员刘晓到奉贤农村开展工作。在奉城曙光中学隐蔽下来，以教师身份作掩护。不久，根据党的决定，建立了奉贤曙光中学中心支部，刘晓任书记。（《刘晓回忆》，上海市档案馆资料）

六月，党的“五大”通过的党章规定：省、市或县、区建立省、市或县、区委员会；生产单位建立支部。

六月九日，上海区委主席团会议，讨论了区委组织部要多设指导员，常到外埠调查与指导工作。要专设外埠工作的机构。并决定方渊泉任外埠组织干事。

会议还讨论了苏州（苏州独立支部有五个支部，其中三个工人支部，两个农民支部）、南通、徐州党的活动情况。

六月初，上海区委派黄国材（即黄逸峰）到南京，恢复了南京地委，黄国材任南京地委书记。地委建立后，一个多月内，先后恢复了两浦、兵工厂、和记工厂、造币厂、学生等支部。在徐州铁道团也恢复与发展了四个

支部，共有党员近二百人。（《黄逸峰回忆》）

自“四·一二”至六月底两个半月间，恢复党组织工作的有南京、无锡、宜兴、江阴、如皋、丹阳、苏州、徐州八个县。（一九二七年十月十日《江苏省各县党的组织及工作概况》）

上半年，扬州特支有党员十七人。（一九二七年十月十日《江苏省各县党的组织及工作概况》）

六月二十六日，中共江苏省委成立。陈延年等人参加了中共江苏省委成立会议，王若飞传达党中央决定，宣布任命陈延年、赵世炎、郭伯和、韩步先、康生、张维桢等三十余人为江苏省委委员，陈延年为书记，郭伯和为组织部长，韩步先为秘书长兼宣传部长。开会地点在上海北四川路施高塔路恒丰里一〇四号（今山阴路恒丰里九十号）。当日下午，省委机关遭到破坏，陈延年、郭伯和、韩步先三人被捕。后因韩步先叛变，陈延年、郭伯和被敌人杀害。（张维桢、夏之栩等回忆，江苏省档案馆资料）

陈延年被捕后，由赵世炎代理江苏省委书记。由于韩步先出卖，赵世炎于一九二七年七月二日被捕，后牺牲。（一九七八年八月赵世兰、夏之栩回忆，江苏省档案馆资料）

六月，中共浙江省委成立，书记：庄文恭；组织部：张叔平；宣传部：赵济猛；农民部：卓兰芳；工人部：

张叔平（兼）；妇女部：邬凤英。杭州、宁波、温州、嘉兴、绍兴等地党组织均归省委直接领导。（一九二七年九月二十七日《王亦政在省委改组会上的党务工作报告》、庄文恭回忆，浙江省档案馆资料）

江苏、浙江省委成立后，上海区委即撤销。

注 释

① “区执行委员会”是根据党的“二大”通过的党章第六条规定组织的。但党的“二大”是一九二二年七月才召开的。

② 一九二二年七月党的“二大”通过的党章第九条规定：“区及地方执行委员会……互推委员长一人总理党务及会计；其余委员协同委员长分掌政治、劳动、青年、妇女等运动。”委员会负责人应称委员长。

③ 一九二三年六月，党的“三大”通过了《关于国民运动及国民党问题的决议案》，决定与国民党合作，共产党员以个人资格加入国民党，并帮助孙中山改组国民党为民主革命联盟。“国民运动委员会”即根据这一决议设立，并进行这方面工作的。

④ 原文如此。即地方委员会。

⑤ 即上海党和团的地方委员会。

⑥ 参阅一九二三年十二月二十五日中央通告第十三号，见《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

⑦ 从后来的事实看，上海地委仍继续指导南京、杭州等地党组织的工作。

⑧ 八个小组的党员人数加起来共一百零七人，与总数一百零九人不符。原文如此。

⑨ 即商务印书馆支部。

⑩ 即店员联合会支部。

⑪ 即南洋烟厂支部。

⑫ 即印刷工人联合会支部。

⑬ 据郑超麟回忆，这是中央机关和上海地委工作人员组的机关支部。

⑭ 即俄国领事馆支部。

⑮ 关于改组原因，陈独秀在一九二五年八月二十一日上海地委会议上说：“改组问题大原因为五卅运动关系，五卅运动延长同志分配到总工会工作，地委只剩文恭一人，工作扩大，实际负责人太少，……此其一。五卅运动系党部合作，为使党部分化，各尽其机能，此其二。鉴于五卅运动全国以沪、粤为最重要区域，上海为无产阶级之大本营，工人有五、六十万，……改区为必要……此其三。”

⑯ “民校”是国民党党部的代号。如“江苏省民校”即国民党江苏省党部；“上海民校”即国民党上海市党部。

⑰ “曾延”是团中央的代号。

⑱ 济难会是党领导下的群众性组织。一九二五年十月，中央扩大会议有一个《济难问题决议案》的提案，提出要组织一个扩大而非党的群众会以专办救助事业，任务是“救济为人民奋斗的死者、伤者、被囚者，给予他们以物资与精神的援助。”这个会的性质“是赤色革命的后防而不是慈善机关；既是公开而又非党的。应该由党指挥之”。

⑲ 一九二六年九月二十四日，中央钟字第二十号通告对军事组织系统及它和党的关系作了规定：“军委主任应由该地党委委员会之一委员任之，并参加党主席团会议，俾知全党生活。”“军事特派

员应与党书记发生密切关系，并商量工作，且应用他种名义（如组织部员）参加党主席团会议。”

⑳ 上海特别市市民公会由上海南北市商会、各马路总联合会、学联、学总、上总等团体发起组织。它的组织大纲规定：市民公会以实现上海特别市市民自治，谋市民福利为宗旨。党对市民公会的策略是帮助它组织完善，并提高它的地位。一旦条件有利，就提出政权归市民管理，由市民公会经过市民大会，产生市民政府。（见上海市档案馆编《上海工人三次武装起义》，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第99到100页。）

㉑㉒ 这两处档案原文如此。

㉓ 1. 关于在上海区执行委员会中设政治局的问题，可能由于陈独秀的不同意而未实现，因为在这次会议以后，再没有发现有关区委政治局的文字记载。2. 关于区委主席团的人数和名单，在这次会议后也没有明确的文字记载。但从几次出席区委主席团会议的名单中可以得到一点线索。出席三月十四日区委主席团会议的有罗亦农、赵世炎、何松林、张昆弟、尹宽；出席三月十九日主席团会议的有罗亦农、赵世炎、何松林、周恩来、张昆弟；出席三月三十日主席团会议的有罗亦农、赵世炎、何松林、尹宽、李泊之；出席三月三十一日主席团会议的有罗亦农、赵世炎、周恩来、尹宽。

㉔ 这里，应包括上海区委所辖范围，即江苏、上海、浙江和安徽省铁路沿线部分。因为陈独秀在报告中没有单独列出浙江的党员人数；而且在报告中还讲到：“受中央直接领导的区委共有八个：……江浙区委，其中包括安徽省铁路沿线部分”。

㉕ 据上海区委一九二七年三月中旬统计，上海的党员人数为四千四百余人，浙江的党员人数为一千二百人，与陈独秀讲的一万三千人有较大出入。但从当时的历史情况来看，在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胜利后，党的组织有很大发展。三月二十日，上海区委召

开各部委产总联席会议，罗亦农就在会上强调党要大发展，要求“各部委都成立组织委员会，无限制的发展党。一个月内要有一万人”。三天后（三月二十三日），赵世炎在另一次各部委产总联席会议上，又提出要抓紧发展党，他说：“十天内假使无一万同志，就为党的失败。”因而在三月下旬，上海地区党的组织有较大发展，党员数量有较大增加。陈独秀在报告中所讲的三月份江苏、上海（江浙区）有一万三千个党员是与这一历史事实相符合的。

②⑥ 我们没有查到中央的复电。但陈延年是出席了党的“五大”的。

作 者 说 明

这份材料以三省（市）档案馆现有的历史档案为主要依据；缺乏档案的部分，也选用了一些老同志的回忆。为了求实存真，我们除个别地方略有文字加工或加注说明外，基本上都保持了原文。

这份材料是以直属上海地委、上海区委领导的党组织及早期的党员为限，凡不是直接隶属的党组织都没有列入。老同志回忆材料中所提供的地方党组织领导成员，也只列出主要负责人姓名。在时间上，则以建党时期到一九二七年六月江苏省委、浙江省委成立为止。江苏、浙江两省委成立后，上海区委就撤销了。上海党的工作，由江苏省委领导。

材料的出处，除已有注明者外，均见三省（市）档案馆所保存的有关文件和会议记录。

这份材料是以上海市档案馆黄志荣同志整理的《一九二一年至一九二七年上海地区党组织发展概况》为基础，经三省（市）的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和档案馆的同志（上海蒋钤，江苏肖章、谈洪清，浙江沈自强、周庆治），查阅历史档案，进行订正、补充、调查、核实。还曾邀请在上海的老同志和有关专业单位、部分高校的党史教师座谈，征求意见。希望党史工作者，特别是当时亲身经历过的和其他了解情况的老同志，能多提宝贵意见，以便作进一步修改、补充，以臻完善。

关于作出南昌起义决定的情况

南昌“八一”起义纪念馆

关于何时何地到什么会议上决定南昌起义的问题，长期未弄清楚，至今说法不一。目前大体有两种意见：一种认为，南昌起义是党中央经过长时间的酝酿和反复讨论后，于一九二七年七月十八日在武汉决定的^①；另一种认为，南昌起义的许多重大问题，是在七月十九日召开的庐山会议上决定的，然后由瞿秋白把会议决定带到中央，中央最后决定在南昌举行起义^②。

我们调查研究所得的结论是：关于在南昌举行武装起义的问题，是一九二七年七月二十日，李立三、邓中夏、谭平山、叶挺、聂荣臻等同志在九江举行的“谈话会”（即九江第一次会议）上首先提出来的，并征得瞿秋白同志（当时在庐山）同意，由秋白将意见带到武汉向中央汇报。七月二十三日（或二十四日上午），谭平山、邓中夏、恽代英等同志电告在庐山的李立三下山，再次举行会议（即九江第二次会议），研究暴动计划，并急电中央请示可否。七月二十四日，临时中央政治局

常务委员会赞同九江同志们的意见，并派周恩来同志为前敌委员会书记，赴前敌指导工作。二十五日（或二十六日），周恩来赶到九江，召集在九江的领导同志开会（即九江第三次会议），传达了中央的决定，最后商定积极进行准备，在南昌举行武装起义。

一、第一次九江会议，提出 在南昌举行暴动

一九二七年六、七月间，我党很多同志针对国民党反动派的日益反动，提出武装暴动的主张。这些主张都没有得到共产国际代表和陈独秀等人的支持。七月十二日中央成立由张国焘、周恩来、李立三、李维汉、张太雷组成的临时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陈独秀离开中央领导岗位。党内主张暴动的领导人大多参加了五人常委，武装暴动的思想在党中央取得了统治地位。七月中旬，中央决定在湘鄂粤赣四省举行秋收暴动。“此时解释，要以农民为主力，去进行土地革命，并未丝毫依赖军事力量。”“中央决定南昌‘八一’暴动，是决定在四省秋收暴动以后。”^③

“七·一五”汪精卫公开叛变后，中央五人常委于七月十九日派李立三、邓中夏、聂荣臻等到九江，谭平山同志亦到，准备组织北伐军中受我党领导和影响的一部

分力量回广东，“号召农民暴动，实现土地革命，建立新的革命根据地”^④。“当时我们党的意思是主张集合我们的武力，依张发奎回粤徐图发展”^⑤。

“至七月二十号左右”^⑥，李立三、邓中夏、谭平山、叶挺、聂荣臻等同志在九江举行了一次“谈话会”^⑦。到会同志认真分析了当时的政治军事形势，认为“在政治上武汉政府已完全反动，唐生智正在积极屠杀我党，压迫工农运动。汪精卫已完全投降于唐。张发奎态度虽仍表示反唐，却已深受汪之影响，高唱拥汪，并表示对我们不满，有‘在第二方面军之高级军官中的共产党分子如叶挺等须退出军队或脱离共产党’之表示”^⑧。“在军事上四军、十一军已向南昌移动，驻扎于马回岭、涂家埠一带，二十军已渐次集中九江。朱培德之三军移驻樟树，九军移驻临川。程潜之六军经江西之萍乡分道向南昌集中，有包围我军之形势。”^⑨“军事上已到了极严重之时期，而张尚徘徊于武汉，则张之不可靠，更可证明。”^⑩与会同志一致认为，由于“张发奎态度之犹豫与右倾，那么依靠张为领袖之回粤运动，很少成功之可能，甚至为三、六、九军所包围而完全消灭。纵然回粤成功，我们亦必在张、汪协谋之中而牺牲，将与我们回粤去号召农民暴动，实现土地革命，建立新的革命根据地之目的完全相反”^⑪。我党“应该抛弃依张之政策，而决定一独立的军事行动”^⑫。“决定在军事上赶快集中南昌，运

动二十军与我们一致，实行在南昌暴动，解决三、六、九军在南昌之武装。”^⑬同时，“在政治上反对武汉、南京两政府，建立新的政府来号召”^⑭。对上述问题的讨论，“在这次会议中没有不同的意见”^⑮。只是在谈到请示中央时，由于情况紧急，有人曾“主张不待中央命令，即刻发动”^⑯。但最后仍决定“将这项意见报告中央”^⑰，“准备待中央命令一到即发动。”^⑱

第一次九江会议召开时，共产国际代表鲍罗廷、原中央常委瞿秋白都在庐山。李立三、邓中夏“即赴庐山和秋白商议，秋白亦完全赞同这项意见”^⑲。因为听说中央有召集紧急会议的消息，秋白要回武汉开会，李、邓等即请秋白把九江同志的意见代为报告中央，请中央火速决定。同时，聂荣臻也应鲍罗廷之邀，去庐山向鲍介绍了在南昌起义的意见。鲍听后“没有表示什么意见”^⑳。

二、第二次九江会议，研究暴动计划

在李立三、邓中夏去庐山与秋白商议时，谭平山继续留在九江活动。这时，形势更加危急，张发奎态度更加右倾，并得悉汪精卫、张发奎、朱培德、黄琪翔等将在庐山开会，解决在第二方面军中的共产党人。七月二十三日，贺龙到达九江。“黄琪翔、朱培德即邀其赴庐

山开会，并百般拉拢。”^{②①}谭平山、叶挺等也立即对贺龙进行争取工作。谭平山“介绍各省代表谒贺”^{②②}，并“将在南昌暴动之计划探贺龙之意见，贺表示甚为热烈”^{②③}。“又得叶挺出来说硬话，于是贺之主张更为坚决”^{②④}。与贺龙到九江的同一天，恽代英也到九江^{②⑤}。由于形势危急，邓中夏、谭平山、恽代英等发电通知仍在庐山的李立三回九江开会^{②⑥}。

七月二十四日，邓中夏、谭平山、恽代英和李立三等在九江召开第二次会议，进一步研究了南昌暴动的计划，决定：叶、贺“军队于二十八日以前集中南昌，二十八日晚举行暴动，并急电中央征可否”^{②⑦}。同时决定，在政治上“组织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为集中政权、党权、军权之最高机关，以反对宁汉政府中央党部，继承国民党正统，没收大地主土地……实行劳动保护为暴动之目的。在这项纲领之下，发表宣言（用国民党中央委员联名名义）”^{②⑧}。

第二次九江会议“对暴动计划完全一致”^{②⑨}。但在讨论要不要把没收大地主土地列入政纲时，发生了“很大的争论”^{③⑩}。“立三、代英主张须提出没收大地主土地的政纲”^{③①}，认为“南昌暴动的主要意义，就是要继续没收土地的斗争，实行土地革命”^{③②}；“中夏、平山反对提出没收土地的政纲，谓恐因此惹起反动势力更加联合的攻击和军队内部分化”^{③③}。由于“争论极烈，当日会议无从

决定（两方人数一样）”^{③④}。最后，“决定报告中央征可否”^{③⑤}？

三、临时中央常委同意 南昌暴动的决定

在第二次九江会议召开时，瞿秋白从九江赶到武汉，共产国际代表罗明纳兹也到达武汉。“当时秋白把南昌的决定由浔带到汉口，中央已决定对张发奎的态度，如张不与汪精卫联络则到东江之后始解决之，否则在浔便解决他。故赞成南昌的决定。”^{③⑥}并“决定派周恩来同志去为前敌委员会书记”^{③⑦}，“指导前敌方面工作”^{③⑧}。

关于临时中央常委这次会议的时间，张国焘说是“七月二十日至二十五日之间”^{③⑨}。我们分析是在七月二十四日，最早也不会早于二十三日，因为二十三日罗明纳兹才到达武汉；也不会迟至二十五日，因为二十五日周恩来同志已离开武汉去九江。

中央同意在九江的同志关于在南昌举行起义的建议后，报告了共产国际。国际复电说：“如有成功把握，可举行暴动。”^{④⑩}“如毫无胜利的机会，则可不举行南昌暴动。”^{④⑪}“将在军队中的同志退出，派到各地农民中去。”^{④⑫}

四、第三次九江会议，讨论 起义实施计划

中央会议结束后，周恩来奉命于七月二十五日（或二十六日）赶到九江，立即召集在九江的同志开会，是为第三次九江会议。会上，周恩来“报告中央意见，认为形势既已如是，对在浔同志的意见完全同意”^{④③}。乃决定“积极进行军事之准备，并由中夏同志将详细计划回汉报告中央”^{④④}。同时，对在浔同志讨论土地纲领时所出现的分歧，周恩来传达了“中央的意见”^{④⑤}，指出“应该以土地革命为主要的口号”^{④⑥}，把没收大地主土地列入了政纲，统一了大家的认识。

第三次九江会议后，周恩来、李立三等负责同志“于二十七日齐赴南昌，正式照中央命令成立前敌委员会”^{④⑦}。至此，南昌起义由酝酿、决定转入实施阶段。

五、同张国焘的斗争和起义 时间的最后决定

七月二十六日^{④⑧}，在武汉的中央常委李维汉、张太雷、张国焘，还有瞿秋白和共产国际、少共国际代表又举行会议，讨论国际复电中关于在南昌举行起义有无胜

利机会的问题。“大家认为即在汉口亦可见着必有胜利机会，故派国焘同志去前敌，以坚决前敌之发动”⁴⁹。但张国焘“对于张发奎有妥协调摇倾向，而表示怀疑举行暴动的言动”⁵⁰。二十七日他抵九江后，即召集“贺昌、(高)语罕、(恽)代英、(廖)乾吾、夏曦诸同志会议”⁵¹，报告国际来电内容，要重新讨论南昌暴动问题，遭到恽代英等的一致反对，说“再无讨论余地”⁵²。同日，前委在南昌“因军事的准备来不及，遂改定于三十日晚举行暴动”⁵³。二十九日，张国焘又两次密电南昌，谓暴动宜慎重，无论如何待他到时再解决。⁵⁴当时前委决定：“暴动决不能停止，仍继续进行一切。”三十日，张国焘赶来南昌，即召开前敌委员会，在会上歪曲中央意见，说“中央意见宜慎重”⁵⁵，他还根据国际来电“如有成功把握，可举行暴动，否则不可动”⁵⁶，提出“目前形势，应极力拉拢张发奎得到张之同意，否则不可动。”⁵⁷周恩来、恽代英、李立三、彭湃、谭平山等都一致反对。争论数小时，因张代表中央意见，不能以多数决定。第二天(三十一日)，再开前委扩大会议讨论⁵⁸。此时，张发奎“迭次来电邀贺、叶到庐山开军事会议，而贺、叶又不敢去。”⁵⁹后张发奎来电说：“准一日到南昌。”⁶⁰同时得知张发奎不但偕汪精卫来，而且孙科也要来的消息⁶¹。在这种紧急情况下，张国焘表示服从多数，遂决定于三十一日晚四时，即八月一日凌晨四时起义⁶²。后因三十

一日晚二十军一个营副赵某泄漏秘密，临时改变，提前两小时举行。实际上当晚十二时半即听到枪声，至翌晨六时，将三、六、九军在南昌的部队完全缴械。南昌起义胜利。

注 释

① 张侠：《胜利的起义，土地革命的开始——从几个问题看南昌起义的历史意义》。载《百科知识》1982年第8期。

② 罗时叙：《南昌起义的准备会议——“庐山会议”史探》。载《江西师院学报》1982年第3期。

③⑩③⑥ 《张太雷在中共中央南方局和广东省委联席会议上的报告——“八一事件”之经过、失败原因及其出路》（一九二七年十月十五日）。载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出版的《南昌起义》一书。

④⑧⑨⑩⑪⑫⑬⑭⑮⑰⑱⑲⑳㉑㉒㉓㉔㉕㉖㉗㉘㉙㉚㉛㉜㉝㉞㉟
④⑥⑦⑧⑨⑩⑪⑫⑬⑭⑮⑯⑰⑱⑲⑳㉑㉒㉓㉔㉕㉖㉗㉘㉙㉚㉛㉜㉝㉞㉟
④⑥⑦⑧⑨⑩⑪⑫⑬⑭⑮⑯⑰⑱⑲⑳㉑㉒㉓㉔㉕㉖㉗㉘㉙㉚㉛㉜㉝㉞㉟ 李立三：《“八一”革命之经过与教训》（一九二七年十月）。载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出版的《南昌起义》一书。

⑤⑥⑦⑩⑱ 叶挺：《南昌暴动至潮汕的失败（摘要）》（一九二七年）。载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出版的《南昌起义》一书。

⑳ 聂荣臻《南昌起义》。载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共中央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编《党史通讯》1983年第14期。

②①②②④⑥⑥② 《周逸群的报告（摘要）——关于南昌起义问题》（一九二七年十月三十日）。载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出版的《南昌起义》一书。

②⑤ 朱其华：《一九二七年底回忆》（一九三三年出版）。

③⑦③⑧③⑨④⑧⑤①⑤②⑥① 《张国焘致中央临时政治局并扩大会议的信》（一九二七年十一月八日）。载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出版的《南昌起义》一书。

④①④⑨⑤⑩ 《中共中央复张国焘的信》（一九二七年十一月三十日）。载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出版的《南昌起义》一书。

后 记

这个专题的调查工作，是一九八二年八月，江西省委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根据中央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的意见，分配给南昌“八一”起义纪念馆进行的。在江西省委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的指导下，调查研究和调查报告的整理，由“八一”馆副馆长张月琴同志具体负责，原九江市委党史资料征集办公室主任王宪章同志协助。江西省委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在一九八三年十月召开全省专题工作会议对调查报告又进行了会审，并作了多次改写。

大连“福纺”厂罢工始末

中共大连市委党史资料征集办公室

大连“满洲福岛纺绩株式会社”（即现在大连纺织厂前身，以下简称“福纺”厂）的“四·二七”大罢工，是处在完全殖民地状态下的大连工人阶级，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而举行的一次有重要意义的罢工斗争。这次大罢工得到中共北方区委和中华全国总工会的关切和重视，李大钊、邓中夏、刘少奇等领导同志曾亲自过问、指导，上海、广州、香港、天津等全国各地人民均给予大力声援和资助。“福纺”厂一千余名工人在大连地下党组织的直接领导和大连中华工学会的具体组织下，同全市和全国人民团结战斗，不畏强暴，不怕坐牢，克服重重困难，从四月二十七日到八月四日，坚持罢工一百天，迫使日本殖民主义者答应了工人提出的条件，撤换了日本厂主，取得了罢工的胜利。

这场罢工斗争，高举反帝的旗帜，沉重地打击了日本帝国主义的殖民统治，大长了大连工人阶级要当主人、不做奴隶的志气。它被当时的新闻界称之为辽东半岛的

“惊天动地之一场大风潮”。

罢工的历史背景和直接原因

一八九四年甲午战争后，又经一九〇五年的日俄战争，日本帝国主义的铁蹄重新踏上了大连这块土地，对大连人民进行残酷的经济剥削和殖民统治。野心勃勃的日本帝国主义将大连、旅顺、金县统称为“关东州”，划归日本的版图，并把这个地方作为推行侵华扩张政策的基地，大肆掠夺我国的财富，疯狂地蚕食我国的领土。大连人民的苦难更加深重。

“福纺”厂，就是日本帝国主义霸占大连后，为进行经济掠夺而在这里开办的企业之一。厂址设在大连市北郊周水子附近的周家屯。这里靠近铁路，对原料和成品的进出都较方便。它于一九二五年春建成投产时，有一万多纱锭，五百多名工人。一九二六年春已增加到近两万纱锭，一千二百名工人。其中大都是因日本帝国主义侵略而破产的农民及其子女。女工占工人总数的百分之五十六，童工占工人总数的百分之三十八。

中国工人进入“福纺”厂，如同进了人间地狱，整日在棉絮纷飞、尘烟弥漫的车间里从事紧张而繁重的劳动。他们每天做工长达十二个小时，而所得的工钱只有两角五分，仅是日本同行工人的四分之一。那些跷起脚来才

能操作机器的童工，最小的只有八、九岁，也要同成年人一样做工，忙得他们连厕所也顾不得上，常常尿在裤子里，可工钱只有一角五分。女工不但工钱比男工少百分之二十，还经常受污辱，挨打骂，有了孩子也不准在工间喂奶。中国工人上工受监视，下工遭抄身，工头稍不顺眼，拳头、棍棒就朝身上飞来。由于工厂没有劳动保护设施，常常发生工人晕倒摔伤或被机器轧伤的悲惨事情，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党关怀处在日本帝国主义殖民统治下的大连人民，关心着大连工人阶级的斗争。从一九二三年到一九二五年，党中央和北方区委先后派李震瀛、陈为人、邓中夏、王荷波、秦茂轩等同志来大连考察工运情况，具体指导大连中华工学会的工作，帮助筹建党和团的组织。一九二四年春，大连中华工学会为发动群众，开展斗争，扩大工学会组织，趁“福纺”厂招工的机会，就派工学会的骨干、铁路工人侯立鉴来这个工厂开辟工作。侯立鉴同志有组织能力，常常利用讲故事的机会，向工人宣传历史上英雄人物的爱国主义精神和京汉铁路工人大罢工的斗争事迹，启发工人的觉悟。

一九二五年三月一日，大连“福纺”厂日本人田中定治郎，无辜杀害了中国工人李吉祥。侯立鉴得知后，立即同木工阎宝恩追拿凶手，并迫使警察将其拘捕归案。回来后，侯立鉴同死难者家属及工友们商量，向厂方提出

严办凶手、赔偿损失、不准打骂工人和为李吉祥出大殓的要求，并要日本厂主和工头参加。开始厂主角野久造只答应前三个条件，拒绝为李吉祥出大殓。工人开始怠工，几天就给工厂造成了很大损失。李吉祥家属和带来的五十多个农民要冲进工厂砸机器。厂主怕事态扩大，又受到日本大老板的指责，只好答应了全部条件。三月五日全厂停工，长长的送葬队伍，吹打着哀乐，护送着李吉祥的灵柩，向大辛寨子墓地进发。日本厂主角野和一些工头戴孝，耷拉着脑袋为李吉祥送葬。围观的人们夹道相望，看到了工人阶级团结的力量，也看到了日本资本家的狼狈相。

五月三十日，上海发生了“五卅”惨案。大连中华工学会、大连中华青年会等七个群众团体发起成立了“沪案后援会”，召开了“五卅”惨案死难同胞追悼大会。侯立鉴率领“福纺”厂二百名工人参加了大会，会后高呼“打倒帝国主义！”等口号，举行了游行示威，使工友们受到了一次深刻的爱国主义教育。

从这以后，侯立鉴经常带领初玉昆等工友到大连中华工学会听课，传看《新青年》、《独秀文存》等书刊。工友们进一步懂得了只有团结起来，抱成团体，才有希望。一九二五年夏末，大连中华工学会“福纺”厂分会成立了，侯立鉴被选为会长。到年末全厂有百分之七十的工人成了工学会会员，形成了一支有组织的斗争力量。

一九二六年春侯立鉴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他入党后，工作更加活跃，与初玉昆一起，于一九二六年四月一日发起成立了“福纺”厂工人补习夜校。夜校请中共大连地委书记杨志云、大连中华工学会的负责人傅景阳、唐宏经、高级三等给工人们讲课。工友们不顾一天的劳累，兴致勃勃地赶到夜校听课。在那里，他们逐步懂得了受剥削、受压迫的根源，懂得了团结起来，反抗斗争，才有出路的革命道理。

一九二六年四月，关东地方当局宣布金票(日币)涨价，每元金票换一元二角小洋(奉洋)。四月二十五日，厂方开饷用小洋，又按金票扣饭费，于是四月份的饭费上涨。发饷的工头又从中剋扣。工人们的微薄工资本已无法糊口，厂方又这样赤裸裸地盘剥，更激起了全厂中国工人的愤怒。他们说：“这样下去，活不成了！”粗纺女工杜秀贞、关桂贞等向厂方提出“仍按小洋收饭费”的合理要求，遭到厂方无理拒绝。当晚，住在宿舍里的女工议论纷纷，直到半夜。四月二十六日早晨，粗纺车间女工都没有上班，别的车间工人也有不上班的，有些工学会会员就想找厂主角野算帐，说：“要剋扣饭钱，咱们就罢工！”

大连中华工学会“福纺”厂分会会长、共产党员侯立鉴和副会长初玉昆，立即将厂里的情况向党组织和工学会领导同志作了汇报。中共大连地委书记杨志云、地委

工运委员兼大连中华工学会会长傅景阳以及唐宏经、高级三、王立功等人经过研究，认为罢工时机已经成熟，决定将部分工人自发的经济斗争与反对虐待、争取工人权利的政治斗争结合起来，因势利导，有组织有计划地进行罢工。并将工人们提出的二十多项条件归纳为六条，作为工人同日本资本家谈判的条件。

这六项条件是：第一，不准打骂和虐待工人；第二，准许孩子妈妈在工间给孩子喂奶；第三，要增加工资三分之一，不许涨饭费；第四，每两周有一个公休日，工休日干活发双倍工资；第五，要缩短劳动时间，每天以十小时为限；第六，对内宿工人要降低房租，不拿电灯费；对外宿工人要发补助金。这六条既包括了保障工人基本生活的经济条件，也有争取人身自由权利的政治条件，使罢工斗争的方向明确，目标集中。

四月二十七日上午八点，工人代表侯立鉴、初玉昆、刘庆枝三人到大帐房找到了日方厂主角野久造，正式提出了工人的六项要求。角野这个侵华军人出身的厂主，蛮横无理地拒绝了工人们提出的条件。愤怒的工人听到这个消息，再也按捺不住心中的怒火。上午十点半钟，侯立鉴看到全厂工人斗争情绪高涨，于是下令让电工刘庆枝拉下全厂总电门，又叫锅炉工夏重山拉响了汽笛。工友们伴随着怒吼的汽笛声，象汹涌的浪潮奔向工厂的大门。门警从未见过工人这种声势，把住大门，如临大

敌。一方是奋起冲门的工人，一方是持棍堵门的门警，双方僵持起来。这时，角野气急败坏地窜到大门口，声嘶力竭地喊：“中国苦力大大的有，走一百，来一千，谁不干就‘开路’，叫他们走，三天不干，‘米稀米稀’（吃饭）的没有，就得统统回来干活计。”决心罢工到底的工人们坚定地回答：“不答应罢工条件，就是三个月，三年，我们也不回来！”这支怒不可遏的罢工队伍，浩浩荡荡地涌出了大门，开始了在我地下党直接领导下的“四·二七”大罢工。

坚持罢工一百天的经过

一、粉碎敌人的欺骗宣传

四月二十七日下午，被选为全厂罢工总指挥的侯立鉴，在厂北门外的采石场召开了罢工工人大会，成立了纠察队、宣传队和救济队，并宣布了罢工纪律：不接到工学会的通知，谁也不准擅自复工。同时对于一时回不去家的童工和生活困难的工人，都做了妥善安排。有的干零活，有的做短工。并把家远的罢工工人都安置到工厂附近的周家屯、薛家屯、王家屯等地的农民的家中。当天晚上，侯立鉴再次向地下党组织和大连中华工学会作了汇报。杨志云、傅景阳、唐宏经等领导同志对“福纺”

分会的安排很满意，并针对可能出现的各种破坏罢工的活动，研究了对策。大连地委和工学会还从活动经费中拿出一笔钱交给了侯立鉴，先解决罢工工友生活的燃眉之急。

“福纺”厂角野久造一伙，看到工人罢工有来头，就勾结殖民当局和日本工业会、各区村协和会，雇佣流氓、工头，四处进行欺骗宣传。胡说什么“‘福纺’工人工钱本不少，食宿皆优”，工人罢工是“贪得无厌”，“部分工人过于懒惰，经常怠工，破坏厂规，聚众闹事，扰乱社会治安”等等，并要各界人士“不要妄听‘福纺’少数捣乱者的谬说”。妄图通过欺骗宣传，达到破坏罢工、孤立罢工工人的罪恶目的。

对于敌人这种欺骗宣传，“福纺”厂罢工委员会按照党组织和工学会的要求，发动罢工工人，就工人们奴隶般的生活状况纷纷控诉，到处宣传。杜秀贞、李成章、崔仁山、周亚贞等工学会骨干，借去普兰店、金州、旅顺等地送童工回家之际，讲“福纺”厂工人的苦难生活。回到家里的童工、女工和他们的家属，也纷纷诉说日本资本家压迫中国工人的罪恶。

为了进一步揭露敌人的破坏阴谋，驳斥对工人罢工的污蔑，中共大连地委很快决定，以大连中华工学会的名义，在大连有名的“泰华楼”饭店举行了记者招待会。这次招待会得到了《泰东日报》、《满洲报》、《关东报》

等中文报馆的许多富有爱国心的编辑、记者的支持。傅景阳主持招待会，并在会上介绍“福纺”厂罢工的起因、经过，讲明罢工真相，争取全市各界人民的支持。会上，“福纺”厂女工杜秀贞、关桂贞、王姜氏控诉了日本资本家残酷虐待中国工人的罪行，使与会的新闻界人士愤愤不平。

四月三十日，大连各报纷纷发表了“福纺”厂工潮的消息。那天的《泰东日报》以《周水子福纺纱厂大罢工》为题，发表了长篇调查报告，详尽地报道了“福纺”厂罢工的真相。文中谴责“工厂当局皆抱资本主义，专以巧取工人之膏血为能事”，说该厂工人生活“比之农民生活，精神上之痛苦，健康上之损失，恶劣得多”。同日，《关东报》也在二版发表消息，一针见血地指出：“福纺此次罢工表面虽因食费问题，其实则为不然，闻系因内部专横，已至极点，其专务取缔役（常务董事）角野久造，视工人为草芥，故皆恨入骨髓，结果如斯爆发”。

“福纺”厂工人大罢工，很快成为大连新闻界的头号新闻，使日本殖民当局为之震惊。角野等人压榨中国工人的专横行为，激起大连工人的义愤，各界人士群起而鸣不平。就连日本工人和有的警察也产生了同情心。报上接连发表文章透露：“日本工人对此罢工非仅不表反对，反而暗中雀跃。”“警察方面，闻工厂平日之行为，对于工人亦殊抱同情。”

五月一日，大连中华工学会又发表了《福纺纱厂一千二百名工人泣告各界同胞书》，分送各群众团体，明确告诉全市同胞：“在棉絮纷飞、满室烟雾的场所，每日劳动时间不下十二小时，遭殴打而头破血流、鼻青脸肿已成家常便饭，每月工资仅七元五角，而伙食费六元（过去为五元），扣除伙食费后何以为生?!”大连中华青年会、印刷职工联合会和店员协会等接到有关“福纺”厂罢工的宣传品后，立即派人深入工厂、乡村、商店，进行了广泛的宣传。

一时间，街谈巷议，社会舆论，人们都在同情和支持“福纺”厂工人的罢工。大连地下党组织和工学会在舆论上以压倒敌人的优势，使日本殖民当局和资本家的欺骗宣传迅速破产。

二、挫败厂方招收新工人的阴谋

大连警察署见“福纺”厂工潮的事态不断扩大，便催促角野速了此案，并派警察进驻“福纺”厂为其撑腰。与此同时，厂方出钱收买汉奸，雇佣工头，并企图用招收新工人的办法破坏罢工。

角野密令人事系主任（股长）新井谦雄，携带礼品去泡崖屯，拜访周水子区会会长王致慎，让王下令所辖各屯会长，为“福纺”厂招收新工人。王致慎满口答应，并立即向各屯长发出招工函件。

接着，角野又令人在厂区附近及各要道口贴出告示，宣称：“不承认罢工者之要求，本社不日即可开工，各工人若不及早请求复工，即目为已退社者。此后若妨碍本厂招募工人，或威胁上工者，依法处罚”。一些工头到处放风：厂方告示贴出来了，谁复工好吃好喝，不复工的一律开除。

在工厂资本家和汉奸的策划之下，“福纺”厂工头李伯仁、张吉恒、韩恒庆、金立敬等，便采取利诱、恐吓等手段，诱骗工人复工，并要给予立即复工者先发一月工钱，想借此瓦解罢工队伍。

对于王致慎之流的丑恶嘴脸，大连地下党组织，立即向各报予以揭露。《满洲报》一九二六年五月十三日载文谴责“王致慎为少许之津贴，维持日本资本家的利益，恫吓工人”。和王致慎同住一地的小野田洋灰厂工学会会长陈德祥，发动工人抵制王致慎的破坏活动，使这个汉奸的伎俩难以施展，在各屯均未招到工人。

五月十五日，日本大阪福岛纺绩株式会社取缔役胜木宗太郎，赶来大连，想以微薄的利益为诱饵，涣散工人的斗志。他答应每天每人工资“可提高三分五厘”，但又威胁说：“会社方面把这作为最后意见，职工方面如不接受时，坚决解雇，重新招收新工人。”

中共大连地委和大连中华工学会及时戳穿敌人的鬼花招，组织发动各群团组织，分赴各乡，进行反招工。

福纺厂工人纠察队严守路口，南到侯家沟，北到三道沟子，东起黄海边，西至周水子火车站，严密封锁工头进去招人。

角野一伙不甘心失败，又出高价收买招工头。初时工头招一名新工人给一元金票，后提高到两元，甚至五元。近村招不到人，有的工头便赴远乡招人。

五月二十一日清晨，“福纺”厂突然响起一连三遍的汽笛声，又传出了“工厂开车，工人复工”的消息。这是怎么回事？工厂门口很快就聚集了很多人。工厂人事系主任新井，拿着帐簿站在门口宣布：“谁进厂干活，就立即补发五月份工资。”这时，早已了解真相的罢工女纠察队员王姜氏和李淑云来了，她俩悄悄地向大家说明，机器开动是角野搞的假复工，并嘱咐大家：“没有工学会的话，谁也不能上工。”工人们一哄而散，有回家的，也有上分会补习夜校的，使厂主的诡计又落了空。

中午，埋伏在厂里管宿舍杂务的年近六旬的傅国琛，向罢工委员会报了信。原来这几天，李伯仁、张吉恒、金立敬等汉奸、工头，到金州、瓦房店、旅顺等地招进一百多名新工人。工人们知道情况后，无不咬牙痛恨，便设法严惩招工头。

五月二十五日，工人王业建带领几名纠察队员，在小野田洋灰厂工学会会员的配合下，痛打了招工工头金立敬。金跪下求饶，发誓不再干了。

在这前后，傅永仁、汪子鑫带领纠察队员，埋伏在王家屯，堵回了张吉恒招收的二十多名新工人，并狠狠地“教训”了这个工头。

“福纺”厂工人纠察队，严惩招工工头之后，许多工头不敢招工了。有的人，慑于罢工工人的威力，不但不敢招工，还为罢工工人通风报信。后来，敌人不得不采用武装警察押车的办法，到乡下强行招工。地下党组织和工学会又派人四处宣传，乡民都不报名，使敌人又扑了空。

对新招进厂里的工人，老工人傅国琛和纠察队员管云贵，相继从下水道把他们领出去一部分。还有一部分没走，傅永仁就扎了个纸人，夜间在宿舍门口晃了几次，于是“福纺”厂闹鬼的奇闻便传开了。新招来的工人又吓跑了一些。

尽管厂主一伙诡计多端，费尽心机招收新工人，但大连地下党组织和工学会发动群众针锋相对，几经较量，又粉碎了厂方招工的阴谋，稳定了罢工队伍的斗志，使角野一伙陷于了困境。

三、坚决顶住敌人的疯狂镇压

日本殖民当局，看到“福纺”厂的罢工不仅仅是经济斗争，已经是个“反帝色彩甚浓”的政治斗争，影响已经远远超过了一个工厂的范围。于是，他们准备采取全面

镇压的手段，企图扼杀工人的罢工斗争。

《满洲报》于六月五日发表了题为《决定行使警察权》的消息，说：“关于周水子福纺纱厂工潮，为谋善后办法，大连民政署藤井地方课长，于三日赴旅顺谒关东长官报告工潮经过，请示善后办法。归连后，于四日午前十时，在日本民政署长办公室，门野纱专务、水野大连警察署长，召至与田中署长、藤井课长四人秘密协议，因罢工工人威胁新招之百五十五名职工，并阻碍工厂续招工人，而百五十五名工人因受其压迫而停工，以此事殊宽容，稳变之行政办法，终难防止罢工工人之举动，因决此后由水野署长行使警察权。”

角野久造一伙，在警察署、民政署的支持下，再次贴出布告：“宣布罢工男女职工，全部免职，尔来与工厂无关系，不得阻碍工厂续招工人”。大连警察署长增派警察驻守“福纺”厂，借故捉人，封锁周家屯与外界的联系。

在罢工开始时，因同厂主谈判遭到诱捕的侯立鉴，在狱中三十多天，不怕敌人施行的灌凉水、压杠子、坐老虎凳、用香火烧腋窝等酷刑，表现了共产党员压倒一切敌人而绝不被敌人所压服的大无畏精神。他在党组织和群众的营救下出狱后，带着重伤坚持在斗争第一线领导罢工。敌人看硬的不行，就于六月十八日夜，派屯长阎兴礼携带三百元金票，去夏重山家收买侯立鉴，遭到

侯的严词拒绝。十九日晚，警署再次逮捕了他。侯立鉴上囚车时，工人傅德财在场，侯把仅有的五元钱交给了傅德财，要傅给工人纠察队员买鞋穿。

六月二十二日，罢工骨干分子夏重山、孟兆德、管云贵、刘庆山等人也遭到逮捕。警察还封了夜校，摘了牌子。但被捕的同志个个都是硬汉子，在狱中坚持同敌人作斗争。

侯立鉴等人在同敌人斗争中的表现，给罢工工人以很大教育。傅德财的三儿子有病等钱医治，可是直到孩子病死，他都没有动侯立鉴给他的那五块钱。而是按侯的嘱咐用钱买了几双鞋，送给纠察队员傅永仁等人，还坚持为纠察队跑交通。

中共大连地委和大连中华工学会，为粉碎敌人的封锁，加强对“福纺”厂罢工的领导，在西岗开了个“人和堂”药店，作为地委的联络站，并派王长全做交通员，和罢工工人及各厂保持密切的联系。唐宏经、高级三、王立功、辛培源、金永绪等人，轮流去“福纺”厂值班。唐宏经还领人撕掉夜校封条，重新挂上夜校的牌子。

六月二十三日晚，傅景阳主持召开了紧急会议，和唐宏经、高级三等人一起，研究决定于六月二十四日召开声援“福纺”厂工人大会，在关键时刻为罢工工人撑腰，把用工人捐款买的粮食和日用品送给罢工工人。

六月二十四日，在“福纺”厂北门外的大场院，工学

会召开了声援大会，二十多辆马车满载着粮食和其它物品也赶到会场。市内十三家工厂的工人，云集到这里参加了大会。傅景阳在会上讲了话，他赞扬“福纺”厂工人不屈不挠的斗争精神，并表示总会和各厂工人坚决支持“福纺”厂工人斗争到底。会场上响起了“打倒帝国主义！”“打倒汉奸走狗！”“坚决支持‘福纺’厂工人大罢工！”等口号。夏尊刚、刘世永等村民给工人烧了绿豆汤，附近各村的农民也来参加了大会，会场足有三千多人。

会后，举行了游行示威。雄壮的队伍高呼口号：“起来起来，齐心协力，巩固我团体，努力奋斗，最后胜利定是我们的。”《工人团结歌》的响亮歌声一浪高过一浪。

一些新招的工人，借机逃出工厂，也加入了罢工游行队伍。声援大会，增强了全市工人的斗志，坚定了“福纺”厂工人罢工的决心。

声援大会的当晚，大连民政署长田中千吉，就把傅景阳传去，进行威胁，要他下复工令。傅景阳坚决不答应。从第二天起，警察署就以“胁迫嫌疑罪”、“业务妨害罪”、“伤害教唆罪”等莫须有的罪名，连续将傅景阳等十九人逮捕。

六月二十六日，日本殖民当局的警察头目密谋了三个多小时。六月二十八日，又以参加“福纺”厂罢工为由，逮捕了七人。大连地区笼罩在白色恐怖之中。

傅景阳被捕后，警察对他施以惨无人道的拷打，人

气绝后又喷以冷水。傅景阳坚贞不屈，始终没有暴露自己和同志们的政治身份。他还想方设法与党组织取得联系，利用组织上派人给狱中同志送饭的机会，传递纸条，鼓励一同被捕的同志坚持斗争。在敌人审讯时，他和同志们严词斥责警察署，申明工人罢工无罪，愤怒抗议日本殖民当局的政治迫害。

帝国主义的残酷镇压，激起了全市人民的愤恨，群起支持罢工工人。为适应斗争的需要，对地委组织进行了调整。傅景阳被捕后，唐宏经任工运委员，其他被捕领导人员的工作，都及时安排人接替了。党组织和工学会对罢工的领导没有削弱。为了进一步唤起民众坚持斗争，大连地委和工学会又组织人起草文件，发表了《福纺罢工工友致大连全体工友书》、《福纺罢工工友泣告周水子农村父老书》。进一步组织全市人民声援“福纺”厂工人，捐款支持罢工工友。大连各工厂工人、大连码头工人、大连油业工人，六月二十九日，联合发表了《大连各工厂工人致福纺罢工工友书》，使“福纺”厂罢工工人受到很大鼓舞。

在罢工艰苦的时刻，中共北方区委负责人李大钊同志，曾先后派张炽、邓鹤皋、尹才一、张式媛（安娥）来大连加强地委工作，领导好“福纺”厂工人大罢工。北方区委的领导同志还为这场罢工制定了“适可而止”的策略，提出要在资本家基本答应条件的前提下，寻找复工

机会，争取胜利。邓鹤皋、张炽等领导同志多次深入“福纺”厂，和崔仁山等基层骨干分析形势，研究对策，传达北方区委的指示，并要崔仁山等注意厂方动向和工人情绪，对坚持罢工斗争做了妥善的安排。

在大连地委和工学会的周密组织下，各界掀起了援助“福纺”厂工人的新高潮。日本当局不准磨房为罢工工人磨面，农民周振盛等就在夜里给磨；警察追捕工人纠察队员，市民周文和把陈启德藏在闺女房中脱险；刘世永饭铺，为无钱工人提供食品；赶大车的农民老战，主动去工学会送信。在全市工人、农民和各界人士的奋力支持下，有力地顶住了敌人的高压政策，使罢工斗争坚持下来。

四、全国工人阶级的有力支援

“福纺”厂的工人罢工，自始至终得到全国工人阶级和各界人士的政治支持和经济援助。“福纺”厂工人罢工以后，大连党组织和大连中华工学会先后派林升亭、王立功、辛培源去上海、广州等地，争取全国的支援。

七月十日，“福纺”厂罢工代表林升亭（即林建民）到了上海。上海报纸以《大连纱厂工人代表来沪，向各方报告工潮》为题，介绍了“福纺”厂罢工的经过，赴沪代表除了通过新闻舆论界，控诉日本帝国主义在大连的种种罪行外，还向上海学生联合会、全国学生总会、国民党

上海市党部、上海总商会、商联合会等团体报告“福纺”厂罢工情形，请求各界做实力后盾。

大连工人阶级与全国各地的工人阶级有着互相支援的光荣传统。一九二五年爆发的上海“五卅”运动和广东的省港大罢工，曾经极大地鼓舞了大连工人阶级的斗争精神。“五卅”惨案发生后，大连人民不顾日本殖民当局的阻挠，集中了一万一千多元银洋，分批寄到上海总工会。现在大连工人阶级遭受日本帝国主义的残酷迫害，上海工人阶级也给予了有力的支援。上海总工会向全国各工会、各团体分发檄文，介绍大连、汉口两地日商纱厂工人罢工经过之后指出：“本会获悉此种实情，不胜愤慨。情况紧急，我们要奋然起来斗争。我们也呼吁，全国同胞们起来，团结一致，为国家争取权力，为解救苦难同胞而掀起正义的斗争！”天津总工会率先响应，发表宣言，声援罢工，庄严指出：“大连是中国的领土，却在那里发生了日本帝国主义者的残暴行为，这是全体中国国民的耻辱。如今，在大连的排日运动正在勃兴之中，我们中国人都参加这一运动，对日本开始进行全面袭击吧！我们的运动若能坚持下去，那么，最后驱逐日本在满洲的势力也不是不可能的事。”对大连的工人阶级寄予很大希望，对大连的日本殖民当局给予严厉的抨击。

与此同时，中华全国铁路总工会除通电全日本工人及一切被压迫民众及全中国民众吁请援助外，特致电我

大连工友及大连各阶级的华人，对日本帝国主义非法拘捕全国铁路总工会执行委员傅景阳及大连各产业工会领导人，表示了无比的愤慨，对大连工人阶级给予坚决有力的支持，并高度评价了大连工人阶级的英勇斗争：“你们已经站在反日本帝国主义的第一道战线上了，每个大连的中国人都应该是最勇敢的反日本帝国主义的战士。”“大连香港南北遥峙，这两块土地都是帝国主义压迫中国的根据地，大连被日本占有，香港被英国占有，帝国主义供给反动军阀的一切残害中国人的凶器，多是由这两个海口运输进来的，香港的作用已经被中国工人阶级打掉了，大连现在正在努力啦。”这就将大连工人的斗争提到一个新的高度，极大地鼓舞了坚持罢工斗争的工人。

为了有效地粉碎大连的日本统治当局镇压罢工工人的阴谋，中华全国铁路总工会以十五万铁路工人的名义致信全日本工人及各阶级被压迫者，把大连工人斗争的信息传到日本本土，争取日本工人和人民对大连“福纺”厂罢工斗争的支持。信中字字情，句句理，深切感人：“日本与中国的无产阶级，本是一个母亲生下来的兄弟，日本无产阶级的剧痛伤痕，就是中国无产阶级的剧痛伤痕，中国无产阶级此刻深盼日本无产阶级及各阶级被压迫民众能群起响应我们这个含血带泪的呼声，作一次轰轰烈烈援助大连华工的运动，直接与日本帝国主义以致

命的打击。”这一期间，日本《朝日新闻》、《日日新闻》等不少报刊纷纷载文，报道大连“福纺”厂罢工的情形，无疑是对日本统治阶级的一个有力的打击。

广州，当时是革命的中心。“福纺”厂罢工代表经上海又赴广州，向全国总工会的领导人苏兆征、邓中夏、刘少奇同志作了汇报。他们立即决定以全总的名义，致电大连关东州厅与日本驻广州沙面领事，提出强烈抗议和严正警告。中华全国总工会在七月三十日的通告中指出：“昨该处工会特派员到省与全国总工会商量援救，全国总工会以日人欺侮中国人太甚，已决定向该地官厅提出抗议，如不圆满答复，即举国抵制日货。”

同一天，中华全国总工会致电大连关东州厅，强烈要求日方：“圆满答复工人的要求，否则通告全国一律抵制日货，并停止日本进口轮船一切工作”。在致沙面日本领事函中，中华全国总工会又代表全国工人大声疾呼：“望贵领事即日电告贵国政府，严令大连日本官厅，将被捕之工人即日释放，并圆满答复工人要求，否则本会即将通令全国工人，以对付香港英帝国主义者之手段对付贵国，所有日本进口轮船将停止一切工作。”

香港金属业总工会也在八月六日发表宣告，指出：“‘五卅’事件，日实为首凶，今又无端摧残华工，于此至极，倘不反抗将无噍类，应请我全国人民起而严重对付，实行抵制日货，以促日本帝国主义之觉悟。”

林升亭在广州期间，为争取国内外被压迫者的支持，在广州机场飞行员谢文达（曾到过大连增智学校同林相识）的帮助下，起草了一份日文传单《致日本工人阶级书》。后经邓中夏同志改写为《中华全国总工会为大连案致日本无产阶级书》，发表在《工人之路》上，鲜明地提出了中日无产阶级联合起来，反对共同的敌人日本帝国主义的主张。

就在林升亭去广州之后，王立功、辛培源也到了上海，向党中央作了罢工情况的汇报，为直接取得全国总工会和广州国民政府的支持创造了条件。

中华全国总工会还多次致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要求行之有效地支援大连罢工工人。在八月六日的函中指出：“现据大连福纺纱厂罢工委员会林建民君面陈，大连日本官厅及资本家压迫工人，苦状甚为详确。”“全国同胞倘不继续奋斗，收回大连，实不能救大连之被难同胞，亦即无以自救。”“望即速向日本政府提出严重抗议。并设法慨捐二千五百元，以营救大连被难失业同胞。”全国总工会还致函广东济难会：“除将被捕工人已经查明之姓名抄送贵会设法营救外，并需妥筹巨款救济被捕者家属及失业工人。”

在国民党中央党部召开的第四十八次常务会议上，工人部长报告了接洽大连罢工代表的情形。会议根据中华全国总工会的再三要求，通过决议，让国民政府捐款

二千五百元，援助大连罢工工友。

中华全国总工会的声明、函电，代表着全中国工人阶级的声音。他们所要对付的决不仅仅是一个“福纺”厂的工人和大连的工人，而是全中国整个工人阶级大军，而这支大军是不可战胜的。日本当局尽管扬言：“驻广州日本总领事拟待真相得明，即向粤政府抗议”。但面对全中国声援大连“福纺”厂罢工的浪潮，已不得不考虑事态发展的严重性，不得不考虑尽快结束工人罢工的办法。

而大连“福纺”厂罢工工人和全市人民却从全国各地的声援中，更加认识到自己并不孤立，虽身处日本殖民统治之下，仍在祖国怀抱之中，有强大的后盾。从而大大增强了坚持斗争的勇气和不达罢工目的决不罢休的胜利信心。

五、罢工斗争取得了胜利

持续三个多月的罢工，经过分化与反分化、招工与反招工、镇压与反镇压的激烈斗争，特别是在中华全国总工会宣布将要在全国抵制日货，以对付香港英帝国主义之手段对付日本帝国主义，使日本殖民当局和日本财团十分惶恐。七月下旬，日本福岛纺绩株式会社社长八代裕太郎急忙从东京乘船赶到大连，先会见了关东州厅长官，又察看了停产的“福纺”厂，接着就向记者发表谈话，说：“工人之要求则必一一审度。苟有应改善者，渐

次必予改善，以求圆满之解决。”

随后，日方又经过谋划，花钱委托周家屯屯长阎兴礼找工学会“福纺”厂分会罢工工人代表崔仁山谈判。阎告诉崔仁山说：“厂方答应了工人们提出的条件，还撤了角野的厂长职务。只是厂方强硬要罢工工人脱离工学会组织，还要裁减罢工工人。”崔仁山理直气壮地说：“参加工学会是我们的权利，裁减工人我们不答应，警察署还得放出被捉的工人。”关于释放被捕工人问题，阎又说新厂主告诉他这是衙门的事，工厂不管；关于革工人职的事，说厂方有权处理。崔仁山把阎兴礼打发走了后，立即把谈判的情况向总会作了汇报。大连中华工学会副委员长唐宏经把这个情况向中共大连地委作了报告。

大连地委书记邓鹤皋连夜召开会议，讨论复工问题。开始有人坚持待被捕工人释放后才能复工，否则不算罢工获得全胜。邓鹤皋同志根据北方区委的指示精神，具体分析了全国形势和大连的状况。他说，目前党的力量主要在关内，工人运动的主要矛头针对英帝国主义。大连党的力量刚刚发展起来，日本帝国主义势力相当雄厚。在这种情况下，只要日方答应了工人的基本要求，罢工斗争就应适可而止。不然，硬要坚持下去，工人队伍会遭到损失，群众斗争的信心会受到挫伤。他进一步指出：日本当局捉人，目的是逼工人复工，工人复工了，工人代表出狱的问题就好办了，党组织继续想办法解决。至

于他们出狱后工厂不给复职，工作我们可以另找。斗争要讲究策略。在目前情况下厂方让了步，我们就给他一个台阶下。这就叫“适可而止”。只要厂方真的答应了工人罢工时提出的条件，罢工斗争就获得了胜利。经过讨论，统一了思想，中共大连地委就做出了复工的决定。

八月三日晚上，邓鹤皋、张式媛又来到崔仁山家，祝贺罢工取得了胜利。又对工人们说：“罢工胜利了，是大家团结奋斗的结果，今后更要紧紧抱住团，千万莫懈怠。只要斗争下去，才能巩固胜利。”

一九二六年八月四日，在阎兴礼的大院召开了复工大会。会上，唐宏经和崔仁山根据邓鹤皋在地委会上的讲话精神，又向工人讲了话。地委工运委员唐宏经代表大连中华工学会宣布了复工命令。八月五日，大连“福纺”厂工人就陆续上班了。这场罢工斗争整整坚持了一百天，获得了胜利。当时在全国很有影响的《工人之路》第432期上，以《大连纱厂工人罢工胜利，全国民众声援之力》为题报道说：“昨七日中华全国总工会接来密报，知大连纱厂风潮已完全解决，每人每日增加工资一毫以上，赔偿罢工工人损失，每月两个星期放假一天有工资，午饭时间加增十五分钟，不准裁人，工厂为工人设立教育娱乐机关。工人方面已宣布复工。民众一致声援之下，日资本家亦自然有所惮也。”

这场罢工斗争的主要经验及其影响

大连从一九〇五年沦为日本殖民地，在其军事、政治和经济的长期统治下，这个地区一直没有发生大的工潮。日本当局自喻为“安静的关东州”，是块“无风地带”。可是这个地区的中华儿女不甘心做亡国奴，和全国人民心相连。“四·二七”大罢工，就是不愿做奴隶的大连工人，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在全国人民的大力支援下，在这个所谓“无风地带”掀起的反帝怒潮。它是中国人民同日本殖民主义矛盾的一次大爆发，是大连工人阶级新觉醒的标志，也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反帝力量空前壮大的标志之一。

大连“福纺”厂这次大罢工获得胜利的主要经验有三点：

第一，中国共产党自始至终担负起了领导罢工的责任。中共北方区委和大连地下党组织根据当时日本殖民地的环境和条件，及时地制定了正确的指导思想和方针政策，在斗争中注意掌握灵活的斗争策略。罢工一开始，地委就因势利导，把群众自发的经济斗争，引导到反奴役、争自由、争人权的自觉的政治斗争轨道。罢工中间，敌人用欺骗宣传、招收新工人、施展高压政策等手段破坏罢工，党组织就针锋相对，采取有力的措施，粉碎敌

人的进攻。当斗争最艰难的时候，北方区委连续派干部加强大连地委的领导。地委的领导干部废寝忘食，深入斗争第一线，审时度势，调查研究，掌握敌人的动向，鼓舞工人的斗志。最后，发现敌人有让步的趋向，地委就按照北方区委的指示精神，正确分析和估量敌我双方的力量，当机立断，适可而止，渡过困难，夺取了胜利。

第二，把党的秘密工作和工学会公开的群众工作紧密结合起来，充分依靠工人，农民，广泛争取各阶层爱国人士的同情和支持，使罢工斗争有坚实的群众基础。特别是得到了全国工人阶级的有力支援，使大连工人的斗争同全国人民的反帝爱国斗争结成一体，造成了强大的群众斗争声势，使敌人望而生畏。这是这场罢工斗争取得胜利的重要原因。过去日本殖民当局总认为，大连以至满洲的罢工问题和中国内地的罢工问题之间没有联系，是各自孤立的问题，比较容易解决。而“福纺”厂工人这次罢工，党组织和工学会通过广泛的宣传工作和细致的组织工作，不仅把郊区的农民动员起来，援助罢工工人，显示了工农联盟的巨大力量，而且还注意争取同新闻界爱国知识分子的合作，造成强大的舆论力量；不但从各方面做好本地区的工作，还放眼全国，派代表去上海、广州向党中央、全国总工会和关内同胞汇报大连工人的苦难遭遇和斗争要求，很快出现了全国声援的振奋人心的局面。这就把大连工人的反帝怒潮同全国人民

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洪流汇合在一起，旗帜鲜明，势不可挡。“福纺”厂工人的罢工斗争，已成为中国广大工人当中发生的一起大事件。日本殖民当局看到大连工人已不是孤军作战，有全国人民的支援，深怕处理不好，大连也会变成香港那样的“死港”。因此才向罢工工人退让。

第三，罢工队伍内部紧密团结，同心协力，有一批坚强得力的好带头人。日本帝国主义霸占大连之后，便把它作为侵华基地，已苦心经营了二十年。这里特务密布，警察横行，敌人统治很严。面对这种情况，罢工队伍内部加强组织纪律性教育，用爱国主义精神统一思想，统一行动，强调服从统一指挥。罢工工人如同兄弟姐妹，相依为命，忧乐与共，使敌人分裂罢工队伍的阴谋无法得逞。共产党员、工学会的领导骨干以及积极分子在罢工斗争中打头阵，充分发挥模范带头作用。哪里最艰苦，他们就在哪里为群众排忧解难；哪里最危险，他们就在哪里同敌人作坚决的斗争。有的被捕受酷刑，更是大义凛然，坚贞不屈，群众十分佩服。当时大连地区的党员只有几十个人，“福纺”厂的党员只有侯立鉴一人，但他们把人民的利益看得高于一切，成了广大群众知心的、可靠的带头人，成千上万的群众自愿跟着他们一起奋斗。

这场大罢工，在日寇侵华的基地狠狠地打击了日本帝国主义。它宣告大连人民绝不是什么“大日本的顺民”，

而是中华民族不可分割的儿女，是不可欺侮的。经过这场大罢工，在大连的日本资本家有的缩短了工人劳动时间，有的召开“恳谈会”听取中国工人的要求。捕人的日本殖民当局也怕把事情再闹下去，不可收拾，无奈于一九二七年春，将侯立鉴、傅景阳等人全部宣布“无罪释放”。

“福纺”厂大罢工打击了敌人，也训练和壮大了自己的队伍。据不完全统计，从“四·二七”大罢工开始到一九二六年底的八个月时间里，大连和南满地区工人罢工多达二十四起，参加罢工的中国职工达一万二千七百多人。这次罢工还影响到奉天及“满铁”沿线地区。奉天制麻会社和奉天满蒙毛织会社的同盟罢工，均受到“福纺”厂罢工的影响。这次罢工使地下党的威望进一步提高了，使工会骨干分子认识到，只有共产党的领导，斗争才有方向。罢工前后，大连中华工学会会员由两千名增加到四千名；大连的中共党员由罢工前的十五人增加到二百人；大连党组织从六个支部发展到二十三个支部，培养和锻炼出一批党和工会的骨干，其中一些人后来成为大连党组织和满洲省委的领导成员。当时日本的永野贺诚在《满洲劳工运动展望》里也承认：“在工学会指导下同福岛纺绩会社进行公开的对抗，或是暴动，或是示威运动，其纠纷重重的程度，实为满洲空前的大罢工。”

大连“福纺”厂的“四·二七”大罢工发生在省港大罢

工的过程中。一在祖国的南方，一在祖国的北方，两场大罢工南北呼应，互相鼓舞，反对英、日帝国主义的爱国斗争气势磅礴，有力地促进了反帝反封建反军阀的民主革命运动，在我国工人运动史上谱写了光辉灿烂的一页。

怀念黄道同志

方志敏

一九八二年七月，在北京中南海内，胡耀邦同志接见我们江西的几位同志时，曾谈到过黄道同志。在这以前，我正在收集黄道同志从事革命斗争事迹的资料，准备写篇文章纪念他。胡耀邦同志接见时的谈话，使我撰写这篇文章的心情更加迫切了。

方志敏、邵式平、黄道——这是赣东北根据地的三位主要创建者与领导者。

黄道生于一九〇〇年，与邵式平同年。早在一九一九年的下半年，在“五四”运动的影响和推动下，他在南昌读书时，就和袁玉冰等一道发起和组织了江西最早的进步社会团体——“鄱阳湖社”。“鄱阳湖社”经过一年多的筹备和规划后，于一九二〇年十二月改名为“江西改造社”。改造社正式建立后，出版了自己的社刊——《新江西》，成为“五四”时期全国有影响的进步社会团体和进步刊物之一。在这个过程中，黄道始终是积极的参与者和组织者之一。

中学毕业后，黄道考入北京师范大学，又与邵式平同学。在北师大，黄道继续领导了“江西改造社北京分社”的活动。在斗争中，他结识了李大钊、陈毅等共产党人，在他们的教育和引导下，他于一九二三年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之后，他参与了北师大党支部的领导工作。

黄道每年暑假都要回到家乡横峰做群众工作，宣传革命道理，传播马列主义。我从方志敏等同志那里早已多次听到过他的名字和他的斗争事迹，可惜一直没有机会见面。直到一九二四年夏天，他和邵式平结束暑假生活路过南昌返校时，才在南昌的中共江西省委机关见到了他。当时，我正在党的这个秘密机关工作。

他个子高大而魁梧，浑身充满青春的活力，微微发胖的身材，显得精力充沛。穿一身当时学生中流行的长褂，既显示出学生的潇洒风度，又保留着农村子弟的朴实无华。一双眼睛虽然不大，但目光却显得格外深邃、坚毅而沉着，高高的鼻子，不知是因为天气热的缘故，还是意味着他的脾气偏急，鼻梁上常常冒着淡淡的一层细汗；而那一双厚厚的嘴唇，给人以特别深刻的印象。

黄道知道我与志敏的关系，大概又从赵醒侗同志那里知道我已经是共产党员了，见面的时候，他叫我有机会碰到志敏时要代他问候，同时，还嘱咐我要好好安心在省委机关工作，保护好机关，精心照顾好赵醒侗同志。

他还勉励我，要多看点书，多学点革命的理论。“今后我们肩上的担子重着呢！”他拍着我的肩膀，认真地对我说。

他匆匆地走了。但是，随着形势的发展他又很快回来了。

那是一九二五年“五卅”运动后，黄道奉组织之命，返回江西开展革命工作，又和邵式平一道回到了南昌。回江西后，黄道积极参与了江西党、团组织领导的“反对帝国主义惨杀上海同胞江西后援会”的活动。当时，适逢学校放暑假，党团组织研究决定：乘学生放假之机，动员学生下乡宣传，将革命思想灌输到基层中去。方志敏、黄道商定回赣东北去，并决定沿途一路进行宣传。于是，我随方志敏、邵式平、黄道，从南昌出发，到了进贤、东乡、余江、贵溪、弋阳、上饶、玉山、乐平、鄱阳等县，将反帝爱国的思想，将马列主义的思想，深入宣传到这些偏僻县份的群众当中去。这一路上，黄道言传身教，给了我不少启迪、教育，使我受益不浅。

暑假很快就结束了，我随着他们愉快地度过了两个月的战斗生活。

黄道回北京后，介绍邵式平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一九二六年的“三·一八”惨案后，他和邵式平都被军阀当局通缉，在北京呆不下去了。于是，奉党的指示，黄道离京南下，回到家乡开展革命活动，发展党的组织。

为了深入发动群众，迎接革命高潮的到来，我在南昌迎接了黄道回省后，很快又欢送他回故乡横峰去了。

早在一九二四年暑假，黄道回到家乡，就邀集了进步青年邹秀峰、吴先民、李穆、钱壁、程伯谦、黄球、黄端喜等人组织了“岑阳学会”，黄道亲自为该会起草了会章，制定了“宣传革命，吸收人才”的宗旨。为了扩大宣传，还出版了《岑阳月刊》。黄道离开横峰到北京后，仍然和该会保持密切的联系，他和在家乡的会员之间，书信往来频繁，交流对时局的看法，研究对敌斗争的策略，鼓舞革命斗志和信心。

这一次黄道回横峰后，吸收了经过斗争考验的“岑阳学会”会员邹秀峰、吴先民、钱壁、李穆、黄端喜、程伯谦等同志入党，组建起横峰第一个党支部。在党的领导下，横峰县的农民运动、学生运动、工人运动，蓬蓬勃勃地开展起来了。

一九二六年秋，北伐战争取得很大胜利。北伐军挥师北上，势如破竹，进入江西后，给江西的革命运动以极大的推动。黄道根据党的指示，通过国民党横峰县党部，领导农民协会，赶走了反动县长，游斗了横峰大地主邹寿先，使横峰县的政治局面为之一新。此时，适逢省委特派员邵式平在横峰，他便以国民党江西省党部及省农民协会特派员的公开身分，组织了横峰县政务委员会，委任邹秀峰为县长，吴先民为公安局长。这样，横

峰县的政权掌握在共产党和革命群众手中了。

黄道在横峰及江西的革命活动，得到了广大革命群众及国民党左派的赞许，一九二七年一月，在国民党江西省党部召开的第三次代表大会上，他被选为执行委员，并兼任宣传部长。在国民党江西省党部工作期间，黄道为建立、巩固、发展我党在江西的统一战线，作了许多有益的工作。

“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国民党政权“宁汉分家”，在朱培德尚未“礼送共产党出境”及汪精卫的反革命面目未公开暴露之前，黄道奔走于武汉、南昌之间，协助国民党武汉政府改组被右派控制的国民党江西省党部。他不顾个人安危，力图扭转正在迅速恶化的江西时局。但为时不久，朱培德、汪精卫先后公开反共，国民党政府“宁汉合流”。黄道为争取时局好转所作的努力前功尽弃了，他不得不转入地下，参与中共江西省委领导，组织革命群众进行隐蔽的斗争。

一九二七年七月底，黄道还参与了“八一”起义的准备工作。当时，江西省委机关在南昌市杨家厂，我在机关任机要交通员，看见黄道日夜不停地往返于杨家厂、江西大旅社、花园街等地方，为武装起义进行着周密细致的准备工作。他以充沛的精力，高昂的斗志，夜以继日、废寝忘食地工作着。“八一”起义胜利后，黄道出席了各省代表联席会议。会议组织了和国民党反动政权相

对立的全国性的新政权——革命委员会。在起义后的日子里，我看见黄道一天到晚沉浸在胜利的喜悦之中。虽然我们天天见面，但大家都很忙，见面也没有时间多谈话，而那种高兴的心情是难以用语言来表达的。

“八一”起义部队撤出南昌后，形势急剧恶化，黄道和我都奉省委之命，返回赣东北，开展地下的斗争，秘密发动群众、组织群众、建立武装、准备暴动。

“八一”起义前，方志敏同志就被“礼送”离开南昌，到赣西南地区开展农民运动。九月，方志敏听了“八七”会议的传达后，回到弋阳漆工镇故乡。他叫我设法找到在赣东北地区各县坚持斗争的党员负责干部，传达“八七”会议精神，研究赣东北地区如何开展斗争。于是我立即动身前往横峰，我先到了姚家垅黄文中家里。黄文中曾同情过革命，他家里是地主，我住在他那里不引人注目。很快，我又找到了黄球。我的目的是要找黄道，但一直未打听到他的消息。但我知道，他肯定没有走远，就在家乡。一直到第三天，我终于找到了他，原来他就藏在自己家里的楼上。当我把方志敏决定开会的通知告诉他时，他高兴得跳了起来，立即表示同意志敏的决定，并爽快地答应保证到会。

一九二七年十一月二十五日至二十七日，由方志敏主持召开了弋阳、横峰、贵溪、铅山、上饶等县党的负责同志的联席会，这就是赣东北党的历史上有名的窖头

会议。会议上，黄道坚决支持方志敏有关武装起义的正确主张。会议后，方志敏与黄道的工作地点对调——方志敏是弋阳人，去横峰；黄道是横峰人，去弋阳。

我和黄道一同来到弋阳县漆工镇地区发动和组织农民革命团，我在义兴源，他在大溪头。从此，我们俩在一起，在方志敏、邵式平领导下，开始了创建和发展赣东北根据地的艰巨斗争。

弋横暴动胜利和赣东北根据地建立后，黄道是赣东北党的主要负责人之一（是赣东北省委常委），并长期担任省委秘书长、组织部长、宣传部长等职，为赣东北党的壮大和发展，为赣东北根据地的巩固和扩大，作出了极大的贡献。

黄道有着坚定的革命信仰和革命立场。从一九一九年到一九三九年，在二十年的长期奋斗中，他对共产主义的信仰，始终没有动摇过。正因为如此，所以他能保持坚定的革命立场。在创建赣东北根据地的斗争中，无论是顺利的时候还是困难的时候，无论是和同志们共同奋斗的时候，还是他自己孤身苦战的时候，他都坚定地站在正确的立场上，支持方志敏，反对和排除了“左”的、右的路线和思想的破坏、干扰，特别是在方胜峰会议上，他和方志敏、邵式平一道，批判了右倾逃跑思想，坚持开展武装斗争。当革命斗争需要他离开老区，前往贵溪开辟新区时，他置个人安危于度外，毫不犹豫地接受了

任务，并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斗争，很快打开了局面，开辟了新根据地，有力地配合和支持了巩固老区的斗争。

黄道同志长期分管干部工作，他对干部的教育抓得非常紧，经常用马列主义理论教育和提高干部。在赣东北党校，他经常和学校领导一起，制订学习计划，编写教学讲义，讲授理论课程。当时，根据地的广大干部、群众文化水平都很低，特别是根据地刚开辟时，文盲还很多，为了提高根据地军民的文化水平，黄道还主持编写了列宁小学的《工农读物》等课本。黄道很注意做干部的思想工作，他虽然个子高大，脸色严峻，但待人接物却和蔼可亲，同志们都乐意和他接触交谈。他也经常找人谈心，了解干部的思想动向，深入细致地开展思想工作。

黄道在错综复杂的情况下，既顾全大局，服从组织，又坚持原则，维护革命利益，使革命事业免遭损失或少受损失。在当时的斗争，有政治的也有军事的；有经济领域的也有思想领域的；有党内的也有党外的；这些斗争，又往往交织在一起，互相联系，同时进行。在这样错综复杂的斗争中，只有坚强的党的领导，才能使我们战胜任何困难的局面，争取胜利的前途。可是，当时我们的党，还不是一个很成熟的党，在土地革命时期，我们的党犯了许多错误，赣东北党也犯过许多错误。当党内错误路线占统治地位的时候，黄道同志能努力做到既

服从组织，又坚持原则。一九三〇年五月，立三路线的中央，命令赣东北红军“进攻九江”、“截断长江”，赣东北根据地个别负责同志主张根据地不留一枪一弹，全力去攻打九江。黄道与方志敏等同志对此持怀疑态度，但因为是中央指示，他不能公开反对，便提出要留一部分武装力量保卫根据地。当时我代理军委书记职务，黄道反复和我商量，至少要留下一个营的兵力。后来，经过他和方志敏共同力争，终于如数留下了一个营的正规武装，使大部队离开根据地后，敌人进犯根据地时，群众未受到严重损失。方志敏常称赞他考虑问题很细致、周密。黄道与方志敏、邵式平等同志互相配合，互相支持，在赣东北根据地谱写了一曲曲气势磅礴、有声有色的战斗篇章。

黄道有很高的政策水平和策略水平，能准确地运用马列主义的理论，分析形势，观察事物，特别是当远离上级领导或脱离上级领导的时候，他能准确地把握形势，审时度势，制定出与形势发展相适应的革命政策和斗争策略。红军长征以后，黄道领导闽北党和群众，开始了坚持三年游击战争的艰难岁月。当他看到由于日本帝国主义的入侵，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将是中国人民与日本帝国主义的矛盾时，他及时地提出了停止“打土豪分田地”的口号，改变了土地革命时期对地主土豪的作法；他还及时地提出了“改造大刀会”的主张，改变了土地革

命时期消灭大刀会的作法，为革命武装减少了对立面。当“西安事变”发生后，他预感到国共两党将要进行合作，在党中央指示未正式传达之前，他就编写了国共合作、团结抗日的宣传提纲，对军民进行教育。当国共合作的局面已经形成，南方游击队“下山”时，他又警惕地提出了“要把屁股坐在山上”的思想，因而在和国民党代表谈判过程中没有上当，保存了革命的力量。在革命的转折关头，在脱离党中央、上级领导的情况下，黄道能够及时作出政策和策略上的这种改变是很不容易的。这反映了他高度的马列主义水平和高超的革命领导艺术。

黄道参加革命后，一直担负着重要的领导职务，但他在生活上却从不搞特殊化，始终对自己、对子女严格要求。他个头大、身体胖，爬山很困难，但每逢行军打仗，他总是和部队一起行动，保持着旺盛的革命斗志。黄道给友人的信中，曾自我总结说：“在这十年中，我经受过人所未经过的艰难困苦的生活，尝过人所未尝过的咸酸苦辣的味道，但这对于我却是滋滋有味的生活。”这是他一生艰苦奋斗，保持革命乐观主义精神的真实写照。

抗日战争期间，黄道是中共中央东南局负责人之一，主持新四军南昌办事处的工作。一九三九年，正当革命形势向前发展，党和人民需要他为革命作更多的工作，贡献更大力量的时候，他却在铅山县河口镇医院被敌人

暗害了，时年仅三十九岁。

我最后一次见到黄道是一九三四年三月，他由闽赣省委秘书长调往闽北分区任区委书记。行前，我们为他送行。当时，第五次反“围剿”已经日见艰难，革命事业处在明显的危急之中。那时，闽北根据地与建黎泰根据地未完全打通，他又是前去独挡一面、独立作战的。显然，以当时的险恶形势看，黄道此一去，前途莫测，生死未卜。我们彼此心情都很沉重，互相叮嘱保重。没想到，这次分手竟真成了永诀。

半个世纪过去了，历史的长河冲刷了许多往事，但黄道的形象却一直深深地刻在我的脑海之中。岁月的风烟，模糊了许多昔日的回忆，但对黄道的怀念，却一直使我魂系梦牵。一九六〇年，邵式平在《菩萨蛮·横峰县》一词中曾写道：“东风杨柳舞阡陌，大地染透阳春色。旭日照横峰，耸翠万山中。”每当我路过横峰看到那万山丛中的松柏耸翠时，我就想：那其中的一棵，不就是黄道同志吗！……

（原载《赣东北党史通讯》第十一期，本刊略有删节）

叶挺同志在皖南事变中 被扣的经过

郑建英

党史界对于新四军军长叶挺同志在皖南事变中是“被俘”还是“被扣”，说法不一。解放后出版的许多党史著作，在谈到皖南事变的时候，一般都说叶挺军长是“被俘”。一九八〇年十二月出版的《周恩来选集》（上）和一九八一年十二月出版的《刘少奇选集》（上）在有关叶挺同志的注释中，沿用了这一说法。近年来的著作中，有些用“被扣”的提法。《朱德选集》中有关叶挺同志的注释，根据调查研究的结果，采用了“被扣”的说法，注为“一九四一年一月国民党蒋介石发动皖南事变后，被长期扣押”，是比较确切的。

一、“被扣”的提法更符合 当时的实际情况

这个问题，只要认真考察一下叶挺同志是怎样落入

国民党顽军手中的事实，就很清楚了。

当时与叶挺军长在一起的邵宇同志一九八三年二月二十一日回忆：

“这天晚上（一九四一年一月十三日），我们大家都集中在山上的竹林里。党员们开会，会议讨论的中心议题是要不要执行饶漱石的指示，派人去同一〇八师谈判。最后决定，还是执行指示，连夜派一人去同一〇八师联络。叶军长……不愿意去谈判，所以脸色很不好看。”“第二天下午，一〇八师一个营长领着最多一个排的人，来到我们驻地附近（是根据我们派去的人提供的情况找来的）停下。他带着一个随从，都没带枪，走到我们面前向叶军长行了个礼之后说：我们师长派我来请叶军长到师部谈判。叶军长随之下令，要大家把武器全部砸掉。这时，后面枪声响得很厉害，那个营长便对叶军长说：请军长赶快走吧，五十二师来抢人了。我们大家就跟着那个营长来到了一〇八师师部。

“吃晚饭的时候，一〇八师师长（也可能是参谋长）陪叶军长吃饭，问叶军长还有什么要谈的没有？叶军长说：‘我是打了败仗的，没有什么好谈，要谈找蒋介石谈。’……

“第二天，五十二师就派人把叶军长带走了，或许是蒋介石命令让带走的。

“根据这个情况，我认为对叶军长用‘被扣’或‘被捕’

比较合适，不能用‘被俘’。因为要谈判是饶漱石代表党组织作出的决定，并且要叶军长去执行的；同时，一〇八师也派人来请他去谈判，这与其他人在战斗中被俘或在后来敌人搜捕时被俘是不一样的。”

叶钦和在《回忆叶挺》文中说：

“十三日……我们撤到石井坑后，……在坐的有叶军长、梁朴（即饶漱石）、李一氓、张元寿（参谋处长）、钱俊瑞、余立金、王聿先等几个高级干部，大家在议论如何突围的问题。……梁朴向叶挺同志说：‘你是否可以到三战区与顾祝同谈判，让在山上的我军指战员能下山回到苏北新四军？’叶挺同志回答说：‘我们现在是败军之将，身无一卒，根本没有条件。我是坚决不能去的。大革命失败后，我离开党已经十年，这是一个惨痛的教训，我是深刻记取的！’梁朴又说：‘不是你自己要去的，是党派你去的。我自应向党中央报告，在坐的同志中只要有一位能冲出去回到部队，都可以向党中央报告，证明是党派你去的。’叶挺同志听说后没有开口，过了很久，说：‘如果是党决定派我去，我就服从’。后来叶军长派了二个参谋下去与敌军联系，一个是温巨潮同志，另一个是游生贵同志。他们下山后即被敌军扣留。后来王聿先、我、叶天流、叶福如、黄炳生、徐冬梅（女）、另外还有两个警卫员（姓名记不清了）和副官秘书吴振邦等十多人，随叶军长下山，后来均被扣。”

以上两个人的回忆虽然由于时隔数十年，在细节上有所出入，但事情的主要方面，他们的说法是一致的，即叶军长是按照当时中共中央东南局副书记饶漱石的意见，前去同国民党顽军谈判、交涉，而被对方扣押的。

他们两人的回忆与叶挺一九四三年六月二十五日同《新华日报》记者陆诒的谈话是吻合的。陆诒一九八一年四月九日在《到恩施访问叶挺将军》一文中写道：在谈到第二次反共高潮和“皖南事变”的时候，叶将军深有感触地说，我全体指战员浴血奋战七昼夜，大部壮烈牺牲。“这时，饶漱石又叫我下山去谈判，这是我所反对的，明知不会有好结果，但为了服从党的命令，顾全大局，我就带了我身边几个侄子叶育青、叶一舟和叶钦和等几人，找国民党部队谈判。不出所料，而被他们扣留，解送上饶顾祝同的司令长官部。”

一九四一年五月八日，饶漱石在华中局高级干部会议皖南事变总结会的副报告（正报告是刘少奇同志作的）中，讲到当时他同叶军长商量提出几个条件去交涉。这些条件包括：要对方立即停止攻击，让我们一条出路去皖南北渡；要对方释放我们一切被捕人员，交还枪支。饶漱石还特别强调指出，“军长在战斗中间一直表现都是很好的，非常的坚决，就是最后下去的时候，他还是这样讲，‘我是经过你同意的’，这表现他对党的观念非

常强。”

饶漱石是谈判交涉的决策人。在前面这段讲述中，他没有说是他首先提出谈判交涉。这一点并不重要，因为在当时的情况下，向对方提出谈判交涉是对的。毛泽东、朱德、王稼祥同志一月十二日致胡（胡服，即刘少奇）、陈（陈毅）同志即转叶挺等同志的电报指示中就已明确指出：“应注意与包围部队首长谈判”。只是由于当时已失去通讯联络，叶挺等同志没有收到。这说明，叶挺军长去谈判这个事实，是符合党中央的精神的。

此外，当时直接参与策划“围剿”新四军的上官云相第三十二集团军参谋处长武之棻等人所写的材料，也可引以为证。一九六三年武之棻发表在《文史资料选辑增刊》上的《“皖南事变”中上官云相的策划和战斗经过》一文中说：“约在十三日，叶挺将军派人接洽停战，一〇八师转来电话向总部请示，上官云相允如所请。次日（十四日），二十五军一〇八师着三二三团团团长李世镜派一上尉副官随同新四军前来人员至鹿角山西侧山坡下，将叶挺将军及随员七人接出包围圈，先至五十二师师部（三二三团临时归五十二师指挥），休息一夜，然后转送总部。”

综合上述材料，可以清楚地看出，叶挺军长确是在从大局出发，决定同国民党部队进行谈判交涉后，被上官云相以同意谈判交涉的名义诱骗下山，强行扣押的。

二、中央和南方局的负责同志当时使用的提法及其演变情况

由于党中央在事变发生后的一段时间里，与新四军被围部队处于完全隔绝的状态，无法了解事变的发展过程，对于叶、项的下落，在最初几次的内部通报及文电中，不得不引用国民党方面的消息，曾经出现过“被擒”、“被俘”的字眼。例如，毛泽东、朱德、王稼祥一月十五日《关于何应钦致国民党各部队急电内容的通报》就是这样说的：“何应钦致各部队急电称：‘连日来各战区进剿匪军颇为顺利。匪首叶挺、项英均先后被擒。兹为预防其报复计，各部队须严为戒备，勿为匪乘’等语。”一月十六日，周恩来同志给毛泽东同志的电报说：“据军令部消息希夷已负伤被俘”。同日，中央军委总参谋部“通报第三号”也称：“十四日叶、项被俘，似有可能”。

必须看到，当时中央在一些公开的声明、谈话中，措词是十分谨慎的，从未直接用过“被俘”的字眼。一月十八日，在《中共中央发言人对皖南事变谈话》中说：“至昨十七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已正式发出通令，宣布新四军为叛逆，并直认将皖南新四军部队歼灭，又谓该军军长叶挺负伤被俘”，采用了转述国民党的说法。一月二十日，毛泽东同志在《中国共产党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命令》中是说叶挺军长“陷身囹圄”，则更是审慎的。



“”

三月一日，周恩来同志向国民党提出“临时解决办法十二条”时，用的就是“被捕”一词。

到后来，事情的真相清楚以后，中央及一些负责同志谈到叶挺军长在事变中的遭遇时，就明确指出：国民党军队背约扣留了叶挺军长。如陈毅同志原来在就职通电中曾说叶挺军长“负伤被擒”，一九四四年八月二十八日给美军观察组组长包瑞德信中所附的《皖南事变的真相》一文就改变了说法。他是这样写的：叶军长率军部九千余人行至茂林地区即遭国民党五万大军的伏击，我军临时被迫自卫，“一月七、八、九三日，曾将国民党军队击退。但到了十日以后，由于没有粮食，全军四日未沾水米，已呈险状。叶军长当时致书国民党前敌指挥官上官云相（由于他俩幼年同学于保定军官学校），责其失信弃义，望其以抗敌为重，不宜自相残杀，应让新四军继续通过，如允许，则叶本人可亲往上官总部协议，以解决纠纷。上官得信之后，即回信同意，欢迎叶军长前往面商。叶军长为了抗战大局，奋勇前往上官处，……不料叶军长十三日到上官处，上官一面背约扣留叶军长及其随从，一面令大军猛攻”。一九四六年四月十三日，《解放日报》刊登的介绍叶挺烈士生平的文章，说他“四一年一月皖南事变被国民党当局非法逮捕。”

（转载《文献和研究》1983年第8期）

[G e n e r a l I n f o r m a t i o n]

书名 = 中共党史资料 第十辑

作者 =

页数 = 3 0 2

SS号 = 0

出版日期 =

封面
书名
版权
目录
正文